目次

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

第一章 緒言

一 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念

經濟思想是經濟環境的產物，而又足以支配當時及以後經濟的趨向。在今日我們要確定今後中國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最緊要的固須看清當前本國與世界的經濟情勢，但對於過去的經濟思想也不能輕易忽視。尤其是過去一百年——從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是中國整部歷史的轉變期。這時期中各派經濟思想的起伏及其得失，於目前國民經濟情況有深切的關係，應當細加檢視。經濟思想之具有完密的、科學的系統的，稱爲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說，

在中國至今還未見有自創的出現。(註一)一般經濟學界的著作，大多係編譯或轉述性質，無足深論。故本文所述專着眼於國民經濟改造的思想。這種思想雖屬於經濟方面，然與政治改革、社會運動、及文化潮流不能明白分開，而發為主張的各家也少有專治經濟學的，大多是些政治家、實業家、革命家、以及社會運動家。他們的經濟理想與實施，對於國民經濟直接間接都曾發生鉅大的作用，宜作為我們檢討的對象。

在中國經濟發達史中，百年前的鴉片戰爭是一個重大關鍵。那次戰爭乃外力侵入的第一聲。它打破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狀態。在戰爭以前，中國經濟大體上是一種單純的封建的形式。經那次戰爭之後，中國經濟起了一種劇烈的變化，而變成半封建半資本主義與半獨立半殖民地的複雜形式。這種情形，很清楚地反映在經濟思想中，劃分出兩個顯然不同的時期。

封建社會的根本特徵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工業不發達，小規模的家庭工業，如紡織等，只是農業的副業，商業甚為社會所輕視。中國自漢族從西方來到黃河流域建國的時候，即已是一個農業民族；且在東周時，農業技術已相當發達，如用鐵器耕種，並知道灌溉排水的方法。「以農立國」

歲爲相傳的國策。中國古來傳統的經濟政策，根本上都是一種「重農主義」（Physiocracy）。歷代帝王大臣都把農業看作最重要的生業，這可從他們的詔書、奏疏、與法制中顯然看出。周公授民職業，將三農列於九職之首。秦商鞅說道：「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漢文帝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晉人趨鶩商業，政府用課重稅的方法使他們歸農。漢、晉以後，這種政策都相沿不變。即至清代，還一仍舊貫，如康熙二十九年上諭中謂：「阜民之道，端在重農。」雍正二年諭戶部道：「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乾隆二年諭農桑爲政治之本，又說：「朕欲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畝。」在這種重農主義之下，全國人口百分之九五以上從事農業，工商業毫不發達。工業技術的改進非但不被獎勵，且即有發明，也常被「奇技淫巧」之辭所鄙薄。商業在兩漢以後歷被輕視，經商牟利爲社會所恥言，商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落，加上交通工具拙劣，貨物運輸極感不便。工業只是些小規模的手工業，如最重要的紡織業，便是一種附屬於農業的家庭工業，由婦女乘農隙操作，即所謂「男耕女織」，且多半爲自己消費，攜往市場銷售的極少。其實就是農業，在原則上雖被提倡，但對農事並不講求。農民在周末已用鐵器耕

種，現在所用的農具與之相彷彿，農業技術沒有多大的進步。

講到思想家與學者的觀念自然比較複雜。約在周朝末期，因社會制度正在轉變，經濟思想非常發達。其中老子、莊子代表道家，主張消極無爲類乎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孔子、孟子代表儒家，注重倫道仁義，不失淑世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特質；管仲、商鞅代表法家，講求國家富強，近於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楊朱附於道家，倡言爲我享樂，可說是一種利己主義(Egoism)；墨翟代表墨家，提倡博愛公利，帶有宗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的色彩；許行、陳相代表農家，力持「並耕而食」，有如近世的勞農主義(Agrarianism)。(註二)這是一個思想上的黃金時代。時間可並不久，到秦統一起便沈寂下來。秦朝在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獎進商業資本，而時間也很短暫。漢興以後，封建勢力重見高張，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思想統於儒家一尊，自此孔、孟思想成爲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所講的主要地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他們在倫理的著作中論經濟，且以倫理的觀點論經濟，所謂「爲道德而謀經濟，非爲經濟而談道德」。孔、孟而下，都好談道義，惡言利，如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對於近代經濟學者

所重視的人生自然欲望不主張充分滿足。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他們非但不講個人的小利，卽為社會謀大利也少論及。他們的政府職務觀是消極的，對於國民經濟主張無為而治，卽採西洋的所謂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故理財也主節用，以「不傷財，不害民」為原則。儒家這種思想深入人心，歷代執政者奉為圭臬，對於社會經濟多抱聽其自然的態度，卽遇豪強大戶壟斷兼併，也少有採取統制的辦法。偶有少數懷抱大志想用政府力量實行干涉政策（Intervention）為國興利的人，往往被用「與民爭利」的話箝制。商鞅、王莽、與王安石都戰勝不過這種傳統思想而失敗了的。

過去中國生產技術的不進步，大部分須歸之於學問與生產的脫離關係。在古代，聖人本是大發明家和大工程師，故禮記中有「作者之謂聖」，考工記中有「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的話。不過到了周末諸子百家各樹社會學說，不復以指導生產為事。如孔子就沒有從事生產，他自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也不重視生產，如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但不研究生產，其智識「不如老農，不如老圃。」孟子輕視體力勞動，曾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些話很像希臘哲人所倡的奴隸與智者分工一樣。從此學問漸從現實生活游離，入於宦學的岔路，學者略涉經籍策論，便以之游說獵官；而科舉取士亦以文章詩賦，許多優秀之士的日力都耗費於此。至在野學者多以修身與養性為日課，潛心於性命天人之道，也使學問誤於幽玄的境界，以致中國文化雖有悠久的歷史，而物質科學仍然非常落後。

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分配重於生產，「均富」觀念特別發達。孔子說的「安無寡，均無貧，」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話，最足以代表。如土地——農業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便是比較平均的，雖不免有兼併的事實，可沒有像西洋那樣的大地主發生。家族的遺產並不由長子繼承，而均分於諸子，這樣產生了許多小農；其優點是財富分配比較平均，其缺點是將農場分割太碎小，不能應用進步的生產方法。新的生產方法雖間有發明，可沒有普遍應用。因為中國人口繁庶，若用省力的方法，將使勞動過剩，許多人的生活發生問題。所以寧願抱殘守缺，安於拙劣的生產方式，甘於低下的生活程度。這種苟安保守的觀念，實使中國四千年來的國民經濟，一直陷於停滯不進的狀態。（註三）

二 晚清經濟思潮之轉變

中國過去的經濟若與西洋比較，則我們忽視了生產效率而保持分配均勻，他們是犧牲了分配均勻而完成生產效率；雖然各有特點，但終究我們是消極的知足的，他們是積極的進步的。所以中國經濟發達雖早，而有讓西洋後來居上之勢。這兩種經濟如果不加比較，中國不會覺察自己落伍。我們的祖宗大多懷着一種成見，自尊為天朝上國，而鄙視他國為夷狄之邦，深信中國固有文化之外，沒有第二種文化。約在十七八世紀的時候，英國產業已在漸漸發達，看到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市場，不惜卑詞要求通商。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要求在廈門設商館，清政府沒有允諾。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再要求訂約通商，只准許英人在廣州設立商館。（註四）

清政府固持這種鎖國政策(Close Door Policy)，想繼續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然英國政府並不就此罷休。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八年）又遣馬喀尼勳爵 (Lord Macartney) 等一行使臣前來，提出幾項要求，如派員在京照管本國商務，英商在京開設商館，並多予貿易便利等。政府

誤以為他們是來朝貢的，不會答應他們的要求。乾隆在諭覆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詔書中云：「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片、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又云：「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之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懍遵勿忽！」（註五）這些話在今日看來，不免自大，對外力不免估量太低。後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續遣使臣安赫斯德（Amherst）來要求，也遭遇同樣的結果。

其實在十八世紀末葉，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發動，且已著有相當成績，如瓦特（Watt）在一七六三年完成蒸汽機，哈格里夫（Hargreaves）在一七六四年發明紡織機，阿克來特(Arkwright)在一七七一年設立紡織廠，克隆登（Crompton）在一七七六年製造鋒紡機，其製造的量與質都已遠非我們所能及，要是那時乾隆及其大臣明白此中真相，對於自己冒失的態度也許會啞然失笑吧。不過那時英國工業革命尚未全部完成，資本主義勢力尚不十分雄厚，如果能夠立時憬悟，改

變觀念，取彼之長，迎頭趕上，說不定以後一切辱國喪權的事可以不致發生。可惜當時的政府對於世界大勢缺乏眞正的認識，一味做着自尊自大的好夢，悠悠忽忽，終於錯過了及時振作的大好機會。

從十八世紀下半期到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生產力的發展眞是一日千里。他們有過剩的商品、資本與人口，需要找尋國外市場、投資事業、與殖民地。英國的國策也從純作經濟侵略的資本主義化爲兼作政治侵略的帝國主義。在這樣發展的要求下，印度首先被併吞，然後又以印度（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便是經略遠東的大本營）爲據點，進而佔據馬來半島，再進而向中國侵略。對於清政府過去所給與限制貿易的辦法不復滿足，要求取消行商制度，（註六）結果未能如願以償。他們決心要獲得中國市場，外交的方式既未奏效，乃改以武力奪取。會値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中國禁煙運動領袖林則徐燒毀了英人販賣的鴉片兩萬多箱（價値一百萬鎊以上。）英人卽藉端尋釁。在事前，林則徐的態度非常強硬，在致英王移文中末後有「天朝所以能服外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等語，但中國的軍備情況早被外人看穿，決非虛聲恫嚇所能濟

事。一八三九年十一月英艦向廣州開火，礮臺與船隻很快地被擊燬沈沒；並乘勝北上，連陷浙江沿海與長江一帶幾個城市。到一八四〇年，復切斷京師漕運的路，且有直逼南京之勢，清政府逼着祇好對英屈服，在「康瓦爾」(H. M. S. Cornwallis) 號兵艦上簽訂江寧條約，除了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割讓香港等外，更重要的是廢除商行，抑低進口稅率，並開五口通商。至此中國四千年來緊閉的國門遂被洞開，不得不改行門戶開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 了。

鴉片戰爭的失敗是必然的，這不是驕臣戰士的功罪問題，而是兩國國力的強弱問題。以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與產業先進的國家戰，以舊式的武器敵新型的礮艦，其失敗之數原是預定了的。自江寧條約開了一個惡例，列強相率做尤，不久英、法又要挾訂立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俄國要挾訂立璦琿條約（一八五八年、）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我受此重重束縛後，關稅不能自主，外貨可以暢銷無阻；給與內河航行權，外輪可以行駛自如；承認領事裁判權，外人可以橫行不法；加上拖住了幾大商埠的咽喉，列強的經濟勢力可以長驅直入，深入吾臟腑腹地。中國經濟遂一天一天走上殖民地的路。

自列強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停滯的經濟即起劇烈的變化。我不能自固藩籬，外貨、外資如潮湧而入；結果本國農村衰落，手工業淘汰，鄉村城市失業人口增加，生產沒有發達，而新式消費習慣已經養成，僅有的資本消消流出，國民經濟呈江河日下之勢。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我國無法苟安自全，而古方也醫治不了新病。易經上說：「窮則變，變則通。」羅素說：「思想不是人的自然活動，而是病的產物，有如病時發高熱一樣。」（註七）中國正處窮變之時，痼疾滿身，一般有識的智識份子開始覺悟，非改變祖宗成法，不足以應付此鉅大的世變，而使國計民生轉危為安，於是各種各樣經濟改造的思潮應時而起，匯為先秦以後未有之大觀。在這中國經濟困頓的局面中，中國經濟思想展開了新頁。

（註一）唐慶增氏在所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亦說「中國原無經濟科學；」（頁一）。其實直至今日，也未見有獨立的經濟學說出現。

（註二）日人渡邊秀方將許行思想看作無政府共產主義，說「許子的道，蓋共產的道。」（劉侃元譯中國哲學史概論第四編第四章）。這不免附會而且過甚其詞。他們不過提倡上下一齊從事勞農，並沒有提出一種共產的經濟制度

（註三）亞丹斯密（Adam Smith）嘗論中國自然環境優厚，而國富不因之增加，且長久停滯不進，是由於政制與

敎化不合之故，見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ap. IX。

（註四）「商館」(factory) 爲清政府允許外人在華經商及居住之所，其地點祇限於口岸一隅。

（註五）此節如能參較英譯同義當更顯豁。見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by Henry T. Hodgkin pp. 52–53。

（註六）「行商制度」(Hong System) 始於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的「官商」(Emperor's Merchant)，官商須向官廳納銀四萬二千兩，官廳即予以包攬對外貿易的全權，凡外人在華購貨銷貨，都須由官商經手，不能直接交易。後來官商組織公會，稱爲「公行」(Co-Hong)，是一種中國對外貿易商的行會，壟斷進出口貿易，需索回佣甚大，頗爲外商所反對，鴉片戰爭後即被取消。

（註七）見 Bertrand Russell, 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p. 93。

第二章　清代重臣的富強政策

一　曾國藩之學夷技以制夷術

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道光年間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勢力，咸豐年間被困於太平軍的騷動。若以後者比前者，則前者的威力可怕得多。薛福成曾記胡林翼一段故事道：「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勢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着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頭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胡林翼已看到外國堅利的器物將成為中國心腹大患，

但他對於這些事務根本莫明其妙，只是中心憂懼，不知如何對付。

在胡林翼後繼續掌握軍政大權的曾國藩，與外人在軍事與外交上接觸的機會較多，對於他們的長處有相當的認識，且也曾試行效法。曾氏是清代所謂「中興」諸臣的柱石。（註一）他的出身很寒素，祖父是一個善良的自耕農，父親是一個循謹的私塾教師，不過他自小勤讀經史，仰慕古昔聖賢，懷着澄清天下的大志。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在京授職，幾經昇遷，累官禮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咸豐二年，以丁母憂回湘鄉故籍，那時太平軍正進攻湖南。他們所信的是耶穌教義，所行的是共產式的制度，與他所篤守的名教思想大相違戾，不願再袖手旁觀。（註二）遂在清政府的授命之下，投筆而起，在籍創辦團練，訓練鄉勇，並聯絡各路友軍，齊同鎮壓太平軍。從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起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止，轉戰十二年，次第規復各地，終於手定大亂，成爲清室中興的第一功臣。不久山東一帶有捻民作亂，他又受命出師督剿，很多人嫌他師行迂緩，故剿捻軍事改由李鴻章代辦，自己回任兩江總督，後調直隸總督。曾一度辦理外交，主張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晚年致力洋務，置備輪船機器，派遣子弟出洋。他很注意提拔並作育人才，同、

光兩朝的許多重要人物，有的是他幕府中的僚屬，有的是他派遣留洋的學生，直接間接總離不開他的系統。

曾國藩是一個軍事家兼政治家，而道德家的氣質更重。對於消費，深受歷代儒者影響，力主節欲節約，以驕奢淫佚爲大戒。「崇儉」「戒奢」的話，在他日記與家書中隨處可以看到。這種教條，是從他自己做起的。曾氏平日蔬食菲衣，以「淡極生樂」爲慰；自謂「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註三）「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註四）他因奉身淡泊，故服官廉介，很早就誓言：「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註五）他以後立身處世，一直臨深履薄，謹守此義。他還以此義告誡他的家人弟子，教他們要少欲：「凡多欲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古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註六）戒奢：「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可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註七）習儉「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誠意宜厚，用途宜儉。」（註八）子孫多能遵行，養成了他一門儉樸的家風。他又以此義勸

誠州縣廚吏，在勸誡州縣四條中有一條崇儉樸以養廉：「……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署少一雙之奢，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有節，取之於民者有制矣。」（註九）在勸誡營官四條中有一條尙廉儉以服衆：「……欲服軍心，必先尙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化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註一〇）在勸誡委員四條中有一條崇儉約以養廉：「……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偏地餓莩，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敢暴殄哉！」（註一一）他這樣以儉樸之風爲天下倡，想由崇儉與養廉入手，達到澄清吏治的目的。其用意與做法，與中國修齊治平的正統政治哲學完全相符合。近年國內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也正是要從這些基本的地方入手，移轉社會的風氣。

曾氏的經濟思想，在消費方面提倡節儉，在生產方面注重農業。（註一二）他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還少，自己出身農家，頗知耕稼的艱難。後來連年用兵，又目擊各地田舍荒廢，農民流離痛苦。所以在亂平以後，極思復興農村，勸誡州縣重農事以厚生，說道：「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

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爲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紓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濬。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註一三）他這種思想，見之於實政的，一爲輕稅：因江、浙、安徽各省慘遭兵禍，奏請豁免前欠錢糧。二爲救荒：在湘省倣行朱子社倉法，由本地富家捐穀若干石，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回（卽每石加一斗）；實行時由民間自辦，以矯當時各縣官辦社倉之失。爲開示義風，他家先自捐穀二十石。（註一四）三爲水利：在同治七八年間，勘驗永定河，利用外國機器搶修堤壩，疏濬河牀。爲籌款與監督工事，他費了不少心力。

在征伐太平軍的長期戰爭中，財政的籌措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釐金的制度就在那時起行。釐金由雷以諴創行於江北，晏端書推行於廣東，胡林翼仿行於湖南，左宗棠仿行於湖北，曾國藩仿行於湖南、江西等省。咸豐六年，曾氏又請在上海抽取，奏謂「查近年各處籌餉，惟抽取釐金，尙屬有利無弊。……目下賊氛逼近，無處可以抽辦。近省惟江蘇之上海縣，商賈雲集，貨物山積，並未抽取釐

；

金合無仰懇天恩，飭下該省督府卽飭上海道及府縣等官曉諭紳民商旅，按貨抽釐撥送臣處，專濟楚軍之餉」等語。（註一五）釐金病民——尤其是病商——爲大家所公認。故對於抽釐一事，後世論者多引爲曾氏盛德之累。大概當時軍餉窮絀是事實，而攻勦正在緊要關頭，不得不出此一着。如他所說「辦釐原非得已」，「東南用兵十年，全賴釐金一項支持。」其他如程鴻詔也有「軍興以來，餉需甚鉅，不有釐金，殆將枵腹」的話。說「釐金有利無弊」，迫切陳詞，不免含有語病。另外他說的「抽釐取民，在諸弊政中猶爲彼善於此」，自不失正論。因曾氏重農，在他看來病商猶比病農較勝一籌。以後釐金的弊害，一部分也由於腐敗的滑吏所造成。故對於稅務人員的遴委，他極爲注意。在派員辦廣東釐金時奏道：「抽釐經始之際，諸事紛繁，必須廉正明幹，熟悉釐務之員，隨同辦理。……總期涓滴歸公，無病於廣東商民，有益於江浙軍務。」（註一六）曾氏深知稅重由於兵多，時以國用不足與兵伍不精爲天下大患，認爲「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故曾議請裁汰「缺出不補」以輕捐稅，（註一七）可惜未獲采行。

太平天國的平定，一部分靠了洋兵的力量。這件事帶着相互利用的性質，清兵想利用他們的

槍礮殺敵，洋兵想借此得到些權利。不過曾國藩在戰爭中看到洋人的利器比自己的效力大得多，想到如果洋人的槍口一旦反過來對付中國，必定要喫他們的大虧。而且他晚年辦理外交，深切地體驗到洋人的不易對付，必須師法西洋的物質文明，以充實自己的國力。他仿效魏源在海國圖志敍裏面說的「是書何以作？曰：爲以夷攻夷而作，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也提出「學夷技以制夷」的口號。從同治元年（卽平定南京的前二年）起到同治十一年（卽他死的那年）止，他積極興辦造船廠與機器廠等；其中的經過在他新造輪船摺（註一八）中寫得很清楚：

「竊中國試造輪船之議，臣於咸豐十一年七月覆奏購買船礮摺內，卽有此說。同治元年二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委派知府馮俊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礮；只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專造輪船之用，仰蒙聖慈允准，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此次創辦之始，考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之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曰『恬吉』輪船。……臣親自登舟試行，尙屬

堅緻靈便，可以涉歷重洋。……將來漸推漸廣。……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溯自上海初立鐵廠，迄今已逾三年。開局之初，軍事孔棘。李鴻章飭令先造槍礮兩項，以應急需。惟製造槍礮，必先有製造槍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購鐵廠，……造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考圖說，……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機器三十餘座；即用此器以鑄礮製造開花田雞等礮，配備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槍一項，……槍成之後，亦與購自外洋者無異。此四五年間先造槍礮兼造製器之器之情形也。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其已成者曰汽鑪廠，曰機器廠，曰火箭廠。……另立學館，以習繙譯，蓋繙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外人，亦可引伸，另成新書。」

曾氏把製造輪船與槍礮當作中國自強的基礎，同時對於技術人材的培養，也非常注意。當時留美前輩容閎建議派遣幼童到外國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各項，由丁日昌與曾國藩商榷，他即奏請實行。那時有些人頗持異議，認爲天津、上海、福州既設製造局，北京既辦同文館，上海既開廣方

館，不必再派出洋。他在奏摺(註一九)中堅持原議道：「不知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西學求實際，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奧窔中苟非徧覽久習，則本原無由洞徹，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此物此志也。況誠得其法而歸，觸類旁通，視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這一批留美學生在同治十一年正月放洋，正是他死的前一個月。曾國藩的一生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他的思想與事業也分兩方面：在保持固有社會制度上是保守的，晚年在採法西洋經濟技術上是革新的。

二　李鴻章之洋務運動

曾國藩採西法圖富強的政策，只打了一點基礎，在這方面進一步努力而作大規模設施的是李鴻章。(註二〇)李鴻章也是進士出身，出世比曾遲十四年，早歲曾隨曾氏講求義理經世之學，後來

又是曾氏的幕僚，因得他的提拔，得統率淮軍，共同打平太平天國，勦滅暴動的捻民（註二一）而與曾國藩、左宗棠等並稱為清室「中興」重臣。曾氏死後，左宗棠出征西北，國家的大政輪到李鴻章主持。李氏在帶兵夾攻太平軍的時候，在上海曾利用過外人統率的所謂「常勝軍」(Ever-victorious Army)（註二二）看到洋兵器械的精良，深知本國的兵力只能壓平內亂，不足抵禦外患，所以他一旦得到重權，便竭力模倣外國製造軍器。

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有人為想節省經費，奏請暫停製造輪船，李力主不可，並申述其理由道：（註二三）

「……臣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吾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弓矛、小槍、土礮，不敵彼後門進子來福槍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礮划，不敵彼輪機兵船，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

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彼方日出其技，與我爭雄競勝，挈長較短，以相角而相陵，則吾豈可一日無之哉？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耳。況彼之有是槍礮輪船也，亦不過創制於百數十年間，而侵被於中國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學愈精，愈推愈廣，安見百數十年後，不能攘夷而自立耶？……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此停止輪船之議所由起也。臣愚以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礮、製造兵輪船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在這段文字中，他把西洋帝國主義的勢力如何侵入中國，用何種法術侵入中國，中國又應用何種法術應付，都說得很深切著明。他認清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是中國三千多年來的一大變局。應付這種變局，不是空談外交所能濟事的，所謂「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思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也不是抄襲古方所能濟事的，所謂「弓矢、小鎗、土礮不敵彼來福鎗礮，」「帆篷、舟楫、艇船、礮划不敵彼輪機兵船。」必須學習西法充實國防，纔能保持國家安全，所謂

「即甚有結，而必陰為戰備，庶可速成而經久。」後三年即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發生臺灣事變，海防問題尤見迫切，他奏請籌備海防，(註二四)進一步說道：

「……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麕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萬倍；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庚申以後，夷勢駸駸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著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凡詢以自強何術，禦侮何能，則茫然靡所依據。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決勝者。若彼之所長，己之所短，尚未探討明白，但欲逞意氣於孤注之擲，豈非視國事如兒戲耶？臣雖愚闇，從事軍中十餘年，向不敢畏縮，自甘貽憂君父；惟洋務涉歷頗久，聞見稍廣，於彼己長短相形之處，知之較深，而環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眾議，雖欲振奮而未

由。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誰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能久也。……伏願我皇上顧念社稷生民之重，時勢艱危之極，……節省冗費，講求軍實，造就人才，皆不必拘執常例，而尤以人才爲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製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漸精強。精誠致行，尤需歲月遲久，乃能有濟。目前自須力保和局，即將來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開釁；彼族或以萬分無禮相加，不得已而一應之耳。」

李鴻章這種議論，在當時清廷中是一種被人矚目的新思想。他對於中國所處險惡的環境，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的認識，對於洋務的提倡與實行，都盡了很大的力量。所謂「洋務」的內容，就是一種以國防爲中心的經濟建設。開始時完全注重軍用工業，如製槍礮、造船隻、築礮臺、修軍港等等。後來覺得要從事軍用工業，須有其他重工業做基礎，造槍礮需要鍊鋼鐵，鍊鋼鐵需要開礦山，於是鋼鐵廠與礦務局等便創辦起來了。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源源輸入，國民漏卮日大，便決定自已也振興輕工業，於是新式的紡紗廠與織布局等也創造起來了。還有煤、鐵原料的運輸很笨重，須有輪船與火車等載送，於是鐵路與輪船招商局等也創辦起來了。這些商品工業初由官辦，後改官

督商辦。其目的與設施方式，頗帶有幾分重商主義（Merchantilism）的色彩。從同治元年到光緒二十年，在這中國產業初步發展期間，大多數的事業皆由李鴻章主持。茲舉其要者如下：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 在上海及蘇州設製造局，鑄造大礮。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 在上海與曾國藩設江南造船廠。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 在上海設江南製造局，在南京設金陵機器廠。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 在天津設機器局。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 在上海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 向外國訂造軍艦，始創海軍。設南北洋電線。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 在天津設開平礦務局，爲中國礦業之始。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築旅順船塢。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 與左宗棠等擴充船、礮各廠。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開採黑龍江漠河金鑛，由官商合辦。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在上海設立紡織新局，由官商合辦。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在上海設立華盛紗廠。

他興辦這些事業，不論在數量上性質上都還算不得產業革命，而且辦理大多數不得其法。一般主持的官僚毫無創業的精神，只把它當作塡飽私囊的肥缺。本國缺乏管理與技術人才，多受外人的朦蔽。結果靡費帑財的目的都不曾達到，反耗去了許多國家資本。所造軍器的不中用，在以後中法與中日歷次戰爭中暴露無遺。軍力不充實，外交沒有後盾，使李鴻章後來極感棘手，並受盡各方指責。許多人批評他眼光太淺近，如梁啓超說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礮耳，船耳，吾僅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註二五）對於這些地方，李鴻章也不是沒有自知之明的，他在答郭嵩燾的信中說：「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國之要端，欲舍此別圖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祇有盡其力所能爲而已。」其實他即清成這

點業績，也已費盡唇舌，遇盡困難，如謂「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除。」而且自己非常怨望，曾說「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可見要想透過清廷濃厚的封建氛圍，而有所新的作爲，去防阻帝國主義的狂潮，雖有決心與大力，亦不能有爲。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

三　張之洞之中體西用說

與李鴻章同時候，在清政府中有志從事革新的，有張之洞。論權勢的影響，張均不及李；而在經濟方面的建樹，兩人可說在伯仲之間。張氏也是進士出身的士大夫。他開始做了幾任浙江、湖北與四川的考試官與學政官，所到之處，總是提倡經史實學。他在教育方面的貢獻極大，如從事學制的改革，興辦各種新式學堂，創立強學會等。施教方針注重實用，對於生產教育、職業教育等，尤多提倡。後任山西、廣東、湖北各地巡撫，及兩廣、湖廣總督等職，在外不下三十年，其間於兩湖留任最久。（註二六）在經濟建設方面頗多建樹，茲擧其要者如下：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在廣東設立繅絲局。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在廣東設立機鑄錢局及銀元局。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奏辦盧漢鐵路，由盧溝橋直達漢口，擬分頭試辦：南自漢口至信陽，北自盧溝橋至正定，餘再次第接辦。奏在廣東設織布局及製鐵廠，向英國定購化鐵鑪兩座。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奏陳廣東鍊鐵機器改運至鄂，設立漢陽鐵政局（卽今漢陽鐵廠，）一面備築大冶運道，開採鐵礦，一面籌辦運煤採煤各事宜。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在武昌設立織布、紡紗、製麻、繅絲等四局，後改名湖北紡紗織布官局。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督辦粵漢鐵路。

張之洞是一個極有思想的人，他的文化思想可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二語做代表。他所

發表的有名的勸學篇，(註二七)便是說明這個道理，在當時傳誦極廣。他因目擊強鄰壓境，國勢阽危，故堅主變法圖強；並引据經典史實，說明「自強非實行新政不可。」他所謂變法，並非全部推翻傳統的道德哲學，依然加以保持。他所謂新政，並非全盤西化，只採取西洋的技術科學。這種革新是有範圍的：「夫不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機器也；心術也，非工藝也。」這個範圍也劃得很清楚：「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對於當時「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一是」的現象，非常痛心。他一方面攻擊純粹國故論者，即所謂「惡西法者，」斥之為「自塞，」為「自陷危亡。」他方面又攻擊全盤西化論者，即所謂「溺於西法者，」斥之為「自擾，」為「喪其所守。」同時又攻擊以中學傳會西學者，即所謂「略知西法者，」為「自欺，」為「空言爭勝。」他指出新舊兩派的錯誤道：「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

州之內矣。」(註二八)後又提出他自己的理論，分辨中學西學的性質：「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悌忠信爲德，以尊生庇民爲政，雖朝運機器，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認爲中學與西學宜兼用而不可偏廢：「知外而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而不知外，謂之聾瞽。」又認爲中學爲主，西學爲輔：「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註二九)總之，張之洞想澄清當時一般人的思想，提出「中體西用」的理論，還在表面上雖屬折衷的調和論，但骨子裏是在「采西法以補中法之不足」，還是以中學爲根本，不失爲新古典派的理論。不過他比曾國藩與李鴻章等已進一步，已把這種思想理出一個系統。

張氏的思想雖是折衷的，而且在今日看來是守舊的，但在當時清廷中他算是一個新人物。他所奏請的都是變法革新的條陳。清廷自遭八國聯軍的創痛，也覺悟到改革的不可緩，就在辛丑年（光緒二七年，即一九〇一年）五六月，張之洞（時任湖廣總督）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合奏三摺

（即當時著名的所謂「江楚會奏變法三摺」）第一摺論興學育才四條，第二摺論整頓中法十二條，第三摺論采用西法十一條，內容多屬經濟方面，其要點如下：（註三〇）

（一）廣派遊歷　「論今日育才強國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遊學為第一義。……觀其國勢，考其政事學術，察其與我國關涉之大端與各國離合之情事。……觀其實政，觀其實效，見其新器，求其新書，凡吏治、財政、學制、兵備，一一考詢記錄，攜之回華，以供我之采擇而仿行焉。」

（二）練外國操　「夫外國之所最長者，盡莫過於兵矣。……中外統兵大臣督撫、提鎮，嚴飭各營將士，必宜洗心滌慮，趕緊講求外國操之法，斷不可故見自封，再誤國事。」

（三）廣軍實　「和約雖定，戰備不可不修。……經費雖艱，軍械不可不製。……大廠自難多開，小辦必須努力。……此後江鄂兩局除加功精究，籌款擴充，並於廠內設立學堂以教員弁外，並擬設法籌款自造槍機、礮機、彈機，以待各省購用學製，庶免專恃外購，仰他人之鼻息，增中土之漏卮。……其餘南北各省皆令設法籌款，量力各設一製造局。」

（四）修農政　「中國以農立國，蓋以中國土地廣大，氣候溫和，遠勝歐洲，於農最宜。今日

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欲修農政，必先興農學。……勸導之法有四：一曰勸農學學生。……一曰勸官紳。……一曰勸鄉愚。……一曰墾荒蠲賦稅。……此外沿海有種蠔、種蜆之法，內海有捕海魚、采海味之利。……再蒙古生計，以遊牧爲主，請敕下酌擬有益牧政事宜，奏明辦理。」

（五）勸工藝　「勸工之道有三：一曰設工藝學堂。……一曰設勸工場。……一曰良工獎以官職。……三事並行，中國工藝自然日進。假如愚民小工，一月得工錢三四千者，學成後，一月可得工資銀數十元。土貨一年出口値二百兆者，以後若能每年增加十分之一，十年以後，出口之貨即可加倍。關稅之多，自不待言。至於自創新法，造成各種貨物者，給予牌照，准其專利若干年。凡人工所成之貨，釐稅尤須從輕，新出式樣，並免釐稅三年，亦爲鼓舞工藝之要務。總之，欲養窮民，查荒地不如勸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貨，富國富民確實可憑。如此，則但患生齒之不繁耳，豈患生齒之日繁乎。」

（六）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　「……必須訪聘著名律師，采取各國辦法，秉公妥訂礦路劃一章程，無論已允開允修之礦路，未經議開議修之礦路，統行核定，務使界地有限，貲本有

據，與辦有期，國家應享權利有着，地方彈壓，保護有資。華洋商人，一律均霑。洋人有範圍，則稍知斂戢。……必中國定有商律，則華商有恃無恐，販運之大公司可成，製造之大工廠可設，假冒之洋行可杜。華商情形較熟，工價較輕，費用較省。十年以後，華商即可自立，駸駸乎並可與洋商相角矣。……
……」

（七）用銀元　「銀元之利有三：平色畫一，出納分明，吏胥不能舞弊勒索，官民不致補貼受累，一也。商賈交易，簡捷無欺，駔儈無權，既益於行旅，亦便於匯兌，二也。官款收發，全用銀元，以大元爲母，小元爲子，相輔而行，工火局用外，尚有盈餘，三也。惟官發之款，若係采辦官物製造工料等事，商民物價工價，必然暗加其中；且出納皆以大元爲主，小元不能過多。然鑄數發數既多，盈餘亦當不少。此爲整齊銀幣之善政，尚不在有無盈餘也。」

（八）行印花稅　「查外國征商之政，除煙酒洋藥外，大率皆無關稅，其巨款全在印花稅，凡有關銀錢物業之契約單據，領用官局印花貼黏其上。……今日籌款，此事似可仿行。」

（九）推行郵政　「中國驛站，爲耗財一大端，歲費約三百餘萬兩，而文報最遲，盈虧相反，

遲速亦相反，然則此事必宜變通可知。……今擬於各省州縣徧設郵政局，即令州縣管理。」

（十）官收洋藥　「方今籌餉最急。然而零星羅掘，難得鉅數。釐金將撤，礙難再加。鹽價歷加，亦難過重，惟有加價於洋藥。」

（十一）多譯東西各國書　「今日欲采取各國之法，自宜多譯外國政術學算之書。」

這個奏摺是一種溫和的改進計劃，雖不是怎樣的大計，但所涉範圍亦自不小。張之洞等上這個奏摺，一方面想乘國家受辱後激動慈禧太后革新的意志，他方面是在遏阻康有為等比較急進的改革到法度的維新運動。(註三)清室對於這個計劃，表面上加以嘉納，在八月特頒懿旨中說：「責令中外臣工，將應行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並將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隨時摘要舉辦。」但實際上慈禧還是拘執成見，厭聽西法。所以五年間的新政，只辦到「廢科舉，設學校，派遊學」幾點，其他一無所成。本來推行新的經濟政策需要以政治制度的改革為前提。即如英國「改革法案」(Reform Bill)之所以能通過，也是因為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原故。張之洞想取巧，在湊合舊的政治制度下推行新的經濟政策，缺少了一個必要

的前提，終於沒有得到真正的效果。

（註一）關於曾氏生平參閱曾文正公年譜（曾文正公全集，世界書局版第一册。）及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等。

（註二）詳見討粵匪檄，曾文正公全集第一册，文集頁一四七——一四九。

（註三）見諭紀鴻曾文正公全集第四册家訓。

（註四）見求闕齋日記類鈔「省克」全集第三册，日記。

（註五）見致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書全集第四册，家書。

（註六）見書贈仲弟六則，同前。

（註七）見諭紀澤全集第四册，家訓。

（註八）見全集第四册，家書鈔「治家」

（註九）見勸誡州縣，全集第三册，雜著頁七六。

（註十）見勸誡營官，同前，頁七七。

（註一一）見勸誡委員，同前，頁七八。

（註一二）唐慶增氏有曾國藩之經濟思想一文，指出此點，可供參考。見中國經濟學社出版經濟學季刊第五卷第四期。

（註一三）勸誡州縣第三條，見全集第三册，雜著，頁七六。

(註一四)見全集第四冊嘉言抄「治家」頁一四七。

(註一五)見請抽上海釐金片，全集第二冊，奏稿頁一八六——一八七。

(註一六)見湊撥廣東釐金片，全集第二冊，奏稿頁四八五。

(註一七)見議汰兵疏，同前，頁一〇一——一〇二。

(註一八)籌辦輪船摺，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見全集第二冊，頁八三九——八四一。

(註一九)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摺，見全集第二冊，頁九四四——九四七。

(註二〇)李氏生平，略見清史列傳卷五七，頁一——一二，詳見梁啓超著李鴻章(一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

(註二一)「捻民」俗作「捻匪」。但這些人大多數是窮苦造反的農民，橫行於地瘠民貧的淮北、河南一帶，其性質與太平軍同屬一種農民暴動，故被稱「捻亂。」

(註二二)「常勝軍，」大半係英國外逃兵所組織，初由美國水手華德(Ward)統率，繼由英國軍人戈登(Gordon)接統，雖屬烏合之衆，而軍器、戰略均高出華人一籌，於太平軍之敗，濟助力甚大。

(註二三)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五月十五日。見李文忠公奏議卷六，頁三〇——四〇。

(註二四)籌議海防摺，光緒元年十一月十二日，見奏議卷七，頁九——十三。

(註二五)見梁啓超著李鴻章。

(註二六)張氏生平略見清史列傳卷六四，頁三六——四六。

(註二七)勸學篇發表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六月，正是百日維新的時候。經皇帝披覽，認爲「持論平正通

進，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在當時流行據說達百萬冊之多。書分內外兩篇：內篇多述中學，外篇則論西學。

（註二八）見勸學篇序。

（註二九）見勸學篇內篇「循序」頁十九。

（註三〇）江楚會奏變法第三摺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

（註三一）這是一個與康有爲等辯爭的計劃。在奏摺末後對於康氏等曾大事醜詆，說「至若康有爲之邪說謬論，但以傳康教爲宗旨，假託稱爲詭謀，其實於西政西學之精要，全未通曉，茲所擬各條皆與之判然不同」云云。又說「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絃更張之心，則頑固者化其謬，激沽者救其忠，而犯上作亂者之邪說，可以不作」云云。已把他們奏摺的用意說得很顯明。

第三章　駐外使節的洋務獻議

一　郭嵩燾的洋務疏

鴉片戰爭以後外洋的壓力日見加重，當國者知道洋人的勢力不是虛憍的意氣和鹵莽的舉動所能攘除，必須有通曉其情僞諳習其利病且手腕靈敏而能擔當責任的人纔能應付。應着這種要求，清政府派了幾個有學問才幹的人充駐外使臣，考察所在國家的政情，隨時報告國內。郭嵩燾是首先被派出去的一個。郭氏初居曾國藩幕府，後任禮部侍郎與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曾在廣東與洋人辦交涉，處置非常得當。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出使，爲中國駐英第一任公使。以這樣的人派到這樣的國家任這樣的事可說最爲相配。他那上品的紳士學者的風範，大爲當時英相格拉斯頓（W. E. Gladstone）所稱譽。他具有銳利的眼光，在他任內嚴復以留學生而與氏論析中西學術

政制異同，其才識即爲他所器重。（註一）他在國外幾年，親見彼邦政治、經濟、文化的發達，常修書疏報奏朝廷，希望用西法致強；卻不料被一般頑固派斥爲「邪言」（註二）回國時竟不敢踏進都門，日記被禁止出版。當時士大夫階級思想的閉塞與襟懷的褊狹，於此暴露無遺。

那時在當朝的大臣中很少有懂得洋務而決心革新的人，李鴻章、丁日昌與沈葆楨是僅有的幾個。郭嵩燾在海外遙遙爲之聲援。郭氏在滿朝譏笑之中，每以知無不言的精神，將其所見向李鴻章陳述。其中特別稱道西洋的物質文明，說英國自經多番內亂以後，一百多年來，官民共同講求國政，國勢蒸蒸日上，「計其富強之業，實始乾隆以後。大輪船創始乾隆，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法創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吸鐵機器傳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與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幾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

勉，且謂英國富強，實基於此。……此間有斯謡文森者，亦曾言各國鐵路，多所創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由是獻議中國急起從事物質建設，尤其是交通建設——鐵路與電信，說道：「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強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聲氣常若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雖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奸民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壅相與掩蓋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卽畢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掩，則無慮有貪吏過抑民氣而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註三）

郭嵩燾因爲看到西洋的富強在乎經濟，軍事遠在其次，故主張出洋留學，宜改習經濟技術，與日本的辦法一樣。他詢李陳遠道：「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藩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摹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效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

有成，卽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變構兵，直可以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將士相其血脈膂氣，筋骨堅強，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註四）郭氏知道器重於兵，這是他在英親身經驗所得的結論，究不是一味主兵的李鴻章輩所能及。但知道並不就能實行，當時士大夫多是些迂儒，拘泥古法，不知變通，將輪船機器目爲不祥之物，無怪他回國後要作「孔孟亦屬欺人」的牢騷話了。

二　薛福成的籌洋議

當時的駐外使臣，郭嵩燾以下，推薛福成、馬建忠、曾紀澤、（註五）容閎、（註六）黃遵憲（註七）諸人，薛馬出使西國，而論議通明，文學識見均頗優長爲當世所重。薛福成（註八）也出身於曾國藩幕府，光緒元年下詔求言，薛氏應詔陳言進呈治平六策：一肅官治，二恤民隱，三籌漕運，四練軍實，五裕財用，六養賢才。又陳海防密議十條：一擇交宜審，二儲才宜預，三製器宜精，四造船宜講，五商情宜恤，六茶政宜理，七開礦宜籌，八水師宜練，九鐵甲船宜購，十條約諸書宜頒發。後經李鴻章的提拔，試理洋務。其時客卿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以總稅務司而想加授總海防司，將中國兵權餉權操於他一人之手，薛氏獻計阻撓。（註九）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簡派爲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奉令辦理對外各案時，每疏陳確保利權之法（註一〇）著有庸盦全集。

薛福成環顧世界局勢，默察中國處境，認爲不能再拘泥古法而應當實行變法。處此東西互市的時代，雖堯舜當國也不能閉關獨治，治法不能不因時而變，「是故惟聖人能法聖人，亦惟聖人能

變聖人之法。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也，時勢爲之也。」今後變法，一方面當革除舊法之弊，他方面再採西法之長，尤其對於經濟、外交、軍事各項，應向西洋先進國家學習。他說：「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峙，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考工製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註一一）他主張變法當先盡知西法，再以之變更中法，最後還要制勝列強。他是要「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衞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復生，未始不有事乎此，其道亦必漸被乎八荒，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這種思想，與曾國藩的「學夷技以制夷」說，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相通，其用意更較積極；不但要利用外國的技術、科學保衞中國，而且要利用其力量使中國的道德教化得以風行世界。

西洋富強的根本在乎工商業，尤其是工業科學家所致力的即在發明與製造，而中國過去恰好相反，政府重士而輕工商，優秀人才的精神都費在文學科名上面。薛福成是提倡工商業的，所以鼓勵改變這種風氣，說道：「中國果欲發憤自強，則振百工以預民用，其要端矣。欲勸百工，必先破去

千年以來科學之學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漸化其賤工貴士之心，是在默察三代聖人之用意，復稍參西法而酌用之，庶幾風氣自變，人才自出乎。」（註一二）他看到西洋人治學問是分工的，如他所說：「或嫻工程，或精會計，或諳法律，或究牧礦，皆倚厥專長，盡其用不相援也，不相擾也。士之所研，則有算學、化學、電學、光學、天學、地學，及一切格致之學；而一學之中，又往往分爲數十百種，而累世莫殫其業。工之所習，則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羽毛，及設色搏埴，而一藝之中又往往分爲數十百種。」（註一三）勸導國人效法專攻，以求專精的成就。至從事生產，他主用機器，以收大量生產減輕成本與價格之效；不過當時守舊派還有反對論，所以爲之辨明道：「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宏，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所以能致此者，機器爲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爲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爲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中國人

民之衆，十倍西洋諸國，議者請廣用機器，不啻奪平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然彼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或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爲之工之價，則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並不能售與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之無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機器調劑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以論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註一四）

薛福成不但提倡工業，而且鼓吹開礦產、築鐵路、興商務。關於開礦，他說：「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銅鐵，皆仰給外洋。至於金銀，如英美所闢之舊金山，每歲出於礦者數千萬，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國無生之之道，僅以古者所有，互相轉輸，又已用之盡錙銖。通商以來僅二十年，而外國日富，中國日貧；後數十年則益不可支矣，是可不籌所以振之哉？且中國礦產之饒，甲於地球諸國，苟善取而善用之，

因大可爲之資也。而論採用之道，惟礦屯一法爲最善，……此誠撙節財用之要道也。」其中所提出的礦屯之法，就是寓兵於礦的辦法，他認爲勝於官商經營，因有如下六利：(1)節省餉糈，(2)保持兵勇，(3)懾服匪苗，(4)開辦費輕，(5)多闢生路，(6)抵制洋貨。(註一五)關於築路，他說：「中國而仿行鐵路，則遐者可邇，滯者可通，費者可省，散者可聚。」指出鐵路的三大利益：第一，便於商務。江淮以北，缺乏水路流通百貨，如在西北各省築路，貧瘠可以變成富腴，釐稅可增數倍。第二，便於轉運。江浙的漕糧北運，各地米產不均，與價格參錯，軍糧運輸的困難，這種種問題，鐵路火車通行以後，即可解除。第三，便於運兵。中國地域遼闊，邊境如有戰事，調兵費時失機。如果築路，運兵既便，兵額可裁大半，而收鐵路之利。(註一六)關於興商，他計算每年洋商在華「所贏之利，當不下三千萬，以十年計之，則三萬萬。此皆中國之利，有往而無來者也。無怪近日民窮財盡有岌岌不終日之勢矣。然則爲中國計者，既不能禁各國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務而已。」他說商務之興有三要政：第一，販運之利。中國所設招商局已收回利權五分之二，以後當用經濟辦法在各埠設分局，租船修，整齊步伐，撥款補助，由本國海岸推至南洋以及西洋，以與西洋各國相競爭。第二，藝植之利。絲茶爲出口大宗，今其利源

漸爲他國所侵奪，當勸民栽植桑茶，獎進繅製的改良，並勿加稅，以利出口。第三，製造之利，獎勵紡織業，新設公司免稅三年，本國多出一分貨，則外洋少獲一分利。(註一七)他從經濟上着眼，認定中國富裕之後，各種事業都可次第興辦，政治上也可從列強壓制之下解放出來。

三　馬建忠的富民說

馬建忠的地位與聲望都不及薛氏，而思想言論足以與之並傳。馬氏幼年正當太平之亂，流離轉徙，而到上海。本想應試舉業，而看到在洋人保衞之下的上海，固如磐石，因而感覺太平軍的作難是一時的，而洋人的威脅是永久的，於是決然放棄科舉，研討所謂洋務，閱讀譯書不足，又進習西文。後得李鴻章的提拔，出使法國，同時在巴黎政治學院攻讀，究心西國體制治理，時有論說記述之作，以備國人省覽，後集刊爲適可齋記言記行。

馬氏認定「治國以富強爲本，而求強以致富爲先。」中國在通商以前行國內貿易，財不外散，故國庫充裕。通商以後，外貨輸入多，銀貨外溢，致民窮財盡。世界各國都以經商致富，而貿易差額必

須有利。他說:「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屬之印度,無不以通商致富。嘗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爲準,通商而出口貨溢於進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貨等於進口者亦利,通商而進口貨溢於出口者不利,彼英美各國皆通商而進出口貨不能兩盈,故開礦以取天地自然之利,以補進出口貨之虧,至地利不足,債於我華民,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這些話雖不合正統派的貿易理論,但也是一部分的事實。接着他主張中國也要爭取貿易的有利地位,以保利權而致富強,說道:「欲中國之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出口貨多,則已散之財可復聚,進口貨少,則未散之財不復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採取礦山自有之財,采取礦山自有之財,則工役之散不出中國,實藏之聚無待外來,而以權百貨進出之盈虛,自無不足矣。」實施的方法,他分兩方面說:第一使出口貨多,在精求中國固有之貨,令其暢銷。這種貨物,以絲、茶爲大宗,因外力競爭而趨衰落,當設法整頓以挽回既失利權。第二,使進口貨少,在仿造外洋之貨,截其銷路。這種貨物,以洋紗、洋布等爲大宗,中國已有織布局,資本不充,辦理不善,當設法改良,以自優國民生計。至於所需的資本,他主張仿西國例設一商務衙門(即商務部),向各國舉債,然後依法轉借於華商所設之公司。(註一八)

富民的方法，矯正貿易逆差之外，鐵道與鑛產也是極重要的部門。馬建忠於鐵道之利津津樂道，謂西洋在五十年中敷設鐵道於五大洲，「軍旅之徵調，糧餉之轉輸，賑濟之輓運，有無之懋遷，無不朝發夕至，宜乎鐵道所通，無水旱盜賊之憂，無穀賤饑荒之弊，故各國未創鐵道之先，其度支以萬計者，而既造鐵路之後，無不以億計矣；其以億計者，無不以兆計矣。審其飈馳電掣，任重致遠，行萬里若戶庭。……所以立富強之基者，莫鐵道若也。」繼論中國必須趕緊築鐵路：「中國自軍興以來，製造之局幾遍直省，一切槍礮兵器漸仿外洋為之，而於外洋致富致強最要之策，如火輪車一事，反漠然無所動於中，蓋以為中國有窒礙難行者，而吾以為火輪車惟中國可行，惟中國當行，且惟中國當行而不容緩。」其理由如下：第一，火車在各國幾經辛苦改良，纔有今日的美備，而吾效法非常容易，這在時會上可行。第二，中國平原廣衍，南北卽有山川也可繞越，這在地勢上可行。第三，中國材鐵充盈，人工省嗇，這在開創時可行。第四，中國地域遼闊，如有鐵路貫通，荒熟可以相濟，人丁可以遷移，奸莠可以徵處，這在救患方面當行。第五，軍糧民食運費高昂，民間不堪負擔，藉鐵道運輸可以減輕，這在節用方面當行。第六，煤鐵滯重之物，藉火車之便，可以運銷無阻，這在開源方面當行。這些都是經

濟的理由。此外還有國防上的理由(註一九)至於築路的資本，他也主張用外債的方法，如說：「今中國議開鐵路，當以籌款爲先，顧將籌之於官乎？而京協等餉，拮据已甚。抑將籌之於民乎？而風氣未開，集股維艱。無已，則有借洋債之一法。」(註二〇)所謂「用洋人之本，謀華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價歲減之息。」(註二一)他還力說借債築路，是爲民謀生，爲國開財，與借債行軍不可同日而語。在此點上，馬建忠與薛福成所見相同，不過薛說借外債當慎防洋人把持，要比馬看透一層。(註二二)

還有一種富民的方法是開礦。他說：「欲財常聚而不虞其或散者，則在開礦山自有之財也。」鑛產的種類很多，大概講「爲用」當推煤鐵，講「爲富」則推金銀。馬建忠是主開金銀礦的，其說路帶西洋重商派的口胳。他歷數世界金銀礦的幹脈，說中國這種礦產，所在皆有。單就山東一隅論，礦產之富可與新、舊金山鼎峙，如能通盤估算，籌措資本，勘驗確實，加意開鑿，不數年間，金銀出自泥沙而不窮。他舉出美國、澳洲開關不過百年，而鐵道與農業冠於各國，這都是開金山後聚財建設的。故堅主「中國不講求西法則已，中國而講求西法以求富，則莫如自開金礦始。不然，民貧於下，財絀於上，徒扼腕於致富之無由，而不知天不棄我，中國固藏金於山以待我之取用也。」(註二三)在各個

金銀礦中他特別注意漠河金礦，因其「逼近俄疆，出產旺盛，久爲外人覬覦。」故呈請李鴻章迅爲舉辦，遴委幹練人員，選募邊疆兵勇，駐屯淘金。其法與薛福成的礦屯相合，認爲此舉「不勞役，不費財，可固防，可制敵，內以戢匪徒之出入，外以杜強鄰之窺伺。」(註二四)漠河金礦的開採，馬氏的策畫特多。

馬氏對於釐金的問題，也有意見發表。所謂釐金（或釐捐）是清朝的一種稅制，政府在水陸要隘分設卡局，向行商貨物征稅，依貨物從價征收若干釐。原因由於洪楊之役，軍餉無法籌措，乃由各軍斟酌需用，分別施行，本是權宜之計，後風行各省，竟成正常稅收。此稅足以妨礙貿易，其徵收時弊害重重，寖假而爲擾民的一大弊政。當時輿論對之多表不滿，但惑於軍餉無着之論，多只主酌加整理。如薛福成便不過想「酌減捐數，或歸併釐卡，以爲異日盡裁之漸。」(註二五)馬建忠卻主張根本裁撤。因其時外國方要求免釐，允我加稅，加稅之額可抵裁釐之數，且裁撤釐卡，既可省財務行政費，又可便利商品的流通。(註二六)可是類是的建議並無效果，釐金的正式裁廢直延至民國二十年。

（註一）見王蘧常著嚴幾道年譜，頁七。

（註二）郭氏論洋務的奏議書疏，既被鄉里士大夫斥為「謬言」，故刊行時卻以罪言存略名。

（註三）上合肥李伯相書，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二。全部奏疏可參看養知書屋全集。

（註四）見前文。

（註五）曾紀澤乃曾國藩子，光緒四年繼郭嵩燾之後派往充出使英法大臣，於經濟方面建言較少。

（註六）容閎為最早之留美學生，後任駐美副使，兼留學生監督。曾建議設銀行築鐵路等。著有西學東漸記。

（註七）黃遵憲在滿廷歷官四十年，早年隨使日本，研究該國維新圖強之機，成日本國志四十卷。對於經濟亦有建議。限於篇幅，不詳述。

（註八）薛氏生平略見清史列傳卷五八，頁五四——五七。

（註九）時有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見皇朝經世文新編第二四冊，頁一二——一三。

（註一〇）出使期間著有出使四國奏議、出使四國公牘。

（註一一）變法，見鄭[illegible]經濟文選，頁二一八——二一九。

（註一二）振百工說，見庸盦海外文編卷三，頁一六——一七。

（註一三）治學術在專精說，見庸盦海外文編卷三，頁九——十。

（註一四）用機器殖財養民說，見庸盦海外文編卷三，頁八——九。

（註一五）礦也議，見所著籌洋芻議商政篇。

（註一六）創開中國鐵路議，見庸盦文編第二冊，頁一七——一九。

（註一七）商政，見籌洋芻議稿餘。

（註一八）富民說，見適可齋記言第一册。

（註一九）鐵道論，見適可齋記言第一册。

（註二〇）借債以開鐵道說，見適可齋記言第一册。

（註二一）見鐵道論文。

（註二二）郭嵩燾，代李伯相議請試辦鐵路疏，見庸盦文續編卷上。

（註二三）富民說，見適可齋記言第一册。

（註二四）見上李伯相論漠河開礦事宜稟，適可齋記言第四册。

（註二五）薛福成在應詔陳言疏中曾作此語。後在籌洋芻議「利權」四篇中謂爲確保利權，均不主洋貨免釐。

（註二六）見馬氏論洋貨入內地免釐，皇朝經世文新編第十二册，頁一四——一七。

第四章　維新志士的變法理想

一　康有為之大同小康義

清廷中興諸臣的富強政策，並無多大效果，而敵國外患層層進逼，中國的痼疾日見沈重，尤其是從甲午年（一八九四）失敗於日本後，使若干有心人憬憂着未來國家的危亡。在這時候，一部分開明前進的在野智識階級，為愛國的熱情所驅使，聯合起來要求清帝，企圖以改良主義的方式挽救中國，並使其富強起來。這便是現代史上的所謂「戊戌政變」。政變的主角是康有為。康氏乃粵名族之後，累代書香，少年曾立志做聖人，也曾追求過科舉的功名，中光緒乙未科進士。（註一）初時他僅深居讀書，間出遊歷，並設舍講學。後來遍讀各種新書，組織學會，會合十八省覺悟的智識份子，幾次請求少壯有為的光緒帝——「公車上書」——變法，終於在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年、

一八九八）獲得接受與信任。從該年四月到七月，光緒連下數十道詔諭，開始實行變法維新。但清廷中守舊的勢力非常頑強，不久發生政變，光緒被禁，新黨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康有為自己與梁啓超等逃亡海外。所謂「新政」不過曇花一現，只有一百天的歷史，後人有「百日維新」之稱。（註二）從此以後，他不復能有為；雖至民國十六年纔死去，不過早已不為世人所注意。但是他當年所領導的運動，是有着歷史的意義的。

康有為的全部著作，是在借着舊學的幌子陳述他的新見。他第一部書新學偽經考，在掃蕩清代盛行的「漢學」風氣，打開思想的新路。這是破壞的書。第二部孔子改制考，認為孔子是創新的思想家，其標榜三代的盛世，只在託古改制，藉此為自己變法維新作掩護。這是幫助創新的書。第三部大同書（註三）則為創新的書，也是康氏根本理想之所在。禮運「大同」上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為大同。」這是孔子的理想社會。康有為師此旨而加以新的闡述，提出他自己的理想社會。他

把春秋中的「據亂世」譬之今日的社會，「升平世」即他之所謂「小康，」「太平世」即他之所謂大同。到大同之世：（一）消滅國家，大地合而爲一。（二）泯除階級，各人地位一律。（三）不分種族，人類如同一家。（四）不論男女，享受同等人權。（五）沒有家庭，人人快樂自由。（六）廢除私產，產業收歸公營。（七）息滅戰亂，共享太平幸福。（八）不殺生物，萬物一視同仁。（九）解脫痛苦，進入極樂世界。這裏面（註四）包括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等等各種思想，可說是一種無政府共產主義（Anarcho-Communism），而因爲沒有具體實現的辦法，只是一種烏託邦。然當作烏託邦論，其理想之高遠實過於十九世紀初葉歐西的空想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梁啓超說他著述時，「一無依傍，一無勦襲，」（註五）其想像力之高強可謂超人一等。

大同書中的經濟理想即所謂「去產界，公生業，」其要義如下：（註六）

一、廢獨農行公農　「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舉天下之田地，皆爲公有，人無得私有而私買賣之。政府立農部，而總天下之農田。各度界小政府皆立農曹，而分掌之，數十里皆立農局，數里立農分局，皆置吏以司之。……各小政府……以其度界內所

出之財產，告之公政府之農部，移告之工商部，商部以全國人民所需之食品用品，統計若干。……據各分政府之農曹所報之地質出產定其農額，統計而預算之，定應用若干；因各度界之地宜，應種植牧畜魚產若干，令各度界如其定額而行之。」「若天下農田之收入，（一）則各度農曹，截留其本度應用之物品，而告之農部，農部移之公政府之商部，與各州分政府之商部，統計全地各度物品之消息盈虛而分配之。先其近者，以省轉運，近地有餘，乃遲配遠方。舉全地所出之百穀、花果、草木、牧畜、魚產、礦產，皆適足以應全地人數之所需。……是以地無遺利，農無誤作，物無腐敗，品無重複餘贏。」

二、廢獨工行公工　「大同世之工業，使天下之工，必盡歸於公。凡百工大小之製造廠、鐵道、輪船皆歸焉，不許有獨人之私業矣。公政府立工部，各部小政府立工曹，察其地形之宜而立工廠，或近水而易轉運，或近市而易製作，皆酌其工之宜而行之。」「野蠻之世尚質，太平之世尚文。尚質故重農，足食斯已矣。尚文故重工，精奇瑰麗，驚猶鬼神，日新不窮，則人情所好也。故太平之世，無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無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創新器而已。太平之世，無所苦，為工者，

樂而已矣。……太平之世，工最貴，人之爲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至於是時，勞動苦役，假以機器，用及馴獸，而人惟司其機關焉。故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勞。……太平之時，一人作工之日力僅三四時，或一二時而已足，自此外皆游樂讀書之時矣。」

三、廢獨商行公商　「太平世之商業，不得有私產之商，舉全地之商業，皆歸公政府商部統之。……商部核全地人口之數，貧窮之差，歲月用品幾何，既令所宜之地，農場工廠，如額爲之，乃分配於天下。令各度小政府立商曹，其數十里間水陸要區立商局，其數里間立商店，其曹、局、店皆有主、伯、亞、旅、府、吏、胥、徒。……合農工商三者而較之，商之用人至少矣，但有運貨、會計、振機三者。……貨無僞品，價無欺人，政府但除農工及運送之所出之本，以時酌定其價之高下，高者無過什一，下者可至百一，但以取足養十二局之人民爲度而調劑之，計其時物價之賤，可過今什百倍蓰矣。」

康有爲雖抱大同理想，憧憬共產主義社會，但他實際上只以改良爲手段，努力求建造資本主義的經濟；至政治方面，仍謹守「君臣之義」，帶着濃厚的封建色彩。（註七）不過在當時他這種思想已算是很進步而激烈的了。他在「百日維新」之中，向德宗（光緒）進呈突厥削弱記與波蘭

分滅記，炯戒不振作便要衰弱與滅亡；進呈法國革命記，警醒壓迫人民勢必引起革命；又進呈俄大彼得變法考略與日本明治變政考，啓示變法維新的先例。他累次上疏力陳澈底變法之必要。在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上疏統籌全局說：「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註八）四月，又奏請決行變法以定國是而一人心，說：「竊自東事敗後，近者膠旅繼割，國勢凌夷，瓜分日聞，幾不國矣。所以至於此者，一統閉關之治，與列強競爭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陸舟車之異宜也。今我國處競爭之新世，而行閉關之舊法，安得不危敗乎！……禮以時為大，孔子時聖，逆天不祥，違時必敗，若當變不變，必有代變之者矣。與其人為變之，何如己自變之之為安適。」故堅請「採萬國之良規，行憲法之公議，御門誓衆，決定國是，以變法維新為行政方針。」（註九）他變法的內容在上皇帝萬言書（註一〇）說得最周詳而具體。內容於經濟方面提出富國與養民之法如下：

一、富國之法有六　（1）鈔法——「今奇窮之餘，急籌鉅款，而可以聚舉國之利，莫如鈔法。令天下銀號報明資本，皆存現銀於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用精工製鈔，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

給現銀之數，而加其牢，許供賦稅鹽餉。其大者戶部皆助資本，有虧者戶部皆代擔償，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樂借國力，富戶不患倒虧，以十八省計之，可得萬萬。」

（2）鐵路——「鐵路之利，天下皆知。……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費鉅難籌耳。若一付於民，出費給牌，聽其分築。官選通於鐵路工程者，畫定行省郡縣官路，明定章程，爲之彈壓保護。凡軍務、運兵、運械、賑荒，皆歸官用。築道里遠近，人數繁寡，收其牌費，吾民集款力自能舉，無使外國收我利權。」

（3）機器、輪舟——「機器廠可興作業，小輪舟可便通達。今各省皆爲厲禁，致吾藝不能日新，製造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偸減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宜縱民爲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宜民商買交受其益；亦宜縱民行之，出費領牌，聽其拖駛，可得鉅款。」

（4）開礦——「礦富於地，中國爲最。……亙古封禁，留待今日。……吾若不開，他人入寶。

……宜開礦學，專延比人教之，且需踏勘。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二十取一而無定額稅，選才督辦而無濫私人，則吾金、銀、煤、鐵之富，可甲全球。」

（5）鑄銀——「吾宜自鑄銀錢，每刻可成大圓一千二百，而每圓之利，三分移作製造之費，猶有餘饒，利亦厚矣。請飭下戶部，預籌鉅款，並令各直省皆造鑄銀局，……由督撫選精明廉吏專司此局。……他日礦產既盛，增鑄金錢，抵禁洋圓，改鑄錢兩，令嚴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

（6）郵政——「我中國人四萬萬，書信更多，若設郵政局以官領之，遞及私書，給以樣憑，與鐵路相輔而行，消息易通，見聞易廣，而坐收千餘萬之款，退可省三百萬之驛。上之利國，下之便民。」

二、養民之法有四　（1）務農——「天下百物皆出於農。吾……田畯之官未立，土化之學不進，北方則苦水利不闢，……南方則患生齒日繁，……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吾地大物博，但講之未至。且命使者擇其（外國）農書，編於城鎮設為農會，督以農官。農人力薄，國家助之。比

較則棄楛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業自盛。……宜設絲茶局，開絲茶學會，力求振興，推求各省。其餘東南種棉蔗，西北講牧畜棉以紡織，……以及沙漠可以開河種樹，海濱可以漁網取魚。」

（2）勸工——「前大學士曾國藩手定大難，考知西人自強之由，創議開機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漸爲增設，而只守舊式，絕無精思，創爲新法，蓋國家未嘗敎之也。宜令各州縣咸設考工院，譯外國製造之書，選測算學童，分門肄習，入製造廠閱歷數年。工院既多，則器漸廣，見聞日闢，製造日新，製圖繪貼說，呈之有司，驗其有司，給以執照，旌以功牌，許其專利。工人自爲身名，必殫精竭慮，以求新製。榷徼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應國家之用者。」

（3）惠商——「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侔地利，易之則困敝。……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弊，蓋在此也。……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長於理財者，經督其事。令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廠，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採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製，且以奪其利敵其貨而已。然後蠲釐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

稅以擴商務。」

（4）恤窮——「我生齒既繁，……食之者多，……窮困無業，游散無賴，所在皆是。……宜設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墾荒。西北諸省工礦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墾殖尤甚。早謀移徙，可以闢利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民而已。……二曰教工。……宜令州縣設立習藝院，……凡無業游民，皆入其中，擇其所能，教以藝業。……三曰養窮。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盲聾喑啞，斷者侏儒，……宜令各州縣市鎮聚落，並設善院，咸為收養。」

以上所謂「富國」內容就是國家經濟政策；所謂「養民」則為國民經濟政策。他想利用籌造銀幣與發行鈔票的方法籌款，先實國庫，其言如出官房學派（Cameralists）之口，當屬幼稚而不足為訓。主張興築鐵路，開發礦產，製造機器輪船各項的目的，除了開發富源之外，還帶有保持利權並抵禦帝國主義的用意。保障商業也有這樣的用意。提倡農業改良與獎勵工業發展雖相提並論，然實際上他是力主「重工」的。他更痛詆傳統的重農思想，目為「閉關無知無欲之論；」說「國尚農，則守舊日愚；國尚工，則日新日智。」主張改舊更新，定中國為「工國」。（註一二）發展工業

之方式，認爲不妨予人民以自由，不必加以干涉禁止。至於國民所得的如何分配，他顯未注意，不過說當加以救卹而已。工業化與產業私有私營，國家採放任政策，聽任個人自由發展，這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色。救卹等社會政策，更是附帶於資本主義的改良方式。不過處在帝國主義環伺之下，國家經濟的觀念也很顯明。在大體上，康有爲的經濟思想可說是一種民族資本主義。(註一二)

康有爲這種資本主義的改革理想絲毫不曾得到實現。所有經濟的改革一定要伴着政治的改革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功，曾經長期的伏屍流血；英國資產階級「改革法案」的通過，曾經多年的奮鬪爭取。而康有爲卻想走捷徑，乘着外患煎逼的機會，假託孔子的思想作護符，再四苦求，乞得光緒的同情，想利用皇帝來實行他的改革計劃，其方法不能說不巧妙。但在充滿着封建權貴的朝廷中，內面祇有幾個毫無實力的維新派同志，外面祇有一部分智識階級模糊的同情，沒有廣大的羣衆作後盾，而想反手之間將封建社會變成資本主義社會，這在客觀上是一定要失敗的。他失敗之後，流亡海外，理當覺悟，培植廣大羣衆的勢力，以與清室分廷抗禮。但他計不出此，牢守着迂腐的君臣觀念，念念不忘光緒帝，甚至懷着保皇的思想，自己想入非非地想做「教主」。對於海外

的革命勢力，非但不去聯絡，反存心抵制，結果失掉了許多革新派的同情。清廷也不需要這種人物。於是他的失敗也就失敗到底了。

二　梁啓超之生計叢論

戊戌政變的要角，康有爲以下便要數到譚嗣同與梁啓超。譚氏的思想激底而銳進，但絕少論及經濟。(註一三)梁氏平生馳騖範圍極廣，其文集中討論經濟的文章頗不在少。梁啓超幼年好學，曾以師禮事康有爲。後康氏從事變法維新運動，梁氏聲起附和爲之鼓吹。戊戌政變發生，與康氏出亡日本，居留了十四年。他看到滿清政府已不能有爲，乃一變而主張革命排滿，不如康氏組織保皇黨，還想效忠清室，兩人從此分道揚鑣。梁氏雖企圖革命，但在起事失敗後並不堅持，改從宣傳方面努力，先後主辦新民叢報、國風報、與庸言報等。民國以後，曾組織民主黨與進步黨，並先後任司法與財政總長；因缺乏定力，僅供他人利用，沒有真正的建樹。晚年絕意政治，以講學著書終。在學問方面也因一直缺乏定見，常覺今是而昨非，少有切實的貢獻。不過他生平撰述極勤，所著總計在一千萬言

以上，其中很多興到涉筆，無關宏旨，而因行文平易條暢，並常以感情挑動讀者，在清末民初，對於一般智識青年曾發生極普遍的影響。

梁啓超起初主張變法，曾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不過他希望中國能自動的變，不要像土耳其、印度、波蘭那樣被動的變。他認爲中國過去變法之失敗，由於不知事原。他自謂：「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註一四)後來進而提出他比較有系統而有建設性的「新民說。」(註一五)首先說明新民之重要：「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其次解釋新民之意義：「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以後又論新民之根基，

在內治方面須人民個個自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在外交方面須實行民族主義，「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新民說的內容，大部份在論致治與倫理，論經濟的只有「論生利分利」一篇而已。

梁氏認爲目前中國窮困的原因，不是由於缺少土地與人力，而在乎將資本、勞力用於無益之所。他先提出一個原則：一國的資本勞力用於生產，則母財再生子財，國家日富；用於消耗，則母財日漸損蝕，國家日貧。再用以說明中國的情形，說中國人口四萬萬，婦女約佔半數，其中十之六七分利，男子二萬萬，老幼者大多分利，丁男中也有不少分利者，計算分利者約二萬萬一千萬，分利者多而生利者少，遂致國富日就枯竭。此意大體本自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之義，再旁參亞丹斯密生產勞動 (Productive labour) 與不生產勞動 (Unproductive labour) 之說，加以引申並應用而成。(註一六) 他又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說到農工商各業都呈衰落凘滅的現象：(一) 工業憔悴。過去舊式工業雖能苟存，然自被歐美工業革命的洪流所淹沒，欲避不能，舊工業的衰落，日甚

一日，新工業之建設，杳無其期。」資本耗損，或將全國人淪爲外國資本家的勞動階級。（二）商業幼稚。一國生產力的增進，一靠精良的技術，二靠雄厚的資本，而中國還兩項都很缺少，故生產事業不發達，國產貨物很少，商人多販運外貨，中國現存的商業只是外商的輔助機關。（三）農業衰落。所謂廣義的農業，如採製茶、糖、橡膠等的海外市場已被侵奪，所謂狹義的農業，如種植五穀、果蔬等，在平時只夠農民生活，遇災荒即將發生饑饉，加上租稅苛重，農民廢田不耕者日益增多。長此以往，「富者就貧，貧者就死，因窮召亂，因亂益窮，」所見的將只是恐慌、破產、災變、饑饉、盜賊、屠殺，瞻念前途，他抱着無限的杞憂。（註一七）

對於經濟制度，他並沒有具體的見解，不過在敍述西洋經濟思想史（註一八）的按語中略抒他的感想，表示中國應仿行重商學派的干涉政策，而不能採取亞丹斯密的放任政策。他說：「按重商主義，在十六世紀以後之歐洲，誠不免阻生計界之進步。若移植於今日之中國，則誠救世之不二法門也。中國地大物博，民生日用之所需，可以無待於外。外貨之流入中國也，以其機器大興，故成貨之勞費少而成本輕，製造巧而品質良也。使我能備此二長，則吾國所自產之物，必足供吾國人所求而

有餘；雖關稅稍重，客貨價騰，而必不至病民。是阻遏於所入之策可用也。中國人口最庶，工價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無俟遠販於外，但使能有各種機器，使其質之良，足與客貨相埒，則成本之輕，必自過之。如是則不惟在內而可以為守，抑且對外而可以為戰。是獎勵於所出之策可用也……故今日如實行所謂重商主義者於中國，其勞費必滋少，而結果必逾良，有斷然也。」又說：「案斯密此言，(註一九)蓋針對歐洲當時治體而言也。彼時承重商主義極盛之後，各國政府專以干涉為政策，干涉之敝，民失其情，物失其理。……若我中國，則政府之與民業，向來漠不相關切，以云自由，則中國民之自由極矣，而其敝又若此。故斯密之言，治當時歐洲之良藥，而非治今日中國之良藥也。……況乎今日帝國主義日行，各國之民業皆以政府為後楯，以出而競於世界，當其鋒者，又豈以一私人之力而能奏效也。」梁氏認為中國要發達產業，不能用個人自由的方式，當採用政府保護的方式，當然不錯，但說要把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移植於今日之中國，當作救世之不二法門，這種思想不免落伍。因為重商主義在今日經濟思想界，早已成為公認的謬誤陳說了。

對於財政金融，梁氏著論很多，且曾一度出掌財政之職。他也看到今日世界的大問題是經濟

問題，而與國民經濟關係最深的是財政。他並無整個整理財政的計劃，而對於局部的問題，則頗有些可取的見解。如談到政費，雖不主張消極的節約政策，然認爲欲度過目前的危局，政費不得不加節省，應以「必要政費」爲範圍，其標準如下：第一、以國家職務最狹之範圍爲標準；第二，以各種職務必要及有益之程度爲標準；第三，以辦理此種職務所需最少之勞費爲標準。(註二〇)關於租稅方面極少論及，只主張食鹽由政府專賣。(註二一)他很提倡發行內債，認爲這是近代財政上的一大妙用，不但增益國計，還可滋長民生。至於外債，宜用以充實準備、確立幣制、整理舊債、改正租稅、開設銀行、與興築鐵道，不可用以塡補政費與擴張軍備。(註二二)他亦知中國缺乏資本，在原則上贊成利用外資，但指出當時政府名爲利用外資，實則消費外資，徒供少數盜臣絮樂之用，而且動機在利用外資，結果反爲外資利用，招致列強干涉財政，對之極爲憂慮。(註二三)他看到立憲國家都把預算案當作第一大事，故說編製預算爲理財第一要義。在幣制方面，他論述很多，(註二四)認爲不論就國民生計、財政、及政治、或對外政策上說，中國幣制均須從速確定。對於本位問題，他曾一度躊躇於金銀之間，最後主張採用虛金本位制 (Gold Exchange Standard)；理由爲銀本位爲各國放棄，中國行

之弊多利少，金本位利多弊少，然中國實力不能卽刻採行，最適宜於目前中國的是虛金本位。故曾斷言：「我國苟不速行虛金本位制，則全球之銀塊，將悉以我爲尾閭，銀等於瓦礫，而米薪則等於珠桂矣，可不懼哉！」（註二五）

梁啓超的思想非常駁雜，而也已體察到經濟的重要，曾說：「吾敢言我國之生計社會，實爲將來新學說最好之試驗場，而我國學者對於此問題，實有最大之發言權，且尤當自覺悟其對此問題應負最大之任務。」（註二六）他的經濟思想並不是守舊的，可是往往反覆不定。如他一時介紹聖西門（Saint Simon）的社會主義說，驚歎澳洲新內閣的土地政策，不久又評爲空想不合實際。他一面讚頌先秦諸哲的思想近於社會主義，謂二千年來經濟組織之均平實受其賜，且對於管子、王安石富國養民之說，大事揄揚。（註二七）但當中山先生等提倡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的時候，他卻多所詆譏，甚至說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等等，這不免是黨派門戶之見。而因爲他論爲世法，在青年人腦中常留着不正確的印象。梁氏之筆，論世務往往能切中時弊，而做學問卻駁雜膚淺。關於此點，他曾自己說：「啓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

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註三八)這幾句話可說有自知之明的，所以在經濟思想方面也不會有重大的貢獻。

三　嚴復之西學圖強觀

嚴復並沒有參加康梁所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他是在同時候單獨地闡發維新圖強的理想。嚴氏係福建產，(註三九)十四歲時考入沈葆楨所辦的船政學校，以文章優美為沈所賞識，畢業後派在「揚武」艦實習，英籍船長德勒塞 (Commander Tracey) 臨別贈言，說學問不以畢業為終點，勸他繼續自求，則新知無盡。這幾句話在他少年時的腦筋中影響很深，於他以後的治學影響頗大。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派往英國，肄習各種海軍學術，對於西洋國家的思想制度，也悉心研究。當時日本所派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與嚴同學，論成績均不及他，而歸國後都為政府重用，利用他們的智略奪我藩屬。嚴復卻不過在北洋水師學堂當一教習，不能展其才學為國運籌。甲午之戰，清政府受到痛切的教訓，光緒銳意變法圖強，網羅各種人才，嚴氏亦被薦引，他上萬言書，認為中國

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修理內治惟有變通舊法，變法圖強須標本兼治，治標在乎理財、經武、擇交、善鄰，治本在乎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並說變法之前，亟宜做到三點：一曰聯各國之歡，二曰結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註三○)所陳出自衷誠而合乎治理，惜因中謂破把持之局一點干守舊大臣之怒，遂留阻不得上達。嚴氏在政治上不能得志，就專心治學，從哲學、倫理學、生物學、以至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無所不窺，且每須求得其會通而後已。這種精神至老不衰，他的才識終於改從思想上表現了出來。

一個國家要從事維新，須有新思想為之嚮導。中國的改用「新」法，大體是採仿「西」法，故嚴復企圖從事改革不成，退而以譯著開風氣，對於中國的維新仍有間接的貢獻。中西交通以後，國人介紹西籍的不自嚴復始，明崇禎時徐光啓、李之藻等即有譯述，其範圍限於天算。清同治時，上海製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京師的同文館，也有譯述，而多屬於測量製造。梁啓超對於西洋思想雖多介紹，但多從東文轉述，且漫無選擇系統。不比嚴復留學英倫，精通西文，直接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禮，同時國學也很淹博，行文精鍊入神，足以譯述西洋名著而盡「信、達、雅」之能事。即梁氏也深為推

崇他曾謂「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復其首也。」(註三〇)其所譯先後計八種：(1)耶方斯名學淺說 (W. S. Jevons, Primer of Logic)，(2)穆勒名學 (J. S. Mill, System of Logic)，(3)斯賓塞羣學肄言 (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4)甄克思社會通詮 (Edward Jenks,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5)約翰穆勒羣己權界論 (J. S. Mill, On Liberty)，(6)亞丹斯密原富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7)孟德斯鳩法意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8)赫胥黎天演論 (T. H. Huxley, Evolution of Ethics)。這些都是西洋近代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國家的標準著作。

嚴復西學的根基在乎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的進化論思想。他在天演論導言中說：「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為尤著。」他從進化論的觀點檢討國家的盛衰原因，在政治講義中說：「吾黨之治此學，乃用西學最善最新之塗術。何則？其術乃天演之塗術也。吾將取古代歷史所有之邦國，為之類別而區分。吾將察其政府之機關，而各著其功用。吾將觀其演進之階段，而考其治亂盛衰之所

出。最後吾乃覩其會通而籀爲政治之公例。」他進而在「原強」一文中指出中國競爭圖強的途徑說：「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東事敗衄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厲者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局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雜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達爾文曰：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物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夫如是，則中國之所宜爲，大可見矣。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得自由，尤自其各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之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註三二）嚴氏表明中國要圖富強，單採取西洋物質文明是不夠的，必須傚法非整個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在政治上是「自治」的民主主義，在經濟上是「自利」的自由主義。

在經濟方面，他並無專門的著作，不過在所譯的原富案語中，以及其他少數零篇中，可以看出

他自己的思想。他推崇亞丹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而非難西洋重商派與國內財政官的政府干涉政策，說道：「爭進出差之正負，斯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雲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過於英國者乎？有外輸之獎，有掣還之稅，有海運之條例，此皆為抵制設也。而卒之英不以是而加富，而延緣而失美洲。而自斯密論出，乃商賈亦知此類之政，名曰保之，實則困之，雖有一時一家之獲，而一國長久之利所失滋多。於是翕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保商專利諸政，既非大公至正之規，而又足沮遏國中商業之發達。是以言計者羣然非之，非之誠是也。」（註三三）不過他認為有些專利與公共事業是應許可並提倡的。關於前者，他說：「辜榷專利之事，為斯密氏所深惡。誠哉其足惡也。然而有時以通國公利而論專之愈於不專。此如創機著書諸事，國家例許專利。非不知專利之致不平也，然不專利則無以獎勵激厲人莫之為，而國家所失滋多，故事許之。至郵政電報諸事，其利宜專以國家，奮有大益於賦稅，不可一概論也。」（註三四）關於後者，他說：「國功為一羣之公利，凡可聽民自為者，其道莫善於無擾。此不獨中土先聖所雅言，而亦近世計家所切誡。顧國家開物成務，所以前民用者，又有時而不可諉，諉之則其職溺矣。約而言之，其事有三：一，其事以民為之而費，以官為之則廉，此如郵政電報

是已。二，所利於羣者大而民以顧私爲憂爲，此如學校之應田，製造之獎勵是已。三，民不知合羣而羣力猶弱，非在上者爲之先導，則相顧趦趄，此則各國互異而亦隨時不同，爲政者必斟酌察度，而後爲之得以利耳。」（註三五）他對於西洋資本主義生產效率貿易自由心頗嚮往，而其分配不均的現象也已看到，故作如下之說：「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之學行，制作之精，實爲亙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機，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汽舟、鐵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於奸雄之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倘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爲宗旨，所以強豪雖盛，尙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註三六）

講到國民經濟，他認爲徒儉與奢靡都不足取，而自定一折衷的儲財與消費標準：「理富之術，在一國之母財支費相酌劑爲盈虛。……國之務富者，所以輔民善治也，家之務富者，所以厚生遂種也，皆必財之既用而後得之。藉曰不用，則務富之本旨荒矣。此支費之所以多爲貴也。顧事必求其可長，而養必期其無竭；且國之戶口，既以日滋，則財之爲物，亦必日進以爲之相副，此又深慮遠蓋藏積

聚之民，所以又爲一羣之母也。財如藁然，其尊尙支費而不知母財之用者，獲而盡食者也。其獨重母財而甚嗇支費者，譬所收以爲子種者也。二者皆譏，獨酌劑於母財支費二者之間，使財不失其用，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則庶乎其近之矣。」(註三七)論到人口問題，他顯然受馬爾薩斯影響。對於中國人口的增殖，他深致憂慮，曾說：「往往一人之身，餬口無術，娶妻生子，視爲固然。……而國家又無移民之法，積數百年，地不足養，循此大亂，積骸如莽，流血成渠，暫者十餘年，久者幾百年，直至人數大減，其亂漸定。乃並百人之產，以養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爲盜賊，而天下相安。生於民滿之日而遭亂者，號爲暴君污吏。生於民少之日獲安者，號爲聖君賢相。二十四史之興亡，以此券矣。」(註三八)他以人口之增減解釋歷代治亂興亡的原因，固有一部分的眞理，若說統治者的善惡也全爲人口多少所決定，不免是機械的論調。

氏於國際貿易雖在原則上相信是互惠的，但看到中國的生貨出，熟貨進，不能不感覺憂慮，說道：「所云農工商三業之困，求之中國，幾於無地無之。地之不闢，不必西北，雖吳楚財富之區，往往而是。二十餘口所出，大抵生貨，則工業幾於無有。不但衰也彼有來舟，我無去筏。即至絲茶大利，亦聽他

國之奪其市，未嘗一考其由然。官不爲民謀，民不爲己謀，國自以庶，而養民理財之計若一任天運之自然者，其貧且弱。非不幸也。竊謂補救之施，在農工難而在商易。國家於東西各國，既遣使臣各居其國矣，及其閒暇，訪求其國所可銷售之華貨。數年之後，自置輪船，運銷各國。母財誠少，不妨先爲其徵者，俟其利可恃，而後徐徐擴充之，奪他族之壟斷，開無窮之利源，不能不有望於後之人也。」（註三九）他一方面對於以後國家商業的振興懷有希望，但同時對於後日在列強窺伺下國步的艱難抱着恐懼：「夫中國雖於今爲耎國，而終爲外人所嚴憚；而恐爲子孫憂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廣大，物產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以是二者爲之資，設他日有能者導其先路：以言通商，則轉物材以爲熟貨，其本輕價廉，以奪彼歐人之市有餘。以言兵戰，則堅忍耐戰，則人懷怒心，決非連雞爲棲者所可及。而是二者之中，其前一尤爲歐人之忌。故今日之故步自封，雖笑譏鄙夷，而實則彼之所禱祀以求者也。設一旦吾之民智日進，天誘其衷，幡然改之，吾知彼方奮其沮力，以與我爭一旦之命，其必不坐視以聽我之精進又灼然可知者矣。嗟乎！二三十年以往，假炎黃種族，猶足以自存，則吾之所以與彼力爭者方熾。立後來之基址不難，去當前之阻力難！去當前之阻力難矣，而救前人之失計乃尤難

也!」(註四〇)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所希望的沒有兌現，而他所恐懼的卻已臨頭了。

嚴復在早年中年都主張變法，甚至說「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變法是要「痛除八比，而大講西學。」(註四一)他警告國內士大夫不能再藐視西洋的富強：「夫士生今日，不覩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眞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註四二)倡言自救自強，端在講求西學：「驅夷之論，既爲天下所廢而不可行，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爲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謀亦在此。」並相信以西學圖強必獲佳果，曾說：「早一日變法，早一日轉機。……中法之必變，變之而必強。」(註四三)在這些話中，他對於西洋文明的價値，是深信而不疑的。可是到了晚年，看到歐戰的殘酷，這種信念已見動搖，而重新尊重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曾說：「吾垂老親見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歐人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眞量同天地澤被寰區!」臨終遺囑上還有「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的話。足見他過去對於西洋資本主義文化的弱點並不曾看透，

所以晚年纔有這樣的失望。他前後思想的改變，正反映出自由主義的繁榮與沒落兩個時期。

（註一）參閱梁啟超著：康南海傳。

（註二）參閱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

（註三）大同書的著作，早於康氏早年游學西樵之時，旋少示人，後應其弟子梁啟超之請，曾以其三分之一刊於不忍雜誌。其全書直至康氏死後，由其弟子錢定安校刊，交中華書局出版，時在民國二十四年。

（註四）Sobei Mogic and H. Vere Redman 謂康氏的大同書乃「孔子主義之新解」(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兼帶「國際平等組織之理想」(Ideal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n equal society of states)。見二君合著 The Problem of the Far East, 1935, pp. 285–286。

（註五）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頁一三五中曾作此語，并譽為豪傑之士。

（註六）見大同書原著庚部頁三五三——三八二。

（註七）梁啟超說：「有為雖著此書，然祕不以示人，亦不以此義教學者。謂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有為始終謂當以小康救今世，對於政治問題，對於社會道德問題，皆以維持舊狀為職志。」見清代學術概論頁一三六。

（註八）引自戊戌政變記頁一一。

（註九）請告天祖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見戊戌奏稿頁一三〇。

（註一〇）上皇帝書第二，見鄭編晚清文選頁四二〇——四三四。

（註一一）請厲工藝獎創新摺，見戊戌奏稿。

（註一二）俄國革命理論家 Radek 說：「康有為的奏摺實質上是『未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綱』是『資產階級改良式的政綱』；也有他的見解，但看得太機械些罷了。」參閱所著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第一〇節

（註一三）譚嗣同才氣縱橫，因參與「新政」三十三歲在戊戌政變中被戮，為有名「六君子」之一。其著作最重要的是「仁學，」內未及經濟，其他僅有一二零篇，主張廢除釐金而試行印花稅，見譚嗣同集。

（註一四）氏著變法通議，見鄭編晚清文選，頁四五二——四六一。

（註一五）見飲冰室全集（中華書局版，）第一、二、三冊新民說。

（註一六）論生利分利，見飲冰室全集第二冊，頁二七——四一。

（註一七）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見全集第十五冊，頁一九——三四。

（註一八）生計學說沿革小史，第五、第九章，見全集卷五，學說下。

（註一九）按所謂此言係指亞丹斯密攻擊政府干涉失計之語。

（註二〇）節省政費問題，見全集之十四，頁一四——二四。

（註二一）改鹽法議，見全集之十五，頁九——十九。

（註二二）公債之先決問題，見全集之十六，頁一——一四。外債平議，見全集之十七。

（註二三）利用外資與消費外資之辨，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見全集之十四。

（註二四）中國貨幣問題內就美人精琪（Jenks）的條議加以據譯闡述，見全集之十四余之幣制金融政策，幣制條議，見全集之十八。幣制條例之理由，見全集之四八。

（註二五）將來百論（三）銀價之將來，見全集之四〇，頁五〇

（註二六）見所著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八〇。

（註二七）梁氏曾著管子評傳與王安石評傳，闡發管仲與王安石之政術，對二氏的經濟政策，稱頌備至。

（註二八）見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九。

（註二九）嚴氏生平見王蘧常著嚴幾道年譜。

（註三〇）上皇帝萬言書，見鄭編晚清文選，頁六三七——六四八。

（註三一）見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六二、蔡元培也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者，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見氏著中國五十年之哲學一文。

（註三二）見擬強，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頁五八——五九。

（註三三）見原富譯事例言，頁三——四，嚴氏因篤信自由貿易，於各國交利無損之說，故對於國內林則徐、魏默深以下所深愛的偏庇，認為可以不必顧慮，見同書頁四七八。

（註三四）文中所謂「壟權，」原文 Monopoly，今譯「獨占」或「壟斷，」見原富頁四七九案語。

（註三五）所謂「國功，」原文曰 Public works，今譯「公共事業」或「公共工程，」見原富頁七二四案語。

（註三六）見原強，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頁五六。

（註三七）原書頁三五〇案語。

（註三八）見如有三保文，轉引譚丕模著清代思想史綱頁一四七。

（註三九）原書頁三六五案語。

（註四〇）原書頁六四三案語。

（註四一）救亡決論，見鄭編晚清文選頁六七〇——六七二。

（註四二）論世變之亟，見前書頁六七〇。

（註四三）救亡決論，見鄭編晚清文選頁六七六。

第五章　官商鉅子的實業方案

一　盛宣懷之鐵路國有案

清代在發動新政之初，所最注意的西國利器是槍礮輪船。所謂洋務，也不過設立機器局船廠而已。後因屢受外患的教訓，朝中大臣的主持，駐外使節的建議，學士大夫的鼓吹，觀念漸漸改變，覺悟到產業於國計民生的重要。迨至清朝最後幾年，朝野對於開礦、築路、設廠各事，都急切地進行。就以鐵路而論，現存國有的重要鐵路，如京漢、津浦、正太、道清、汴洛、滬寧、滬杭、廣九、粵漢，都是在那一時期築成的。再就礦產而論，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礦政調查局成立，各種煤、鐵、油、銅礦產，官商都次第興辦。其中特別著名的有開平、開灤、與漢冶萍等。至講到實業，許多軍機大臣都很提倡，並加保護，如載澤的奏設商部，袁世凱的創立工藝局，端方的籌備南洋勸業會等。在這時期中，於產

業方面特別值得提出的有盛宣懷與張謇，前者可以代表官營的事業，後者可以代表商辦的企業。

盛宣懷初時只任知州與道員，因贊畫輪船招商局與開採湖北煤鐵礦，得李鴻章的信任，命他爲其專理鐵路電報事宜。盛有智略，辦理航業與電報等，很能集華商勢力與外商抗。張之洞激賞其才，自己因辦漢冶萍礦負債很重，想利用盛氏之能替他彌補虧空，於是保舉他督辦鐵路總公司。從此盛氏得與路政發生關係，且因路礦而致鉅富。而且夤緣親貴，結好載澤，官至郵傳大臣。宣統三年提出鐵路國有計畫，爲當局所采納施行，不意結果釀成禍亂，他也因而被譴去職。不過他在任內，運用他的名位才略，於各種新興事業中，從電報、鐵路、礦產、紡織，到銀行、幣制、稅務、外交，以至學校、紅十字會，都有其不可蔑視的業績。（註一）

盛宣懷是一個經營實務的人，很少高遠的思想。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他在入覲時，奏陳自強大計，（註二）謂練兵、理財、與育才宜交互爲用，中論理財，認爲不外開源節流二義，而目前設廠不敵洋產，開礦難濟急需，開源不得其道；他方面單併局卡裁小費，節流無裨大用。他認爲欲求挽外溢，足國而不病民，宜實行下列數法：第一、停收釐金，提高關稅，開征印花稅：「應機決策，莫若逕免天下中

途釐金，加關稅爲値百抽十……釐金既免，即仿行西國印稅之法……計加收之關稅，新收之印稅，合之當倍於釐金，而免釐則出口貨易於流通，加稅則進口洋貨或稍減；取盈防損，利在無形。」第二、創辦銀行，舉借國債：「西人聚舉國之財，爲通商惠工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中國亟宜仿辦，毋任洋人銀行專我大利。中國銀行既立，使大信孚於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窮。仿借國債可代洋債，不受重息之挾制，不喫鎊價之虧折。」第三、鑄造銀元，統一幣制：「墨西哥國以九成之銀鑄錢運行中國，易我十成之銀，歲耗以萬億計。近來中外臣工，多議自鑄銀元，……今宜在京師特設銀元總局，以廣東、湖北、天津、上海爲分局，開鑄銀幣，每元重京平九成銀一兩，再酌鑄金錢及小銀錢，使子母相權而行。凡出款俱用官鑄銀幣。各省關收納地丁、錢糧、鹽課、關稅、釐金，俱收官鑄銀幣，元寶小錠概不准用。惟收款仍照庫平十成銀計算。庫平較京平定以每百兩加平六兩，十成銀較九成銀每百兩應加色十兩。除各庫上兌津貼銀一兩，定以每百兩加色九兩。如應交庫平足銀一百兩者，實收銀幣壹百十五元。無輕重高下之別，無減平扣色之弊，易見理得，婦孺難欺。每年度支八十餘萬兩，戶部約可盈餘平色銀一千二百萬兩，較向來各省報解平餘多收當不下千萬。」此外各種商業，他主張由商部戶

部會同採取西法，保持利權，商民既富，國君與國家便不患不能富強。

關於創辦銀行，他還附片加以申論。（註三）他看到西洋的銀行流通一國貲金，應上下供求，法意比本國票號錢莊周滿。又看到通商以來，國人不知開創，致被英、法、德、俄、日本的銀行來攘我大利，故說「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辦理方式，不主張官辦，因官吏辦理易生流弊，且若依靠外國資本，將損失主權；而主張歸商辦，合天下之商力以辦天下之銀行。由政府「遴選各省公正殷實之紳商，舉爲總董，號召華商，招集股本銀五百萬兩。先在京都、上海設立中國銀行，其餘各省會各口岸以次添設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經理。……並照匯豐銀行規制，以精紙用機器印造銀票，與現銀相輔而行，按存銀之數爲印票之數，以備隨時兌現。」等將來官商互相信託，再變通籌設國家銀行。

對於鐵路一項，盛氏致力最深，前後充鐵路總公司督辦與郵傳大臣，許多鐵路是在他主持下興辦的。當時朝野對於鐵路興辦的方式意見很多：有的主張官本官辦，有的主張商本商辦，有的主張招合洋股，有的主張借用洋債。盛宣懷一一加以批評，自己提出四項辦法（一）請特設鐵路總公

司，先造盧漢幹路，其餘蘇滬、粵漢等處亦准該公司次第議請展造，不再另設公司。這樣不但國內步調可以統一，外人也不能再自定勢力範圍。(二)請由鐵路總公司招集商股四千萬兩，在開始時先加入官股三百萬兩，以為提倡。(三)請由公司先借官債本銀四十萬兩，洋債本銀八十萬兩，以後分二十五年歸還，每年每股只須付本銀三兩便足。(四)請鐵路依公司章程公舉董事三十六人，再由他們舉出總經理與總工程師，以除卻官場習氣。簡單的說，鐵路宜由商辦，政府不過負提倡領導之責而已。(註四)

這是他初期的主張，到後來又改變了。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有給事中石長信奏稱各省商辦鐵路的弊害，應將全國幹路定為國有，其餘支路仍准各省紳商自辦。朝命郵傳部核議。盛宣懷覆奏贊同石某建議，請求明降諭旨。清廷據此於四月十一日宣布幹路收歸國有，枝路仍准商辦。其上諭道：

「……中國幅員廣闊，邊疆遼遠，袤延數萬里，程途動閱數閱月之久。朝廷每念邊防，輒勞宵旰，欲資控禦，惟有速造鐵路之一策。況憲政之籌謀，軍務之徵調，士農之運輸，胥賴交通便利，大局

始有轉機。熟籌再四，國家必得有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資行政，而握中央之樞紐。從前規畫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准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鉅，參追無着；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脂膏，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累，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辦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銷。…………」

這便是所謂「鐵路國有」政策。詔下之後，盛宣懷即與內閣議定築路辦法，根據已成各路，分為四大幹線：自京漢南達粵漢為南幹線，自京張北接哈克圖為北幹線，京奉東連齊齊哈爾達琿春為東幹線，正太西通同蒲至伊犂為西幹線。同時他與四國銀行團簽約借款一千萬鎊，想先將粵漢、川漢鐵路收回，再以次及於蘇、浙、皖、閩、晉、豫諸路。收回時償還路股的辦法，計分還現款，給保利股票及給無利股票三項。這些辦法宣布之後，川、鄂、湘、粵幾省紛起反對，紳商股東因切身利害所關，反對尤

力、羣起組織保路會抵抗，並散布「借債賣路」「路亡地亡」之說。盛因有皇族親貴做後盾，堅不爲動，政府且用格殺亂黨的方式彈壓。於是引起所謂川亂，給武漢及各地革命以絕佳的機會。結果非但鐵路國有政策不能貫澈，連延續二百六十八年的有清國祚也從此覆亡了。

二　張謇之棉織政策

中國士大夫向不樂意做實業家，許多人提倡實業都站在官場的地位。張謇卻屬例外，他以平民資格創辦實業，至於做大官是成功以後的事。張氏生於南通籍的貧農之家，早年趕考科名，因門第不高，備受奚落。二十四歲入提督吳長慶幕，隨同出征朝鮮，歸後鄉居從事耕讀，辭謝督撫各方聘請，專心辦理地方各種社會事業。四十二歲考中狀元，留居京師，因恥見官場逢迎醜態，毅然棄官還鄉，堅信救活中國惟有實業與教育。通州乃產棉之鄉，大批棉花爲日人廉價收去，利用中國便宜的人工紡織紗布，轉賣於我，取其厚利。他觸目興感，決計自設紗廠，開始時籌措極難，經其堅苦奮鬭，五年後所辦大生紗廠漸有起色。於是替工人造住宅、開學校、設醫院公園，而油、麵、鐵各廠也次第成立。

又手創通海墾牧公司，在原野廣種原棉；積辦漁業鹽業公司，盡通海一帶漁鹽之利。他以實業所餘用於各種社會事業：教育方面有小學、師範、商船、農、醫、紡織各科學校，地方自治方面有水利、團練、新村、慈善各種事業。二十年工夫，將一個偏處海隅的南通改造成爲中國的一個實業區，東南的一片樂土。凡外賓前往參觀的，都稱贊他的事業。（註五）

張氏的經濟思想，在他所著的「變法平議」（註六）中表示得最爲詳盡。他在原則上主張變法，自己提出各項變法意見，凡吏部之事十，戶部之事十二，禮部之事八，兵部之事四，刑部之事四，工部之事四，其中戶部、工部之事俱屬經濟範圍。所謂戶部之事，即財政政策。內分十二點：（一）徵地丁圖籍。「今聯軍入京，新修會典之圖已燼，宜及此時，令各州縣用測繪學生，核實測量繪圖，定以程限予以器式。」（二）須權度法式。「泰西各國言度量權衡者，咸推法國……今各國皆有畫一之美。……宜由戶部準舊制校定權度升斗斛之長短大小輕重，範銅爲式，分頒各省布政使。」（三）行金鎊改錢法。「宜與各國約，照英鎊鑄用金圓……宜仿禁生貨，廣鑄龍元。……宜仿日本成範，鑄行銅圓。兼具是三者，金錢行而鎊價均，銀圓行而市價平，銅圓行而私燬清。」（四）立銀行用鈔幣。「各省布

政司，宜各設一官立之銀行：凡賦稅所入，悉匯湊焉。……其用鈔幣之數，視本加三成，施行廛市。」(五)行豫計。「凡歲出若干，凡歲入若干，出入相抵不足若干，應增入若干，事前預算，揭告於衆，事後決算，揭告於衆。」(六)訂稅目。「令如以一切耗款陋規，分歸各稅正額。月揭細數，歲揭總數，而告於人，則不暗。收稅之官，日有定晷，與民直接，事有定法，與民易知，則不隔。」(七)改鹽法。「仿唐劉晏及印度法，稅無零釐，悉加價內。……寓稅於價，則收稅簡，價必有稅，則市價平。」(八)定折漕。「漕折定，而漕項之費可省，漕董漕剩幫官押運之費可省，漕督糧道之官可省。」(九)行印稅而裁釐金。「裁釐卡以行印稅，……分令各府、州、縣賦稅官飭各業立稅會承領總數，行用印花。」(十)集公司而興農業。「欲集公司，先由官勸。有應勸者，令其按地繪圖，開方記里，自擬私集公司舉辦利益章程，白於各府、州、縣農商官，勘視虛實，爲上於農商道，訂定給之。」(十一)清屯衞田。「屯田清而衞官汰，歲約可省數萬兩。」(十二)收僧道稅。「僧道不擾之可也，而今獨蕩佚於法外則不可，擬收其稅。」所謂工部之事亦即工業政策，內分四點：(一)開工藝院彙博覽所。「各國之言工學者，新理日出。……大學院有工科，特設有工業學校，技術學校。宜於沿江沿海省會各通商大埠，仿設數處，以興製造。而博覽

會尤有益於工良楛並陳生競心，新奇多見生巧思。……宜令鼓舞商人，於各業公會款內，量集專款，設博覽所。」(二)行補助法廣助力機。「機器之助力多方。……日本民間用風力、水力、電力以製造就地生貨者頗多。……中國變通舊法，即可仿行。」(三)勸集礦路公司。「合則必立公司，而民智之待人而開也。各省量各府、州、縣礦產最旺便利無礙之區，先立一官局，訂延礦師，先開以爲倡，聽紳民附股，辦事兼用官紳。……鐵路則大幹而外，官不能盡開。……並應勸集公司，聽民自辦。」(四)講求河防新法。「變河之法，尤宜以測量爲本。宜特設河工學堂，招學生六七千人，學測繪工程之事。」以上各節是他中年所立的綱領。因爲他很崇實，所列都是具體方案，而且以後在他職權及能力範圍一部分已經付諸實施：如改製度量衡，改訂鹽法，從事導淮，創辦南通大學及河海工程學校等。

張氏提倡各種實業，其中特別注重農業。他說：「竊自中日事定以來，海內之士，識事務者，無有不以練兵與通商爲急務。……臣竊上溯三代，旁考九州，凡有國家者，立國之本不在兵也，立國之本不在商也，在於工與農，而農爲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有固然。」（註七）繼徵引西報所言中國今日所有之土田，若行西國農學新法，歲增入可六十九萬一千

二百萬兩。故以爲國家有此地寶，人事大有可爲，今日不必憂慮二百兆賠款，而當以二十三省山林川澤田野不治之可憂；不必急急於開捐加釐興建海陸軍，而當實行蠶桑樹藝畜牧製造之業。振興農業的辦法，他提出四點：「一、久荒之地，聽紳民召佃開墾成集公司用機器耕種。一、未墾之地，先儘就近之人報買。一、凡開墾之地，援照雍正元年上諭水田免賦六年旱田免賦十年之例，變通爲免賦三年免賦五年。一、報買升科，戶部及各衙門費宜明定成數，杜胥吏挑剔需索之習，釋民間繳價退沮之心。」（註八）他極力提倡公司組織，因其可以實行大量生產，增加生產效率，且有「甚願天下凡有大業者，皆以公司爲之」之語。（註九）

張氏重農，但與傳統的重農輕商思想不同，他說「大本在農而入手在商，」所謂商，其實還包括工礦各項。他爲挽回本國利權，幾傾半生精力，經營一種最重要的輕工業——棉紡業。甲午以後，外貨輸入年年增加，中國的漏巵日大。他對於這種情形非常關切，要想明白漏巵究有多少，便去搜集海關的歷年貿易冊，從這裏面決定了他棉鐵救國的信念。曾說：「宣統二年，南洋勸業會開幕，審既與各行省到會諸君子，發起聯合研究會；乃蒐光緒一朝之海關貿易，參考其大略，如寐始覺，如割

始矯，……謇之投身實業亦十五年矣。此十五年中，見一物輸入日增，則色然驚，瞿然思，諄諄然勸人之興其業而塞其漏。世亦聞有應者，而不知皆麟爪也。景星慶雲，不如風日雨露之生物，精金美玉，不如布帛菽粟之利人。凡事不能通於齊民，不能無阻，凡利不能及於婦孺，不能大有功，古今已事，豈不然哉。然謇亦遲至今日而始能確定其說。……至柔惟棉，至剛惟鐵，神明用之，外交內治裕如，豈惟實業。」(註一〇)可見他確信棉鐵不但是實業之中心，而且是富強的基本。他這種信念，以後益加堅定。民國二年，出任農商總長，他即正式宣布「棉鐵政策」如下：

「……謇對於實業上抱持一種主義，謂為『棉鐵主義』。以為今日國際貿易大宗，輸入品以棉為最。各國棉工廠紗錠數目，英美各國無論矣。近考之日本，土地面積少於我二十倍，人口少於我八倍，而紗錠至一百七十三萬一千五百餘錠。而吾國合中外之廠，僅八十一萬。查近十年中海關貿易冊，棉輸入額多至一萬八千餘萬。此乃按海關估價，核之市價，近且及倍。鐵需要極大，而吾國鐵產極富。以至富之礦產，應至大之需要，歲可得數千萬。一出一入，相差之度不可以道里計。贏數萬萬與絀數萬萬，在國民生計上當受何等影響，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欲贏此數萬萬，當用何

法則惟有並力注重輸入額最高之物。爲捍衛圖存之計，若推廣植棉地，紡織廠是。又惟有開發極大之富源，以馳逐於世界之市場，若開放鐵礦，擴張製鐵廠是。惟爲之左右爲之前後者，尙宜有各種之規畫，以期發展而穩固。審嘗調查各國棉工廠紗錠數目，與夫世界鐵工之需要，而我國地藏之可惜，驚心動魄，不能不生無窮之希望。故此一種主義，敢自信爲適當……」（註一一）

對於社會主義，他持反對的態度。在理論上，他把集產與共產看作同一主義，認爲其發端都由於貧富不均，而貧富不均現象，乃由於智愚勤惰奢侈以及時地遭際種種參錯的因素，且同一貧富階級之中也有大小久暫之分，雖大聖絕智也無法使其齊一。就事實論，英、美、法、德、有黑奴，俄國虐待農奴，因這種階級之分而引起過激行動，而已經嫌俄國過激黨起後貴族的過於殘酷。至於中國，法制向極平等，不許富欺貧，地主壓農佃，與西洋國情不同，故說「以中國論，吾斷其必不能行。」他看到共產黨已在中國扇播活動，很憂慮將來造成大亂。在另一方面，對於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說勞工與資本在調和不生衝突之說，稱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自己竭力主張勞資合作。（註一二）

張謇以一個寒士出身，興辦實業，養活了好多萬人，將治產所得全用於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事業，

這原是私人企業制度下的理想作風。但憑他獨力奮鬭，爲窮人打算，他自知也不能令人人溫飽，且說貧富是實事頗難解決，只懷着將來國家最好能使富人幫助窮人的理想。（註一三）可見要使大衆能生活，社會能公平，必須有一個合理的經濟制度，而這種思想，不是沈潛於局部事業中的他所能有的。

（註一）盛氏傳略，參閱淸史列傳。

（註二）「自强大計摺」，皇朝經世文新編第二册，頁一——四。

（註三）「自强大計摺」附片一，見同書頁四——五。

（註四）「擬辦鐵路說帖」，見皇朝經世文新編第十四册，頁三——六。

（註五）張氏生平，詳見其子孝若著述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註六）「變法平議」，見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二。

（註七）見「請興農會奏」，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一，頁一——五六。

（註八）見「農工商標本急策」，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二，頁六。

（註九）見「通海墾牧公司集股章程啓」，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二，頁一。

（註一〇）見「海關進出口貨價比較表序」，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四頁二九——三〇。

（註一一）「實業政見宣言書」之結論，見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頁一二〇。

（註一二）詳見「太虛以佛法救濟社會主義錄附」，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六，頁二三——二八。

（註一三）詳見「暑期講習會第二次演說」，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六，頁九——一〇。

第六章　革命領袖的民生主義

一　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

要想把中國徹底的改造過來，不能像張謇那樣單靠局部的作爲，而像李鴻章那樣在清廷中努力也是徒勞的，至像康有爲那樣想得君而遂行改制已書到危險的教訓。事實昭示，清廷的存在，是革新的障礙，除非用政治革命的手段將其根本推翻。以這種偉大使命領導者自任的孫中山先生，生長在得外洋風氣之先的華南，以滿清政府勢力所不及的南洋一帶爲根據地，有華僑的商業資本供其使用，得祕密會黨的勢力爲其驅策，在海外又吸收到許多留學的前進智識分子爲之扈從；經過三十年的奮鬪，忍受十次以上的失敗，政治指導的重心漸漸從北京移到海外，終於在辛亥一役完成了革命的大業。綜計他從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生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逝世，

一生六十歲，有四十年致力革命，他的工作完成雖遲，而發動極早；其所造成思想與事功上的業績，在近代中國人物中罕有其儔。孫先生始終是一個理想家，而能在革命行動中不斷地努力促其實現。他自身完成了辛亥革命，留下國民革命給信從他的同志完成，還有產業革命與社會改革希望繼起的人來完成。

先生（註一）出身於貧農之家，幼時聞鄉人講洪楊故事，即有志做洪秀全第二。入私塾不久，便隨兄往檀香山，就學於教會學校，並無志於經商致富。三年後回到廣州，在美籍傳教師感化之下，宗信耶教，學習醫術；旋轉學香港，受西洋科學的訓練。他的教育完全是新式的，不曾參加科舉考試，思想毫不受傳統的名教觀念所拘束。據他的恩師兼終身知交康德黎（James Cantle）博士所述，他因懂得科學智識，很輕視本國舊學，全身充滿着偶像破壞主義。（註二）他在醫學校時，即已大談革命，「自傳」中有「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學爲入世之媒」之語。他雖稱在二十歲時有志推翻滿清，如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之志」，而這種思想在當初並不激烈，且還一度想在清室大臣登用之下從事創新事業。他二十八歲時（一八九四年）的「上李鴻章書」，

（註三）便是這種性質的嘗試。該書行文似王荊公「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而內容所陳皆西洋各國富強大計。他勸諫李氏勿專致力於兵工政策，應注意更根本的措施，說道：「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吾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唯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他申述這四點的意義如下：

（一）所謂人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1）教養之道：「泰西諸邦，……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啟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2）鼓勵之方：「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所不逮，翻陳出新，

關世人無限之蘊積，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農其閒，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3）任使之法：「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其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學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諳習者爲商董，皆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且恪遵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 總之，「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

（二）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耕耨有器」也。 （1）急設農官：「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 （2）亟設農學：「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旣闢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培其蕃衍，以彌此憾也。」 （3）講求農器：「……近世農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

如犂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也。他如鑿井濬河，非機器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機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總之，「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三）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1）窮理致用：「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吾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水作汽以運舟，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為何如哉。」（2）使用機器：「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3）禁作無益：「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

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其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為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總之，「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源節流之一大端也。」

（四）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1）寬免關卡：「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徵，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敲徵，節節阻滯……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 （2）保護商賈：「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 （5）發展運輸：「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瘺痹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

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僅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　總之，「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

綜括以上四點，他提出結論道：「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究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此書內容所提四點：人盡其才，講求普及教育、獎勵研究、登用人才，可說是教育政策及文官任用制度。地盡其利，講求設立農部、開辦農校、製造農具，可說是一種農業政策。物盡其用，講求研究科學、改進技術、免除浪費，可說是一種工業政策。貨暢其流，講求自由貿易、保護商人、發達運輸，可說是商業與交通政策。這四點都是經濟上的大原則，內容也是重要的經濟政策，可說是先生早年經濟思想的代表。那時他所注意的是生產，尚未及分配。這是他第一期的經濟思想。那時他也講究富強，且要使中國成爲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不過認爲基本

在經濟，政治與軍事在其次。這一點自非李鴻章的眼光所能及。即如滿清的建議規模也遠不及此。然而他這種獻議未被採納。清朝的積弊一天一天深重，要想改良非但無效而且不可能。這條近路既走不通，中山先生便轉向從事革命了。

當中山先生組織興中會的時候，頭腦中還祇有民族與民權兩個觀念。自光緒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在歐洲勾留了兩三年，思想即起變化。據他「自傳」中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故到同盟會成立時，其誓詞（註四）已有「平均地權」一項。當時有許多會員主張取消，經他詳細解釋後纔通過。該會成立後他在民報發刊詞中復加以闡發道：「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

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痛未深而去之易。……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張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迹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現最先，覩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註五）那時候他的三民主義的根本觀念已經確立，民生主義也已粗具雛形。他看到歐美各國生產發達以後，社會問題仍極嚴重，因而又注重分配，放棄早年單純的富強政策，而提倡民生主義。而且警告國人：中國假使循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二三十年後，勢必嘗到經濟革命的痛苦；故應及早尋求民生問題之解決，以防患於未然。當時黨員對於民生主義之重要性大多認識不足，所以他在各種宣言、演講、與談話中，常常反覆申說此義。

辛亥革命成功，孫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但不久退職。就在民國元年，他以民國創造者與在野黨領袖的資格，四出演講，宣揚他的主義，表示今後要致力民生主義的實行。依他那時的主張，民生

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在上海同盟會機關中說：「民生主義則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卽國家社會主義也。」（註六）這話講得很籠統，又在同盟會餞別會中說：「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流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卽此事。現今德國卽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註七）這表示中國應師法德國的大實業國有政策。後在北京共和黨歡迎會中說：「民生主義並非均貧富之主義，乃以國家之力，發達天然實利，防資本家之專利。德國俾士麥反對社會主義，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十年以來，舉世風靡，日本前年殺社會黨多人，其政府又主張烟草專賣等事，仍是國家社會主義，可知此主義，並非荒謬，世界通行，英美各國皆受資本家專利之害，總統歲俸不過十萬，而資本家之一法律顧問歲俸三十萬，可知資本家之勢力矣。至議員又多爲資本家所收買。中國十年以後，必至有十萬人以上的大資本家。此時防漸杜微，惟有提倡國家社會主義。」（註八）這表示中國若干事業應該國營或歸國家專賣。不過德日這種辦法，與其說是國家社會主義，毋寧說是國家資本主義，因爲它們對外仍是掠奪，對內至

多不過實行社會政策。他還說社會主義就是人道主義，並勸導社會主義青年斟酌國情，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以供政府採擇。可見他那時候的民生主義實帶着濃厚的改良主義的氣質。這是他第二期的經濟思想。

但中山先生的思想，並非固守不變的，他常能順着潮流，不斷的在批判中前進。民國三年以後，國內外波瀾迭起，袁世凱的僭改帝號，歐洲大戰的爆發，俄國的發生十月革命，五四運動的興起，以至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種種都使他思想上起莫大的變化，使他覺得民生主義內容有調整的必要。民國十三年所講述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一部分業已面目一新。這是他第三期的經濟思想。在這裏面會先從詞涵上解釋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卽是大同主義，」非但沒有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分別，而且也沒有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別。他之稱民生主義而不稱社會主義，是因爲社會主義的流派與意見太紛歧複雜的原故。馬克思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大師，爲廣大人們所宗仰，所以他特別加以注意。他對於馬克思的學說，並沒有注重勞働價値論，而集中注意於下列三點：第一是唯

物史觀。他否定馬氏的物質為歷史重心的說法，而認為民生纔是社會歷史的重心，且引美人威廉（Maurice William）（註九）的意見作為論證。他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　第二是階級鬥爭。他否定馬氏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因，說這是社會進化的病症，而自己主張階級利益的協調，他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　第三是剩餘價值。他不贊成馬氏將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且以福特汽車廠的例子證明資本家賺錢並不一定要延長工時減少工資，又以俾斯麥的例子證明由國家限制工作時間是可能的，又以近七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資本制度並未依馬氏的預言而消滅。以上先生批評馬克思的幾點，如果再逐項加以批評，不免流於學院式的論辯，不合情理。因為從大體上看來，我們與其說孫先生批評馬克思主義本身為不當，不如說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用於目前中國。因為如他所說，中國產

業沒有發達，患寡不患不均，全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沒有懸殊的階級及剝削關係，階級鬥爭和無產專制使用不着。所以說：「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又說：「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甚且說：「共產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承認二者的分別不在主義本身而在運用的方法。(註一〇)

他自己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曾提出兩種：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曾謂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民生問題。平均地權的思想發生極早，在他最初革命時即以此為號召。民國改元後歷次演講多鼓吹此旨，在國民黨政綱與建國大綱中亦有規定。在民生主義中對於其理由與辦法更有較詳的說明。他提倡平均地權的理由，大概可分下列幾點：第一、民生主義的目的，要把社會的財富弄得平均。第二、土地為人生最要之事，無土地即無立足之所。第三、土地價值之增加，由於衆人的功勞，衆人的力量，對於這種地主的不勞利得，理應收歸公有。第四、中國今日雖無大地主，但有小地主，將來實業發達，必引起土地投機，影響平民生計，當乘此時機，及早預防。他很企慕井田制度，說這是中國古時最好的土地制度，但辦法與今日不合，因為古代地廣、人稀，可以計畝均分，

今日地少人稠，面積不能平均，稅率亦有不同。故平均地權，並不是井田制度的復活。他很重視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單稅制度，且在民元一度建議效法。不過後來他雖主征收地價稅，而並無豁免其他各稅之意，故平均地權，不能就算單稅制度。他的土地政策的最後理想是土地國有，但目前辦法則在使私有土地民衆化，即要使少數人私有的土地變爲大多數人所私有，只有一小部分公共商用的土地，纔收歸公有，所以平均地權可說是一種土地農有政策。其實施辦法，大約分如下數項：（1）照價抽稅：過去將土地分上、中、下三級抽稅，很不公平，不如就價抽取。地價由地主申報政府，政府依所報地價征値百抽一的稅。（2）照價收買：地主如果少報地價，將被國家低價收買。如果多報地價，將被國家徵課重稅。（3）漲價歸公：地價既定，以後如有增漲，乃社會進步所造成，當全歸公有。（4）耕者有其田：照地價抽重稅；如地主不納，可將田地充公，歸耕者所有，使農民自己得到勞苦的結果。關於最後一點，實際上非常重要，可惜語焉不詳。（註一二）後來國民政府土地法中有較詳的規定。至於此項稅收的用途，當充地方社會事業經費；建國大綱中曾作如下的規定：

「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

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註一二）

其次他的資本政策，雖標榜節制資本，實際上在這方面說得很少。因為中國目前民窮財盡，資本非常缺乏；祇因看到西洋資本主義發達後，資產階級為害民生，主張未雨綢繆，用征收所得稅等方法節制私人資本。他更注意的是發達國家資本，看到中國統一之後，一定要用國家的力量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據他自己說：「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大規模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輸送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夠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也不過是私人的資本發達，也要生出大商階級的不平均。」（註一三）不過他知道本國資本缺乏，以之發展國家實業一定不夠，所以主張利用外資。關於此點，在實業計畫中早已詳細規劃了。

實業計畫（註一四）的完成，是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那時歐戰方停，交戰各國戰爭用品很多餘賸，如果完全投於生產事業，必致生產過剩。如果用來發展中國實業，在中國可以開發豐富的天然富源，並且可以吸收各國過剩的資本與貨物，可說一舉兩得。孫先生於是以經濟外交家的姿態著成此書，申述此義，以博取友邦的同情與援助。全書要義是要利用外國資本由政府計劃發展中國實業，內有六個計畫，計分十項：（一）交通之開發，（二）商港之開闢，（三）鐵路中心及終點並商港地設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設備，（四）水力之發展，（五）設冶鐵製鋼並造士敏士廠之大工廠，以供上列各項之需，（六）鑛業之發展，（七）農業之發展，（八）蒙古新疆之灌溉，（九）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十）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說明「如使上述規畫果能逐漸舉行，則中國不特可爲各國外貨消納之地，實可爲吸收經濟之大洋海。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餘者，中國能盡數收吸之。不論在中國，抑在全世界，所謂競爭，所謂商戰者，可永不復見矣。」這是對外說的話。他真正的意思是「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他認爲中國現在發達實業，必須一面廢手工，採機器，一面又統一而收歸國有。如果說民生主義是預防社會革命的政策，則實業計畫可

說是補行產業革命的政策。 開發實業的路綫或產業組織，分爲兩種方式：(一)個人企業：「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二)國家經營：「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就其內容看來，這不但是一個生產計畫或經濟計畫，實在可算是一種計畫經濟。當此書起草時（一九一九年），計畫經濟還很少人注意，卽蘇聯也只成立了俄羅斯最高經濟委員會（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of Russia），在烏拉區（Ural）局部建設金屬工業，大規模的五年計畫，根本還沒有攷慮到。而今這個計畫雖未能眞正實現，但計畫本身的價值是不能忽視的。還有他把中國實業的開展當作世界的問題來觀察，曾說：「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爲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爲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又說：「今中國已覺醒，日本卽欲實行其侵略政策，中國人亦必出而拒絕之。卽不幸中國爲日本所佔領，不論何時何處，亦斷非日本所能統治有利。」（註一五）這些話在今日看來，實具有先見之明；其所警覺國人者，又何等地剴切而深到！

對於中國人口問題，他也曾發表自己的見解。在民國前十八年上李鴻章書中說：「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聚嘯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飢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今方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註一六)這是說中國人口已經過剩。到民國十三年演講民族主義時說：世界各國人口增加極速，近百年中各增加好幾倍，而中國人口兩百年來毫無增加，長此以往，再過一百年，美國的人口將有十萬萬多，中國人口若仍是四萬萬，那時他們以多數來征服少數，中國人民將遭自然淘汰。(註一七)這是說中國人口尚嫌不足。前後議論大不相同，其所以如此者，大約由於前者着眼於民生或經濟，後者則以民族或政治爲出發點。而晚年他看美國公使樂克錫爾(W. W. Rockhill)的調查報告，也有幾分影響。不過樂氏估計中國人口向失之過少，據以後中外學者的調查，都說中國人口遠在四萬萬以上，且自然增殖率也相當的高。就現在土地資本以及平民生活程度各方面

看，中國人口決不能再任其增加。即使從民族的觀點上看，單憑人數多也不一定就能勝過人家。

在幣制方面，他曾拍發「錢幣革命」之通電。那時正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帝俄侵略蒙古，全國以金融恐慌，財政困難，不敢言戰。中山先生提出錢幣革命的辦法，意在解除財政金融的障礙。所謂錢幣革命的理論，據他自己說：「錢幣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為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生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現象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為何？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業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銀三千百萬倍，多以紙幣代之矣。然則紙幣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為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而為錢幣也。此天然之進化，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這種理論雖然簡單，但眼光已越過金屬主義的藩籬，而看清世界幣制的趨勢。接着提出他的辦法道：「其法為何？即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幣為錢幣，而悉貶金銀為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作錢幣之金銀，祇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則紙幣一出，必立得信暢行無阻，財用可通矣。」（註一八）這種辦法正為一九三一年後西洋各國所實

行的稱爲「管理通貨制」(Managed currency)。錢幣革命的理論，朱執信與廖仲愷曾在建設雜誌上分別爲文加以發揮。民國二十四年冬所改行的法幣政策立法用意完全與之相符合。

中山先生經多年的革命奮鬥，對於革命理論創獲極多。可是國民黨的勢力既感薄弱，殘餘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又很頑強，以至他的理想一籌莫展。及看到列甯所領導的蘇聯革命成功，以垂老之年力圖振作，着手改組國民黨，採取三大政策：實行聯俄，以共同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容共，以擴大國民革命的聲勢。實行農工政策，以動員廣大民衆的實力。農工政策的主要方針，見之於「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註一九)中，表示要解除農民與工人的痛苦，並提高其地位，告訴農民說：「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方。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貸借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告訴工人道：「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宜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

之制，周恤廢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後又總括說道：「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爲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爲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卽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卽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這是中山先生晚年所定的政策，可惜不久（十四年三月）逝世，不能親自領導國民革命的運動；不過後來革命的成功，還是由他播種所生的果。

二　朱執信之社會革命辯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革命運動，曾得許多志士仁人的襄贊。惟在革命期間，大家側重行動，故有如戴傳賢氏所說：「當年的一般革命志士，實在太把學問看輕，到得今天，有四十年的歷史的革命黨中竟找不出幾個學問家來。」(註二〇)平心而論，在國民黨中，不是沒有幾個有思想能文章的理論家，如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與戴傳賢等，對於主義的紹述與發揚，都有不可蔑視的功績，值得我們注意。就朱執信而論，對於經濟學便頗有研究。他早年在日本學習法政，特別注意經濟；回國從事革命，仍能出其緒餘，在學問上求建樹。(註二一)他的思想受尼采與馬克思的影響最深。由前者，陶鑄出他堅苦卓絕的志節；由後者，養成了他為大衆造福的思想。在革命運動中，他每不避艱險，挺身與反動勢力搏鬥，終於在民國九年以身殉國。邵元沖悼惜他道：「余之所以悄悄長懷而悼惜無已者，則以執信之才而不得竟其學，執信之學又不能盡見之於文也。蓋以執信致思之銳，誦習之廣，若假以歲月，傳之以載籍，融貫衆說而揭櫫一家之言，則其學不難大成。」(註二二)他的中年夭折，是國民黨的損失，也是中國思想界的損失。

近代經濟學者，大多重視欲望，各種欲望之中，尤其注意生存的欲望。朱執信便以這種欲望，組

加分析，於德國歷史派斯穆勒(Gustav Schmoller)與英國效用派耶方斯(W. Stanley Jevons)

各家著作均有所窺。依他之見，生存價值的判定是主觀的，其決定的元素約有九事：一為預期生存期間之長短與預期確固之程度，二為幸福之大小，三為將來之希望，四為過去之回想，五為名譽，六為自由，七為家族關係，八為人之同情，九為在社會所處之地位等項。在此九事中，他便定第一事為折中的常數，假定各人對於九事所判定的比較輕重，亦為常數，至第一事之後半與第二至第八事，皆隨社會事實而變遷，故當作變數；然後運用其數理智識，將其列一個生存價值的方程式，從中得出一個原則：「生存之價值實隨社會之進步而增加者也。」今日的社會制度實際都與這生存價值方程式中的變數有關。國家之所以發生，是要增加方程式中各變數的價值，近世國家的任務在增進人民幸福。其他如宗教、道德、及教育等一切善良制度，皆為增加生存價值而生，凡有損於生存價值的，即將目為不良制度而排去。所以無論何種制度，如不能臻於極善，即不能拒絕改良的要求，而要求改良的原因，都是由於舊制的存在有害人民的生存價值。總拿以上研究的結果，應用來說明現在中國國民所處的地位，並表示今後改良的必要：「故今日中國國民之生存價值，正日趨於

下，斷不能與彼日進者併談。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於不良之政府，則惟有於此貧弱之希望中，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實現，乃可恢復及其餘。是則生存價值之一轉變之機也。」(註二三)由是他從純理經濟的研究而達到實際政治的結論。

對於貨幣問題，朱執信曾表示過他的見解，他是不主張金貨本位的。本來在西洋自從克納普(G. F. Knapp)的貨幣法定說與斐休(Irving Fisher)的新貨幣數量說出現以後，金屬主義者的聲勢大受打擊。可是因為國人思想落伍，所以中山先生提出的錢幣革命主張，被一般人襲用舊說加以否定。朱氏曾介紹日人千賀鶴太郎的貨幣論。(註二四)此人主張「斷然廢止金本位，把金貨當做和銀貨和銅貨一樣，算做補助貨。紙幣上面不要寫金幾圓，只要寫粗米幾升幾斗幾斛，那紙幣可以和現在一樣通用，而兌換的準備，本來不是金貨是粗米，政府就不用藏金塊了，只要處處設粗米貨倉，兌換紙幣，就用粗米。這樣一行，物價騰貴就沒有了。」他認為這是很有眼光的議論，不過看到拿米做本位貨幣有種種缺點：第一、米的交換價值到底不見變動。第二、和消費情形比較起來，實在不方便。第三、米的投機仍舊可以進行。為免除這個毛病，他主張另外找多幾種物件，還出生活上

最主要的物品，即米、棉、布、絲、茶、鹽、油、煤、與糖八種，來做兌換品。再用合理的方法，作成物價指數，以表示貨幣購買力並維持貨幣購買力長久不變。(註二五)這種主張原則上當是進步的貨幣思想，但實施起來，以少數實物做準備，則產銷倉儲與運輸等手續將極繁，不如現行法幣之以現金與證劵為準備，較為省事便利。

在民國初年，中國有些產業資本家設立工廠，並以提倡國貨工業與救中國貧弱為號召。他們從自己的利害上着想，當然不願多給工資，竭力替自己辯護，說工資高了，國貨工業蒙其損害，外貨將乘機占據我腹地市場等等。朱執信是社會主義者，對此當然不以為然。他認為國家的貧富應以全體國民為標準：「講國家富不富，不應該只看總額若干，還要看每人所能受的分配額若干。所以就算天然利潤開發了，實業勃興了，提倡實業的人，個個人都在那裏面圓圓得意，而一般工人，求為覓保，仍舊是做每月八元的工，中國並不算是富了。」又認為提倡實業要注重分配及就業狀況：「我決不做無條件的反對提倡實業。卻是我批評提倡實業，要注重在分配一層。從分配上來看，如果認外貨占市場為比國貨占市場更不好，自然令得工做的人更多，就應該贊成。如果能夠令失業

的人比新得工做的多，就應該反對，而失業的多少，就要看要求作工的時間長短。像他還十二小時工作紗廠，就不能說是有益的。」(註二六)還有中國的勞動問題普通只看作「從業者」的問題，而忽略了「失業者」的一面。他說工人失業，甚至變做流氓土匪，是經濟上變調的必然結果。所以講革命是要更改工人的境遇，土匪流氓都要有生存權和勞動權。他還說：「把一個政府換一個政府，把一般官僚換一般官僚，不算是我們的革命成功；要把我們所主張的生產分配方法來換了舊日的生產分配方法，纔可以算是我們的革命成功。」(註二七)這話說得很警闢，很像西洋社會改革家的口吻。

當中山先生等一羣革命家提倡社會主義的時候，梁啓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常加以譏評，朱執信則代表建設雜誌出而聲辯，且於社會革命理論作正面的發揮。他論「社會革命之原因在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而將今日經濟組織的缺陷歸之於「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制度。」社會革命發生的原因，他不說社會貧富懸隔，而說社會經濟組織不完全，因爲前者只是後者的結果。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放任競爭而不加過問，則勝者富而敗者貧，貧富必趨懸隔。故欲廢

除貧富的界限，必須絕滅競爭，廢去私有財產制，至少也須限制競爭，對私產只能予以相對的承認。所謂革命的意義，是要「取其致不平之制而變之，更對於已不平者，以法彌使復於平。」可見他所主張的社會革命是採用立法的方式，卽他所稱的國家社會主義。今日中國雖有貧富之分，而尙未如歐美之懸隔，有些人遂認爲無社會革命的必要。朱執信氏却認爲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將懸隔亦不可不革命；因爲既有此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產制，必生貧富懸隔的結果，二者之間實有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歐美與中國之不同，在乎前者貧富已懸隔，後者則尙未顯著，但在現行放任與私產制下，將來亦必蹈歐美的覆轍。目前趁貧富不平未顯著時，卽行社會革命，其事輕而易舉，若待不平既甚而實行，則其事非常困難。故他以爲中國今日正處實行社會革命最利的時機，此機稍縱卽逝，不可坐失。他不但主張社會革命，且還主張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行，利用政治勢力從事經濟改造。這革命的主力，不是豪右卽資產階級（Bourgeoise），而是細民卽無產階級（Proletarian）（註二八）。

三　廖仲愷之統一財政計畫

廖仲愷係僑美粵商之後，十七歲纔歸籍，其時於國學西學已有相當根柢。在國內繼續努力，學問識見增進甚速。結婚後，得其夫人資助東渡日本，先後攻習經濟政治，對於財政尤多心得。及中山先生在東京組織同盟會，他便加入從事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回廣東掌理財政，那時正當鼎革之際，財政棼如亂絲，經他從容整理，不數月而收支適合，去官時已庫有盈餘。同志因他長於理財，每以財政之責相委。民國七年中山先生居滬著作建國方略，廖氏感他主張不行，由於國人對之缺少瞭解，乃與同志創辦建設雜誌，作學術上的宣傳。同時譯述威確爾斯 (Dols. F. Wilcor) 所著全民政治，(註二九)並加以鼓吹，作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之參考。他的全民政治主張，頗受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啓發，而他研究的結果，也供中山先生許多資料。十年中山先生被舉為非常大總統，親自率軍北伐，留他掌理財政，盡後方轉餉之責。十四年，他與黨軍清除廣東地方軍閥，並與帝國主義勢力抗爭；同時樹立國民政府，力求軍政、財政、民政之統一，一身兼國府委員、軍事委員、財政部長、廣東財政

廳長諸職。由是遭反革命者的忌憚，以至被狙身死，留下黨史與國史上慘痛的一頁。

從學問、才能與節操各方面論，廖氏在國民黨中却是一個特出人才。他最擅長理財，對於度支措置有方。要沒有他，在革命期間黨費軍費一定要大感困難，故中山先生曾譽之爲天下理財家。他不僅長於理財，而且廉潔自守，掌了二十年財政，始終不妄用公家分文。他辦理財政的時候，環境極度惡劣，自他受命任廣東財政廳長後，卽遭地方軍閥（如陳炯明）百般窘迫，十三年中山先生北討，曾兼任他爲財政部長、廣東財政廳長、兼軍需總監，其時軍需浩繁，轉輸之責極重，而礙於武人專橫，財政割裂，籌款困難萬狀；於是發表「統一軍政財政」的計畫，其覆當時滇軍長電文道：(註三〇)

「粵省財政，久陷分裂，握軍柄者，各就防地自籌軍食；掌度支者形同守府，挹注無從。於是佔有防地之軍隊，頗有餘糧；轉戰前敵者，或以缺乏地盤之故，給養無出。肥瘠懸殊，勞逸亦異。設有徵調，猜嫌日起，蓋各顧防地之心日重，卽一致對外之心日輕。發端甚微，流禍甚重。東江南路，逆氛久未削平，豈軍力尙有未足，實財政分裂，軍心不一，有以致之。倘長此不已，則一星之火，可以燎原，萬丈長堤，潰於一旦，實有仲愷所不忍言者。我國根本未定，歐戰華會，屢失時機，現在強隣環伺，而市

倫軍閥，盤據北省，方且日肆屠戮。禦侮討賊，吾輩負責至重。千鈞一髮，實非急起直追，無以應事機而拯危亡。惟細察粵局，又非統一財政無以作士氣而一軍心。尊電首創財政統一，暮鼓晨鐘，尤足發人深省，迴環捧誦，感激心脾。古訓有云：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至於足下，信必言行一致，以振軍人全體之精神者。謹掬至誠，伏乞教正！」

這裏所說的都是實情。不但廣東如此，民國以後各省財政都陷分裂，釐捐租稅被軍隊截留，辦理財政者每有無所措手之苦。況當時出師北伐，非統一財政即無以應軍需，廖氏肩此重任，惟有提出這個辦法。但因格於地方軍閥權勢，計畫不行，他遂辭不就職。通電（註三一）表示「去私言公，按症發藥。則核實兵額，統一財政，洵爲目前唯一辦法。」他認定理財與整軍必須相輔而行，故仍苦口曉諭軍人道：「財政計畫，見諸實行，必須各軍長官躬自警惕，先行切實點驗，期有一槍始支一兵之餉，以此餉額，定爲軍需度支準繩。一面將糧稅釐捐以及防務禁烟各費，統歸財政機關接管。用人行政，不得干預；經收款項，不得截留。苟能如此，事有可爲；不能如此，功無可見。」財政統一原是近代國家的要政，而其實現則以軍政統一爲條件。所以他當時在財政本身方面努力功效極微，但到十四年

地方軍閥肅清，廣東財政卽告統一。至全國財政統一，在北伐完成後十餘年中，也已逐步告成。

對於幣制改革，他爲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主張辨護，並加以發揮。說明廢金銀用紙幣之說，不自中山先生始，在中國過去已有成例，在外國已有人先他提倡，而且在歐戰時已付諸實施。他認爲貨幣信用的基礎在誠信，不在乎金銀。中國幣制不定，影響於國民經濟極大，故主張改革者很多：有的主張統一銀幣，有的主張虛金本位，有的主張實金本位。這些在他看來，都不適當，理由爲「金銀內容之價，雖高下不同，爾其所以爲交易之媒介價值之標準者，拙劣維均，無所選於彼此。」他自己主張改用貨物本位的錢幣制度，（註三二）曾說：「金銀錢幣之價值或購買力，旣變動無常……不能爲物價之標準。以一定百，則與其以金銀幣之一種或二種爲本位，而以紙代表之，曷如以金銀暨其他社會所需要之貨物爲本位，而以紙爲之代表，較爲適切於實際，而符合科學之方法也。」這種所謂貨物本位的錢幣，以十二種重要貨物爲準備，而以紙幣的方式行使。他聲明「此錢幣制度，在予全國以確實價值之標準。從生產之增加，而裕國民之財富，非爲財政供不生產之消耗，補財政之虧損。」實施順序，由國家下令禁用銀幣，停止發行銀行劵，政府歲入一概收紙幣，祇許銅元爲輔幣，充小

額交易之用，一毫以上皆用紙幣。實施機關，他主設一獨立的貨幣部，內分製幣、生產、供給、與消耗四局，與財政部分立，以免因財政而牽動幣制，至實施辦法，在純以紙幣代表貨物，亦以貨物爲紙幣準備，並使全體準備貨物與全體流動紙幣間維持一定比例；以同額之紙幣出，卽以同額之貨物入，同額之準備貨物減，同額之流通紙幣消，同額之貨物賣，同額之紙幣出，務使紙幣與貨物自動的相消長，以達均衡的目的。廖氏所提出的這種貨物本位的貨幣制度，在原則上與今日各國所行的管理通貨制相合，而實施的困難與不便，正與朱執信的辦法相同。

中國國民經濟的問題急待解決的很多，貨幣不過其中之一，其他對於土地與產業等問題，他都有開明的見解。論到土地問題，他像一般主張土地改革者一樣，非難土地獨佔，大地主不勞而獲。對於一九一〇年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在英國所行的土地增價稅法表示贊成；對於俄國革命後的土地國有，更表同情。中國的土地問題，他認爲目前還不顯著，因爲「我們中國交通不便，尚未有很多大地主，商埠之外的地價，百分之九十九是原始地價，小地主不勞而得的租很有限。」但將來必趨嚴重，「到交通設備好了，大地主是一定發生的，社會經濟發達的結果，以地界的名界，

（１）八九成歸了地主，其他一般人民只享得一二成，國家拿人民的稅來做公共交通及其他建設的事業，做好只便宜了一階級的人，這是不公道的。」故主張實施公有與征稅的辦法說：「民生主義者主張新都市所在和鐵路運河所經過的、經濟上有重大價值的地方，收歸國有，或歸地方公有。其他土地，經過測量報價之後，須行土地增價稅。」以為由此可以獲致社會的公平：「這一來土地自然增殖的利益，歸地主就叫做不勞而得，歸民國的國家拿這宗款項做教育擴張、交通改良、社會改良等費，這就叫做以社會經濟發達的結果，歸還社會，土地的權利就是國民大家平均了。」（註三三）還在原則上和辦法上，都在宣傳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意旨。

講到產業的問題，（註三四）他說明生產的計畫是為着消費，一國的生產應供一國的消費。但分析世界現狀，覺得已經違反了這個原則。在歐洲自產業革命以後，生產方法大變，生產數量大增，而產業制度依然，方法與制度不能相容，形成供過於求的現象。為使生產方法與資本制度並存，惟有找求世界市場，免除生產過剩，並維持物價。在中國，自海禁開通以後，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原因，使國家經濟不能獨立，一般的貨物，供直接消費的多，為生產而消費的少，供求不能自然適合，社會患生

產不足的現象。他說歐洲產業界的所謂生產，非爲消費而生產，而爲生產而生產，所產物品非爲供給生產地各人的需用，乃供給世界有資財的人購用，以達資本家掠財的目的。他指出列強要求與中國通商，不懷好意，要竭盡我國民的膏血，以供他們生產的營養；且通商的條件極苛刻，如掌握我關稅權，關稅稅率須與他們協定，外輪在沿海內河自由航行等，都是要束縛我國產業的發展，而保障他們產業的發展。他決不像一般盲從的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爲中外貿易是互惠的，而說穿這種貿易是對我們不利的，不論在時間與價格方面都吃大虧。因爲以我國低賤的原料交換外國高貴的精製品，他們費了三個月工夫，便可賺我們一年的錢。以我國人工的製造品交換外國機器的生產品，我們費了一年的勞力，只可敵外人一季或兩個月的工夫。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產業永遠沒有辦法。他最後的結論，認爲這個問題的解決，應從政治上入手；收回關稅權和領事裁判權，並且修改通商條約，纔能使中國產業自由發展。這幾點也正是近年政府外交所致力的，而且有一部分已經成功。

四　胡漢民之民生主義解

胡漢民早年留學日本，自認識中山先生後，卽參加革命，掌理機要。追隨中山先生奔走南洋各地，祕密指揮革命，歷經艱危與失敗。同時辦理民報與中興報等，宣揚革命主義。民國成立以後，一度主持粵政，在國民黨中始終居於重要地位，又先後編輯民國雜誌與建設雜誌，從事革命理論之建設。後來中山先生在粵組府，親自督師北伐，胡氏留守代行職權，成爲他最親信的人物。在國民革命的時期中，他一度往蘇聯考察，一度往歐洲考察。回國以後，主張依照建國大綱，實行五院制，後任立法院長。他的立法，抱「立法貴恕行法貴嚴」的主意，一反過去「立法貴嚴行法貴恕」的原則。他從事立法非常專心，夙夜匪懈，甚至幾年不出都門，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的重要法規，多半在他任內完成。

胡氏少讀文哲史籍，舊學頗有根柢；後在日本專修法政經濟，新知也能融通，且生着理性的頭腦，不類尋常的革命家。著有多篇有價値的論文。他曾用唯物的眼光研究中國哲學史（註三五）說明

同時代思想之不同，固由於個人才性及所受學術系統的歧異；而各時代思想之不同，當歸之於所處的時勢或物質關係，故認爲人類進步和思想變化同出一個公例，就是以經濟關係爲主要原因。不過他並不以爲物質或經濟可以決定一切思想，只是承認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與賽力格曼（Edwin R. A. Seligman）的話，即政治、法律、宗教、文學都受經濟的支配，而這等等也相互影響，且影響及於經濟基礎。人類進步最重要的是受經濟關係的影響，並不是說一切歷史只可由經濟關係說明。他又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註三六）說無論何種民族，其家族的形態總和社會的經濟形態相應。胡氏是篤信社會主義的，對於孟子企圖恢復井田制度的主意，非常稱頌，他說：「井田的好處是民有定產，自食其力，田有定分，豪強不能兼併，賦有定法，貪暴不能多取，經濟上的不平與政治上的不平，幾乎滅免個乾淨。在孟子那時代，祇有農業比價（？）的事體發達得多。如果能行這個社會制度，社會問題十分總解決九分。」（註三七）這種文章發表以後，以「疑古」知名的胡適不以爲然，他非但批評孟子立說不淸，甚且否定古代有井田制度之存在。胡漢民除從考據方面加以答辯外，仍認爲從那時代平民的生計上看，井田制度是一種很合理的制度。（註三八）對於

馬克思的學說，他亦花過相當的時間研究。曾譯述德人倍伯亞（N. Bear）的產業革命時代社會主義史與馬克思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史；並與戴季陶合譯考資基（Karl Kautsky）的資本論解說。

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胡漢民在國民黨中以繼承遺志之責自任。如他所說：「漢民追隨總理數十年，永懷宵旰謀國之勤，敢忘繼志述事之願」。曾蒐羅先生生平文告著述編爲總理全集，這是中山全集中權威的版本。在黨義的發揚方面，則以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爲代表作。書中首先分析世界三大反革命的勢力：即軍國主義、資本主義、與官僚主義。說這三種勢力是連環的：官僚主義通連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則直接通連於軍國主義；其共同點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支配慾，其總結晶是帝國主義。他既認爲帝國主義是反革命勢力連環的結晶，而看到帝國主義是人造的鎖鍊，須用人力來鉸斷，故主張用連環的三民主義打破連環的世界反革命勢力。三民主義是連環的，是整個的「唯民主義」，包括民有、民治、民享，其連環的方式如下：（一）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二）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三）實行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族主

義。三民主義中的三種主義與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並不衝突，其不同只在理想與實行之間：(一)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二)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三)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世界上三個反革命勢力必須用三個革命的勢力去打破：(一)用民族主義去打破軍國主義；(二)用民權主義去打破官僚主義；(三)用民生主義去打破資本主義。不過這三個革命勢力不能單獨擊破三個反革命勢力，必須用連環的革命勢力擊破連環的反革命勢力。如果做到這一點，那麼三民主義的世界便可以代替帝國主義的世界。

講到民生主義(註三九)的時候，他並不特別以資本主義爲攻擊對象，而對於馬克思主義却作了嚴重的批評。他說：「馬克思並不是胸中全然無主觀，不過努力搜求歷史的客觀事實，把主觀煉成一種『科學的』鐵律，而他乃以預言家的態度，反覆指證社會努力必然的命運，就自然使勞動階級狂熱地生恨，資產階級也倉皇無主地發抖。」　繼說馬克思學說中有史實作證的部分，限於歐洲一隅的觀察，沒有事實作證的部分，還只是預言，而預言是不科學的，故斷言馬克思的共產主

義還是不離烏託邦的本質。　馬氏預言世界勞動階級必不分國界聯合起來，而歐戰的事實證明其錯誤。這是由於他不明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族的偉大力量。馬氏預言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快要消滅，而至今七八十年資本制度不但沒有消滅，連發達到極點的國家也沒有起革命，倒是生產落後的俄國反而發生革命。推翻帝俄反抗帝國主義，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所以他說俄國革命的成功是反證馬克思主義的失敗。　有些共產黨員說——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標榜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不過是一種社會政策。胡氏爲之辨正道：民生主義的實行綱領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不過是實行主義的方法，並不代表主義理論的全體，但已經打中了資本主義的要害——土地私有制與資本私有制，使其不能演成階級鬬爭。　民生主義的經濟組織是這種方式的：土地和資本之共有，生產力組織之共治，生產品分配之共享，由民生主義達到民有、民治、民享地步，不必經過階級鬬爭，實比馬克思的方法高明。故他大聲疾呼，勸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回頭，信仰並實行三民主義。　胡氏這種信仰始終是堅定的，他在民國十四年奉黨令派往蘇聯的時候，有人喊出「從孫中山主義到列甯主義」的口號，他却回答一句「從列甯主義到孫中山主義。」

現行國民政府土地法，係在胡氏長立法時完成。當該法審查通過的時候，他曾作演講，（註四〇）說明這是根據總理遺教參照人民習慣，以及社會實際情形而定的，是清理土地、規定一國土地稅法、和土地的登記、使用、徵收的種種法律。 他首先辯明中國不能採行蘇聯的土地政策與亨利佐治的土地政策的理由，而後說明土地法的內容；土地的所有權屬諸人民全體，私人得法律許可，也可以承認他有土地私有權；不過所有權中所包括的使用、處分、收益三種，應各有相當的限制，人民祇能在相當範圍內使用土地、處分土地、收益於土地，不能越出範圍。這是主要的方針。次要幾點，如確定地租，以百分之三七·五或千分之三七五為標準。如對於不用又不賣的土地征重稅，以取締土地的荒擱或居奇。如減低農村土地的稅率，獎勵地主改良土地，增加生產。如規定佃戶有繼續租地之權，除了他們違法或多時不納地租外，地主不能收回土地，使許多貧農有耕田的機會。這些規定的辦法都屬於溫和的改良的方式；但要是真正能夠實行，中國土地問題至少可比目前緩和得多。

蘇聯自於一九二八年起實行五年計畫，這引起世界目光的注意，中國一般智識青年更是議

羨不已。胡氏於此時寫了一本小書，(註四二)對於蘇聯建設作一種討論，並加以批評。他並不否認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功，而且贊揚他們的毅力與精神定了計畫定了目標能按步就班不顧一切的做；不過認為這種成功在中國是一個最重的教訓。他引古人「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話，勸大家「不要震駭於蘇聯之所謂五年計畫，而混忘了總理給我們的建設方針。固然五年計畫是偉大的，是嚴密的，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建設計畫所不及的，然我們何須自餒！我們未嘗沒有計劃，我們的計畫未嘗不及蘇俄五年計劃之詳備與偉大。這個計劃是甚麼？便是根據三民主義而來的民生主義建設計畫——總理手自草定的建國方略。」他不諱言中國革命的缺乏成效，徒有完滿的主義，而黨志未酬，致中山先生在世時有「我的民生主義政策，未行於中國，却先行於蘇聯」的慨歎，但勸導國人要確信民生主義是中國今後建設的唯一方針，實業計畫是今後唯一的計畫，對於這種主義計畫，要具蘇聯人民對於五年計畫一般的信仰，蘇聯當局的犧牲精神與創造熱誠，則中國建設的完成是期在不遠的。

(註一)吳稚暉編中山年譜。

(註二)關於康德黎對孫氏的敍述可參閱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by James Cantle。

(註三)「甲午(一八九四年)上李鴻章書」見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三集三函札頁一——一三。

(註四)同盟會誓詞共四項「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內平均地權居末」。

(註五)「民報發刊詞」一九〇五年作，見胡編總理全集第一集下册頁一〇三。

(註六)「提倡民生主義之真義」胡編總理全集第二集演講類頁一五九。

(註七)見「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同上頁一二七。

(註八)見「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同上頁一〇〇。

(註九)「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所提及的美人威廉氏，Price 英譯本譯作 Maurice William，D'elia 法譯本譯作 Whiting Williams，但未敢確斷。Current History, July 1932 中有 Nathaniel Peffer 著文謂中山先生原頗信共產主義，後讀 Dr. Maurice William (紐約一牙醫)著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20，即不滿共產主義。當時他誤以爲 Maurice William 即 Whiting Williams (美國一從事勞工福利宣達勞工問題者)。該作者又謂中山先生以民生主義很多本 William 之原作，後 William 又著 Sun Yat.sen versus Communism 引證此點云。

(註一〇)「民生主義」第一講，見總理全集第一集(上册)頁二〇〇——二三一。

(註一一)見「民生主義」第二講，同上，頁二三一——二四一。

(註一二)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十一條，見全集第一集下冊，頁八五二。
國民黨政綱第三條亦有類是之規定。

(註一三)見「民生主義」第二講，同上頁二四二——二四五。

(註一四)實業計劃原以英文發表名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y Sun Yat-sen (G. P. Putnam's Sons) 1922。後經朱執信廖仲愷林雲陔與馬君武譯為國文，先在建設雜誌逐期刊布。

(註一五)詳見「實業計劃」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商務本)其中篇首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與結論更為重要。

(註一六)見「上李鴻章書」，全集第三集函札頁二。

(註一七)「民族主義」第一講，全集第一集(上冊)頁七——一五。

(註一八)「錢幣學」(一九一三年之通電)見全集第一集下冊，頁一〇一一——一〇一五。

(註一九)「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國十三年八月，見全集第二集，頁四八——四九。

(註二〇)見「對全國青年們的一個忠告」載季陶文存第四輯頁一一七。

(註二一)朱氏著述大多載於上海晨報星期評論，與建設雜誌民報與民國雜誌也有不少。民國十年由建設社編輯其遺稿為朱執信集，孫中山先生英文實業計劃篇首及第二第三計劃及第五計劃之大部分為朱執信所譯。

(註二二)邵元沖著朱執信遺集序。

(註二三)「生存之價值」，見朱執信集上冊頁九三——一一〇。

（註二四）「千賀博士之金本位廢止論」見朱執信集下册，頁三四七——三五〇。

（註二五）「米本位說之批評」見朱執信集下册頁三五一——三五八。

（註二六）「實業是不是這樣提倡」此文在批評穆藕初等工廠的辦法。見朱執信集下册，頁四五五——四六〇。

（註二七）「沒有工做的生存權和勞動權」見朱執信集下册，頁四四九——四五四。

（註二八）「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見朱執信集上册，頁一一九——一三三。

（註二九）全民政治（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一書，原名「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於民政之作用」（The Initiative, the Referendum, and the Recall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先分期刊於建設雜誌，後集爲單行本行世。

（註三〇）此電除要滇軍要外，復通電各方，希望大家一致主張共維財政統一。「統一財政通電」見廖仲愷集下册，頁一一九——一二〇。

（註三一）「辭財政廳長兼各營籌款通電」見廖仲愷集下册，頁一二〇——一二三。

（註三二）見「錢幣革命與建設」與「再論錢幣革命」廖仲愷集下册，頁四一——七三、七八——八八。

（註三三）見「平均地權」廖仲愷集下册，頁一〇三——一〇七。

（註三四）「中國實業的現狀及產業落後的原因」見廖仲愷集下册。此文亦蒐集在中國國民黨講演集中。

（註三五）「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見建設雜誌第一卷第四號。

（註三六）「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見建設雜誌第二卷第四期。

（註三七）「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見建設雜誌第二卷第四期。

（註三八）關於井田制度之有無問題，在建設雜誌上曾引起一個時候的討論，參加者有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胡適、季融五、呂思勉諸人。後經華通書局收輯爲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

（註三九）見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第七章。

（註四〇）「胡漢民氏在中央紀念週關於土地法內容的演講詞」，見王效文著土地法論附錄下冊，頁四六八——四九七。

（註四一）胡漢民著：從蘇俄建設想到孫總理的建國方略，華通書局出版。

第七章　結論

一　過去經濟思想的評價

過去一百年的經濟思想，在中國整部經濟思想史中佔着極重要的部分。時間雖僅短短百年，然正遭逢中國歷史的大轉變期，經濟思潮起伏激盪的情勢，爲過去任何時代所不及。以上說的還不過是幾個主潮。經濟落後的國家經濟思想往往發達，這在中國尤其如此。中國在近代事事落後，而自門戶洞開以後，西洋經濟思想隨貨物與資本同時輸入，除本國固有的思想外，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竟兼容了各國各時代各派的思想，以致從封建觀念到共產主義，無所不有，內容紛歧龐雜達於極度。這固然不是一種好現象，但爲過渡時代所必有。這些思想各有其產生的原因，且都針對現實問題而發。正如黑格爾（Hegel）所說：「凡存在皆有理由。」所以我們對之也不欲作主觀的

褒貶，而擬以歷史的眼光給以適當的評價。

清室重臣的富強政策，乃由外力刺激而起，施行於洪楊之役以後。曾國藩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士大夫，他的鎮壓太平天國是爲着維護名教。他在消費方面主張節約，在生產方面注重農業，都是儒家的正統經濟思想，但連年致力軍事與外交，他看到洋人兵器的精良，想出「學夷技以制夷」的法術，晚年注意製造器械船物，並遣派聰穎子弟出洋，已替新中國的建設舖了第一塊基石。繼他而起的李鴻章，自以身處數千年的大變局中，所負責任甚重，他深知洋人論勢不論理，非採西法自強不足以保國家安全，於是決心領導推行洋務運動。朝議紛紛，他對於養兵設防製船浚礮的經費，總是起來力爭。他雖身居高位，而實力尚不足以一申其抱負。就是費盡氣力爭來興辦的軍用工業，也因主持的官僚腐敗，沒有良好的結果，以致軍事失利，外交棘手，演成種種喪權辱國的史實。怨謗叢集於他一身。有人還責他辦洋務只知重兵工末技，眼光太淺短；其實中國的振作的機會過去一再坐失，到他手裏外患已經深入，站在負責的地位，除迎頭趕上充實國防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保國長策，這是歷史的悲劇，李氏不幸而充其中的主角。與他同時的張之洞，是一個折衷派，提出「中學

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在保持國有制度教化上是保守的，在習取西洋經濟技術上是進步的。他有許多曲說清廷的說詞，只爲了自保權位；而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建樹，却替新中國打了一點物質基礎。至於當時幾個駐外使節，如郭嵩燾、薛福成、與馬建忠等，都是洋務運動的贊助者。他們以爲強根於富，視經濟重於軍事。這是從西國實地體察得來的見解，自比李鴻章深透一層。尤其薛福成所提與工商，開鑛產，築鐵路幾項，至今猶有一讀的價值。他們雖是見得到做不到，然終已盡了建言的責任。

戊戌維新運動，發動於甲午對日戰敗之後，目的也在求中國富強，所用的是改良主義的手段。結果雖歸失敗，而開了以後改革運動的先例。領導這個運動的康有爲，賦有創造力，早年思想前進，曾大膽與傳統學風挑戰。他所想像的大同世界，是一個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在百日維新中，他上光緒帝富國養民諸策，實質上是建設中國資本主義的政綱。然而他下意識中仍潛伏着陳舊的觀念，且自信太強，流於偏執頑固，甚至在維新失敗後倡議保皇，排斥革命思想，行爲日就與潮流背馳，終至爲時代所棄。他的弟子梁啓超正與他相反，創造力小而吸收力大。對於外來各種思想的感

應異常靈敏，常以之大量介紹國人，於中國沈滯的思想界有發聾的作用。然終因馳騖太廣，感覺應接不暇，而不免有麤雜膚淺之弊，前後論斷參錯矛盾之處也所在多有。他的經濟思想，在批評方面多能切中時弊，而建設方面幾無何種成就可言。嚴復於西學素養較深，介紹精審而有系統，所選的都是西洋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標準著作。他的經濟思想差不多完全接受個人自由主義的學說，對於資本主義的弊病認識不足，等到晚年發覺的時候，已經缺乏創新的能力，惟有折回復古老路。他在思想上的貢獻也不過在介紹自由主義而已。

在清代末後幾年，官商企業都有振作的氣象。盛宣懷督辦鐵路總公司，爲中國大舉築路的開始。所需資本他本主張合官商股與洋債爲一；後因官款有限，商股難招，專借外債。他簽訂債約時常以建築與管理權讓與外人，自已從中取得優厚的佣金，很爲各方所非議。他後來提出鐵路國有政策，在原則上定幹路爲國有，可以統籌全局，鞏固中央政權，且鐵路乃重要公用事業，歸國家專利，本無不合，而且也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通用的辦法。不過因爲他本人不孚衆望，反對者逞虛憍之氣，而清廷措置又不得其法，以致實行結果大壞，還與政策本身無關。試觀民國改元後二

三年中，諸路次第收歸國有，經過便很順利。張謇以一寒士出身而手創各種實業，將實業贏利與辦許多社會事業，又在政治上提倡棉鐵政策，爲國造產，挽回利權，其眼光、毅力，以及爲公服務的精神，都値得表彰。作爲一個實業家，他可與西洋這方面第一流的人物相媲美。然於社會思想不免欠缺；他承認有貧富不均的現象存在，而反對社會主義的改革，自己却不曾想出什麽有效的解決辦法。

國民黨諸領袖的經濟思想，都以其總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爲中心。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從實踐中找求理論，又以理論指導實踐。他具有世界眼光，而能本中國立場，思想言論又開明而前進。從早年上李鴻章書建議富強政策，起到晚年宣布農工政策止，一直在探索時代的趨向而前進中。他與前輩的李鴻章同樣談過富強政策，而他講得比李要透徹得多，且不是後者的頭腦所能理解並接受。他與同輩的康有爲同樣談過改良主義，然康氏改良失敗後，思想日趨落伍，幾被世人遺忘。他要求改良未遂，卽轉而從事革命，威望日見隆重。民生主義是中山先生晚年成熟的經濟思想，認爲中國今後不必走西洋資本主義的老路，儘可直接建設社會主義，一舉而解決民生問題，實行起來因勞資沒有尖銳對立，無須階段競爭，只要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便可達到這個目的。這種

政策針對着中國的特殊環境，比之一般拘泥公式的主張，自不可同日而語。民生主義是一種怎樣的經濟制度，孫先生並未明言，因之這些辦法被一部分人只看作一種社會政策。民生主義是沒有完成的，他所提出的食、衣、住、行祇講了兩項，據說還有養生、送死等項沒有公開道及。（註一）形式上因爲演講稿系統並不完密，他自己也坦直承認。（註二）但對於今後中國國民經濟的大端，總已畫出了一個正確的輪廓。朱執信與廖仲愷對於經濟學都有修養與心得，其著作大部分在發揚民生主義，前者的幣制改革理論與後者的統一財政計劃，尤其值得注意。胡漢民對於三民主義確是非常忠實，且懷着繼志述事的願望。他對於民生主義，大部分僅就孫先生理論本身說明，不能從世界經濟動態中予以引伸，所以解釋則有之，發揚光大一點沒有做到。

二　今後經濟理論之建設

檢視過去所以準備創造將來。中國經濟一天未上正軌，經濟學者的責任卽一天未了；而且經濟環境變化無窮，經濟思想也須不斷地發展。今後的經濟理論應當怎樣建設呢？我以爲第一需要

作科學的研究，免除過去散漫膚淺的弊病，而應作系統的深切的研究；換句話說，對於粗疏的經濟思想不能遽引爲滿足，而要進一步建立一種嚴密的經濟科學。經濟科學在西洋已有一百六十幾年歷史，而在中國則介紹之外缺乏創造，今後創造是絕對的需要。經濟學從性質上原可分爲純理經濟學（pure economics）與社會經濟學（social economics）前者純以客觀的眼光研究經濟現象本身，並求出其演化的法則，可並不加以判斷；後者除對事實作一般的觀察外，還從倫理與政治的觀點判別得失，並提出改進的方案。一者注重科學本身的眞實，一者注重科學於社會的效用，可說各有特點。不過今日的中國，現實的經濟情形非常落後，諸待改進與創造，社會經濟學的研究遠較重要。因爲注重後者，於國計民生的解決可得到直接的幫助。這樣研究經濟學者除經濟本身之外，對於有關的社會、倫理、政治與法制各方面，都須同時加以注意。

建立一種社會經濟學的時候，必須適合國情。我們對於一般經濟原則與世界經濟趨勢，固然要有充分的認識，但實地應用起來，非針對本國環境不可。試遍涉西洋各國經濟文獻，幾乎沒有一種不注重其本國環境，且以本國立場立論。德國的歷史學派與美國的制度學派如此，英國的古典

派何嘗不是如此。雖然有些著作並未明言，但實際上仍然一樣。亞丹斯密的主張自由貿易，正在英國工業發達工業製造品需要外銷的時候，到一九三一年時環境不同，就是正統的學者也認爲保護是必要的了。中國近年留外研究經濟學者日多，因耳目濡染與師承關係，往往將不同環境中所產生的學說，攜歸提倡：人家講個人主義，我們也講個人主義；人家講全體主義，我們也講全體主義；人家講共產主義，我們也講共產主義。這種思想不但不適用於本國，且還找不出實行的條件。中國今日的經濟可說是半殖民地化的殘餘封建經濟，要從這個泥潭中振拔出來，決不能採用西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成說，必須根據本國特殊環境，再參考並比較各國的各種學說，埋頭自行創造。惟有這樣，對於本國的經濟問題，纔能給以一個切實的解決。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落後與惡劣的環境中，最需要一種積極與前進的思想，領導國民經濟出難境上坦途。在這樣的要求之下，我以爲經濟學者應當倡導下列幾點：第一完成產業革命，以發展生產技術。工業機械化以至產業全部工業化的過程，在英、法、德、日、美、俄各國都已先後完成，而中國遲遲沒有實行，過去李鴻章、張之洞等的建設還夠不上說是產業革命。今後要建立近代式

的國家，消除封建殘餘，充實國防工程，提高國民生活程度，造成獨立國家的經濟，物質建設是最重要的基本工作。第二實行計劃經濟，以確立產業組織。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受外國資本家的侵略，本國產業基礎薄弱，人民智識能力低微，要作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以及調整生產與消費間的關係，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由政府通盤籌畫，合理支配，纔能收到效果。第三從事社會改革，以平均財富分配。中國在開始建設經濟時，對於西洋經濟所發生的弊害宜竭力免除，生產的財富須爲大多數勞動民衆享受，地產與資產須有合理的處理，獎勵勞心勞力的所得，使社會經濟既增生產效率，又能公平分配。將來的經濟思想與政策在詳細與具體之點雖不免有很多差異；但要是看清中國的現狀與需要，敢信終不至違背這幾個基本的原則。

這樣看來在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空間與時間上，會得有一個中心思想的。不論思想複雜到如何程度，十九世紀英國經濟思想的中心是自由主義，十九世紀下半期德國經濟思想的中心是國家主義，這是從他們國家環境與需要上自然產生的結果。中國人民智識幼稚，對於近年固有的與外來的各種參錯複雜的思想，缺乏鑑別的能力，以至思想界蹈於無政府狀態。這是一種危險的

現象，其弊是以使步伐整齊的經濟建設遇到種種阻礙。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從現階級本國的立場提出了民生主義爲指導原則，已爲國內許多開明有識的人所尊重。如果用科學方法加以發揚光大，當可成爲一種完善的學說。這樣從事建立中心思想，並不就是統思想於一尊，其他思想不妨同時並存，民國八年的時候，戴傳賢氏因憂慮共產主義的煽動，請問中山先生，先生的答話最足發人深省：「中國的社會思想與生活還沒有發達，人民智識沒有普及，國家的民主建設，還沒有基礎的時候，這種不健全的思想，的確是危險，不過這也是過渡時代一種自然的事實。如果要防止他，反而煽動人的好奇心，助我不合理的動亂。再冷靜一點想，無論在甚麼地方，荒地開墾的時候，初生出來的一定是許多雜草毒草，決不會一起便天然生出五穀來的，也不會忽然便發生牡丹、芍藥來的。這種經過差不多是思想震盪時代的必然性，雖是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憂慮的。」（註三）所以大家只宜設法建立中心思想，對於其他相異的思想無庸加以排斥或干涉。這樣思想可望漸漸澄清，而同時又能保持文化的自由與進步。

以上所指出的今後理論建設應注重的幾點：建立一種經濟科學——適合國情的社會經濟

學，提倡產業革命，計劃經濟，與社會改革，本民生主義原則發揚成為一種中心的經濟思想，只是幾個主要方針，詳細之點當有待於建設性之研究。今日全國正為民族生存而艱苦奮鬥，這個難關過後，就應該是一個經濟建設的時代。這種建設，經緯萬端，其所需的人才時間，一定遠過於目前救國的工作。經濟思想對於一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操有重大的支配作用。當此國家需要再造的大時代中，前輩的人物先後過去了，從今以後如何運用科學方法認清世界經濟情勢，國民經濟癥結，針對國計民生的需要，確定健全而可行的經濟制度與政策，並與身體力行促其實現，這是我們繼起者的責任！

（註一）據戴季陶氏宣稱：在孫夫人處見到孫先生所親筆記出的民生問題目錄中，還有「養生」與「送死」兩個題目。見戴季陶文存第一編頁一〇。

（註二）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自序中說：「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爲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删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敍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

也。」見胡編總理全集第四册，頁二五——二七。

（註三）見「與戴季陶關於社會問題之講話」胡編總理全集第二集，五八六——五八七。

附錄

一　中國經濟思想之輪廓

經濟學之成爲獨立科學，是近百幾十年來的事。此學之傳入中國，於今不過幾十年。但中國周有經濟思想的源流，却已有幾千年歷史。中國經濟思想進步慢而歷史長，與歷史短而進步速的西洋經濟思想恰好相反。當西洋列國還沒有萌芽之前，我們的經濟思想早已在放着鮮豔的花朵了。

中國的經濟學術，現在已經世界化，而在過去，我們有完全屬於自己的經濟思想。這種思想，在古代卽已植下深厚的基礎中世各朝復本此加以發揮並實踐。在這悠久的年代中，支配了我們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支配了我廣大人民的生活。

中國古代文化最盛的當推周朝，其完美的法制經濟載於周禮。從某一方面說，這是一部記載

周朝經濟制度的大書。當時朝廷設了許多官職，其中大半掌理經濟行政；同時施行井田制度，採用布帛作爲通貨，分頭推進勸農、考工、與保商各政；對於理財一道特別講究，凡是預算、審計、政府會計制度等，都已粗具規模。這種思想與制度，在整個古代世界是最進步的，即至近代仍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正如晚清學者孫詒讓所說：「周禮一經，政治之精詳，與今泰西各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破崙、盧梭、斯密亞丹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新政之最新者，吾二千餘年之舊政，已發其端。」

春秋戰國時代的各派思想家，抓住社會劇變的時機，各自鼓吹他們的教義，以號召人民，謀以自己的理想改造中國。他們各立一種經濟主張，爲其整個學說體系中有機的一部分。

大概說來，道家相信自然法，認爲人的行爲應順乎他的本性，由此否定人爲制度與物質文明的價值，盼望回復到太古簡單生活的社會，這是原始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儒家提倡一種保育政治，揭示「先富後教」之義，勸當時的王者維護人民福利，主張政府於經濟範圍抱放任態度，以與民爭利爲大戒。墨家把勞工看作唯一的生產要素，提倡兼愛互利，略近於基督教社會主義。法家注

重功利，一意發展國家經濟，擬藉政府的力量促進生產，調劑分配，故採取干涉政策，實行大實業國有。農家乃中國的重農主義者，勸導人民以勤苦耕作爲第一義。

以上各家之中，影響最大的當推儒家與法家：前者傾向放任主義，後者主張干涉主義。以後歷代的經濟思想，在大體上都不曾跳出他們所說的範圍。法家的代表作管子一書，尤有價值，其中於分工與供求原理及貨幣數量說各項，都已有相當的發明。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特色，可以均富一點來概括，這幾乎是各派所共同的。於國計，主張藏富於民，不集富於國家；財政以量入爲出爲原則，要求輕稅，反對掊克斥厚斂爲病民之政。於民生，主張均富於社會，不集富於私人，故農禁兼併，商禁壟斷，工禁淫巧，尙小本經營，不重大規模生產。財產相續，由子孫均分，不採長子繼承制。中國之所以成爲小農制國家，無階級懸殊之象，分配比較平均，與這種思想實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歷代的經濟政策，在平時多循儒家道統，僅在非常時期援用法家原則。其本法家原則施用於理財方面的，在漢唐有桑弘羊與劉晏諸人，思想略似十七世紀歐洲之官房學派（Kameral-

lists)。桑弘羊曾用均輸平準之法，實行重要商品專賣的制度，彌補了當時財政的困難，而兼收穩定物價的功效。然這種政策，當時曾大受在野儒生的反對，在一次政府召開的經濟會議中，在朝派與在野派雙方展開了一個激烈的論戰，內容見於鹽鐵論一書，自由經濟與統制經濟的主要論據卽已被提出來了。

在漢朝與宋朝，中國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經濟改革。王莽改制，實行土地國有，廢除奴隸制度，重要物品歸國家專賣與物價由政府制定等辦法。王安石變法，先進行財政改革，繼後施行政府農村低利放款，管制物價與運價，平均土地稅負擔，並廢止公共工程的強迫勞動諸法。這些改革都以周禮中的古制爲模範，融會儒法兩家的學說，並配上一些新的實施方法。王安石新政的實驗，早在十一世紀，而其注意與現行各國的統制經濟大體相合，尤其值得欽佩。這種改革雖在守舊派圍攻之下短命而終，但其眞價值並不會被埋沒，相反地倒成了以後這一類改革的先驅，爲後起改革家所留心參考。

我們過去的經濟思想，因教士的傳播，曾一度給歐洲重農學派以影響。該派的主腦魁奈

(Quesnay)很推崇周禮的稅制，他所主張的自然律，其實就是我們先哲所說的「道」。他所說的「農民窮困則國家窮困，國家窮困則國王窮困」(Pauvres paysans, pauvre Royaume; pauvre royaume, pauvres roi)，與我們先哲所稱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合符節。亞丹斯密的學說源出於重農派，重農派的學說則又受中國先哲學說的影響，所以原富一書中屢屢提及中國的經濟狀況。

海禁開放的時候，英國產業革命已初步完成，經濟科學之基礎業已奠定。西洋的商品與科學同時輸入中國，他們物質文明的優越與經濟科學的進步，為我們所迅速認識，大多數稍具眼光的人都不再固持傳統的觀念。清室中興的諸大臣曾先後領導洋務運動，在野進步的智識分子更鼓吹變法圖強，熱望中國接受西洋政治經濟的思想與制度，使中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們對於經濟學理雖缺乏真正的貢獻，但卻盡了提倡與啓蒙的任務。

西洋經濟科學之正式傳入中國，始於嚴復之譯原富。自此以後，我們對於西洋經濟學，完全抱虛心接受的態度。世界經濟學名著，從正宗派以至社會主義派，大多已經譯成中文。中國治經濟學

者，多數留學國外，至今英、美、德、奧、法、意各國各派的經濟學說，在中國幾乎都可以找到繼承者。就因爲這個原故，國內經濟思想達於空前複雜與豐富的程度。

孫中山先生接受了西洋進步的經濟學說，配上中國固有的有價值的思想，根據中國的環境與需要，自創一種民生主義的理論，以期爲中國建立一種理想的經濟制度。他的根本目的在改善人民的生活，謀公衆的福利，所採的辦法是平均土地的所有權，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的發達，大規模的工礦業歸國家經營。他提倡錢幣革命，主張實行一種管理通貨，使物價與民生穩定而不生波動。他在一九二一年所發表的實業計劃，歡迎外資開發中國富源，所採的是計劃經濟的方式。在那時蘇聯的計劃經濟還沒有開始，他便提出這種主張，足見他的遠見卓識。現在他民生主義的學說已爲國人所一致信從，而且已採爲國策的指導原則了。

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有一種顯著的進步，就是對於世界複雜的經濟學說儘管兼收並蓄，但自己能加以消化，在應用時能加以選擇，活用其原理，以適應本國環境的需要。同時對於中國固有的經濟思想也能加以整理，給與新的估價。顯然，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已經從翻譯的時代進於創造

的時代。一般新進有識的經濟學者對於至今流行的經濟學說不能引為滿足，他們企圖針對着新環境與新需要，創造一種經濟學的新體系。這種努力在不久的將來可望成熟，以貢獻於世界，為經濟學界放一異彩。

二　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學之進步

文化先鋒編者先生，鑒於民國以來各種學術俱有長足之進展，特發起作一總檢討，以「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學之進步」為題徵文於余。詞意殷殷，不忍拂逆，祇以經濟範圍寬廣，內容龐雜，近年國內此方著譯如雨後春筍，個人所知有限，抗戰期間公私文獻諸多散失，可以利用之資料甚少。率爾操觚，難免掛漏之譏。況今人治學猶在變遷之中，一時難以確當判定，故遲遲未敢著筆。繼憶及美儒華爾克（Francis A. Walker）於一八八九年，亦有「晚近美國政治經濟學之進步」之作；且處此中國經濟學正待發揚之際，檢討過去誠感需要，乃不揣寡陋，勉就非常有限之參考資料，暨憑記憶所及，草為斯文。取材以民國以後為主體，然三十年并非自然之階段，對於過去之歷史聯繫，亦

路爲道及。內容所述，則以經濟思想與學理爲對象；其他應用經濟學方面之研究，如幣制、銀行、金融、財政、貿易、與工業、農業等，概未涉及，俟之各方面之專家可也。

中國原無經濟之學，片斷之經濟思想與政策，散見於歷代各家集部，概乏整然之體系，且立場多半拘於倫理，鮮有從經濟觀點出發者。海禁既開，商品與科學同時輸入，國人慄悟往日故步自封之非計，急起追步於後，經濟爲立國大本，尤爲朝野所重視。清室重臣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與張之洞等，均先後從事洋務運動，積極推進國防經濟政策。郭嵩燾、薛福成、與馬建忠等，更上書著論，審贊其成，論議勸闢國策，特於學理方面少研究耳。戊戌變法圖強，康梁實爲主動，其所提出之振工、通商、闢地、築路、製礮、與造艦諸大端，皆仿西洋先進國之規模，欲使中國進於近代化之道路。康有爲所著之大同書，主張廢除家庭國家，實行共產，公妻，並兒童公育，陳義之高遠，雖無政府共產主義亦不是過；惜其純憑空想，了無科學上之價值。梁啓超倡唱「新民」之說，下筆恣肆，所論遍及政治、經濟、社會、與倫理各方，而於經濟思想方面無何種特殊之見解；至對於財政幣制之各項條陳擬議，可當別論。他如清末民初盛宣懷之鐵路國有辦法，與張謇之棉鐵政策，皆爲實際之經濟政策與經濟學

理無關宏旨。

西洋經濟學之正式傳入中國，以嚴譯原富爲嚆矢。亞當斯密者，近世經濟學之鼻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書又爲其畢生心血結集之不朽力作。而嚴復在中學方面，既自幼具有根底，早歲又留學英倫，於此學研習有素。以此人而譯此書，堪稱名著名譯。況選譯之時，審愼異常，甚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譯筆克盡信、達、雅之能事。宜其刊行之後，不脛而馳，傳播之廣，爲數十年來書籍中所罕有。篇章之間，雜以案語，表示譯者私見；即欲知氏見解者，亦可以此觀之。西文經濟學一辭，嚴氏擬譯爲「計學」，嫌日人譯「經濟」爲太廓，國文中「理財」爲過狹。對於斯密經濟學體系，以其主張富國裕民，牽涉法制、倫理、與風俗各方，頗以渾統爲病。蓋斯密以後之學者，如英儒凱恩士（Cairnes）、薛尼和（Senior）、與德儒勞（Rau）等，分別「學」與「術」，或純理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之界限，使之各不相雜。嚴氏受其影響，遂認爲經濟學應爲純理經濟學，而嫌斯密之旁論經濟制度與政策爲駁雜矣。論及中國經濟，彼主力圖富強，而富強之要在乎自利、自由與自治，此三者乃個人自由主義之基本原則，而嚴氏擬

用之，其見解可以想見。彼又應用馬爾薩斯(Malthus)之人口定律，解釋歷代之治亂興亡，其論調亦帶濃厚之悲觀色彩。要之，嚴復之經濟思想大體承受古典派之衣鉢，本身別無發揮，更無論乎創造，較之法儒賽(J. B. Say)氏猶感弗如。然原富之譯，於經濟學在中國之初期傳播，以及於後起研究斯學者之鼓舞，厥功甚偉，不可埋沒。

民國肇造，孫中山先生居於領導地位，尊之爲國父，固其所宜，以彼宵旰謀國之勤，而公暇常寢饋於書本之間，即於海外奔走革命之際，亦時刻究心學問之道。對於流行之政治、經濟與社會各種書籍，無所不窺，且多能悉其意而會其通。對於經濟之學，尤爲關心。一部三民主義，以民生爲中心。早年彼上李鴻章書中所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綱，固可視爲中國富強之大經大本，然同時未嘗非簡切之經濟原則也。倫敦蒙難脫險以後，留歐經心考察社會；頗有獨到之會心。彼目擊歐洲志士社會革命之運動，深知資本主義前途之黯淡，由是提出「民生主義」，並於同盟會誓詞中列入「平均地權」一項。同盟會成立後在民報發刊詞中復加以申述，其言曰：「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世界開化，人智益蒸，

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關揚時代也。……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迹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覩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其時三民主義之根本觀念已告確立，民生主義亦粗具雛型。歐美各國生產發達之後，社會問題仍極嚴重，因而中山先生頗注意分配問題，放棄早年單純之富強政策，而提倡民生主義；且警告國人：中國如循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二三十年後勢必嘗到社會革命之痛苦，故應防患未然，及早尋求民生問題之解決。惟當時各方對民生主義多感認識不足，故彼在各種宣言、演講與談話中，常反覆申述此義。

民國建立後，中山先生功成身退，在野宣揚主義，並致力民生主義之實行，彼於多次演講中表

示民生主義乃「國家社會主義」，對於俾斯麥之政策深表贊同。主張以國家之力開發天富，實行大產業國有，以防資本家壟斷，獨享其利，並謂社會主義係人道主義，勸社會主義青年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此時期之民生主義思想，帶有濃厚之社會改良氣質。民國三年以後，國內外波瀾迭起，如袁世凱僭改帝號，歐洲大戰爆發，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之興起，均予中山先生思想以極大之刺激。民國十三年所講述之「民生主義」，業已面目一新。明言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惟以社會主義流派過雜，故仍用「民生」兩字，而不稱社會主義。彼對馬克思之博學，殊爲推重；然於其具體意見，多持異議：如否定唯物史觀，而提出民生史觀，反對階級鬬爭，而主義階級協調，並舉例證明剩餘價值說與事實不符，而於爲此說基礎之勞動價值論則未深辨。然就大體言，吾人與其謂中山先生認馬克思主義本身爲不當，毋寧謂其認爲此種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爲愈。蓋以彼之見，中國產業猶未發達，無懸殊之階級，剝削關係尙不嚴重，故師馬氏之意則可，採馬氏之法則不可。所異者猶不在原則而在方法也。

民生主義實施之政策有二：一曰平均地權，一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用意，在使社會財富均

半，祛除地主坐收地價增漲之不勞利得，並防止中國實業發達後之土地投機，此乃英儒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與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等所倡導，亦輓近農業社會主義者所企圖實現者也。中山先生殊企慕井田制度，謂爲中國古昔最佳之土地制度。然以古代地廣人稀，今則地狹人稠，世殊時異，所採方法自不能同。彼對於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之單稅制度亦甚重視，並在民元一度建議效法；其後彼雖主征地價稅，而並無豁免其他各稅之意，故與單稅制不同。彼之土地政策，最後理想爲土地國有，目前辦法則在使私有土地民衆化，即欲使少數人私有之土地轉爲大多數人所私有，僅極小部分公共需用之土地收歸公有。即他日土地國有實現，仍必發歸耕農經營。故平均地權實爲一種土地國有農營政策。其實施辦法分照價抽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與耕者有其田數種，並擬以此項稅收充地方社會事業之用。以言資本之政策，於節制私人資本所論甚少，大部注重發展國家資本，以政府力量振興諸大實業，而以國內資本缺乏，力倡利用外資。一九二一年以英文脫稿之實業計劃('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由 Putnams Sons 書局出版，)意在鼓動外人投資，「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內容

詳列工、礦、商、運、以至農業、水利之發展計劃，並籌定個人企業與國家經營之界限。就建設綱領言，實爲一種經濟計劃；而就建議體制言，又爲一種計劃經濟。方是書起草之時（一九一九年），計劃經濟猶未爲一般所注意，即蘇聯亦甫成立，俄羅斯最高經濟委員會僅在烏拉區局部建設金屬工業，大規模之五年計劃猶未開始考慮，而彼即提出此體大思精之建設計劃，遠見卓識，誠堪敬佩！

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講求「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注重改善人民之食、衣、住、行、育、樂，與晚近西洋提倡福利經濟之學者如合一契。其思想與政策雖非嚴格之經濟理論，與所謂純理經濟扞格不入，然吾國方處國民經濟建設時期，志士學人，關懷國是，其所抒發鮮有不涉及國計民生者，不能以純理經濟學之界限繩之。蓋若是者，若干寶貴之貢獻，亟將摒諸吾人題外也。彼英儒亞當斯密、約翰彌爾、美儒雷蒙（Daniel Raymond）、凱萊（Henry C. Carey）、與德儒李士特（Friedrich List）等之著作，何嘗拘守此藩籬，內容論及經濟制度與政策處所在多有，初無害其爲經濟學之名著。若將經濟學範圍擴大言之，中山先生於此方正有重大之貢獻。其所言大多合於經濟學理，且間亦論及經濟學上之概念，若整理而條分之，未始不能成一體系。數年前

趙司任君所編之孫中山先生之經濟學說，卽爲此種嘗試之一。尤堪注意者，中山先生具有世界之目光，而立言處處以本國爲立場，而注意經濟之改進，見解開明前進，對於國內經濟學界之思想影響甚大。今之以民生主義觀點談經濟者，卽其明效，固不僅爲經濟國策之指導原則已也。

民國八年，中國國民黨中之學者，創刊建設雜誌，以發揚中山先生之教義，實業計劃譯稿卽於該誌分期刊載，其中不乏有價值之經濟論文。「錢幣革命」之理論，經各家反覆申述，井田制度之問題，更引起多方激辯。朱執信、廖仲愷與胡漢民諸先生，均認爲井田制度在國史上確有其事，並引中外經濟史料爲之論證；史家胡適、呂思勉先生等則以此類史料爲不可靠，從而否定其存在；反覆折辯，竟年不休，可謂能固持定見者。朱執信先生固治經濟學者，曾一度在大學任教，所著政治經濟甚多，於勞工尤表同情，見解接近社會主義。胡漢民先生新舊學均有素養，爲國民黨內有數之學者，曾作長文以唯物史觀剖析中國政治哲學與倫理等內容淹博詳贍，在建設連期刊載，甚爲各方所重視。考茨基 (Karl Kautsky) 之資本論解說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由彼所迻譯，然彼並不贊成共產主義，本人始終堅持三民主義之正統立場，所著三民主義之連環性一書，

爲中山主義進一步之發展，內謂軍閥主義，寡頭政治與資本主義，爲三種連環的反革命勢力，惟民族民權與民生三種連環的革命勢力足以打破之。對於民生主義之解決，主張建設性之國家資本創造，力陳階級鬥爭不能適用於中國，意在誘導青年思想入於正軌，苦口婆心，有足多者。國民政府下之各種經濟立法，亦多在民長立法院任內完成。

方建設雜誌發刊之始，正五四運動趨極高潮之際，此乃中國新文化之啓蒙運動。以新青年雜誌爲中心，集合少壯新進之學人，反對封建時代之舊制度、舊禮教與舊文化，與數千年傳統之儒家思想挑戰，對於過去奉爲圭臬之孔孟之道，攻擊不留餘地；而舉起「德謨克拉西」（Democracy）與「賽因斯」（Science）之大纛，以號召全國青年。言論傾向個人自由創造，充溢資本主義之精神。其時各家所發表之文字，大多富有生氣動力，而於學術之深入探討則付闕如，於經濟學方面尤無貢獻；蓋其中主要人物如陳獨秀、胡適諸先生，皆北大文科教授，於經濟之學並無素養。陳獨秀氏初期之議論，與法國革命時代之彌拉波（Mirabeau）相彷彿，但不久從事共產革命活動，思想日趨左傾，且去北平而之廣州，在廣東各處演說社會主義，著文介紹馬克思之剩餘價值論等。彼認爲中

國將來應實行共產主義，然目前產業猶未發達，無革命之對象，宜先發展資本主義，而後起作共產革命。製造革命對象，而後加以革除，甯非多此一舉，即其黨內同志亦不贊同也。陳氏在北方之同志有李大釗氏，原治歷史，於唯物史觀等差有零篇著述，以不久被殺，別無貢獻可言。

以上各家俱非專門之經濟學者，對於經濟問題大多僅偶爾涉及，非有系統之研究也。然民國以來，往國外修習經濟者日衆，尤以留學美國者爲多；乃發起組織中國經濟學社，於民國十二年夏正式成立。據其社章第二條謂：本社宗旨在聯絡同志——（一）提倡經濟學精深之研究，（二）討論現代經濟問題，（三）編譯各種經濟書籍，及（四）贊助中國經濟界之發展與改進。依余觀之，中國經濟學社之組織與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頗相類似，美國經濟學會多爲留德之美國經濟學者所組織，中國經濟學社則爲留美之中國經濟學者所組織，其發起之時或即有仿行之意，亦未可知。而發起兼主持人劉大鈞與馬寅初兩先生猶如華爾克與鄧白爾（Charles F. Dunbar）之爲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也。經濟學社初發行社刊，以刊載社員之經濟論文，六七年中出有關稅問題專刊、中國經濟問題、與經濟建設三種，尚有經濟叢書若干冊，皆爲

社員所著譯者，第六屆年會議決擴充年刊爲季刊，定名經濟學季刊，於民國二十年開始發行，性質與形式有如哈佛大學所出之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載皆經濟專門論文，內容精審洵爲國內經濟刊物之代表。該社自成立至今已屆二十年，社務蒸蒸日上，社員人數日衆，國內著名經濟學者大多已經入社，人才輩出，堪稱中國經濟學界之中心組織。抗戰初期，社務一度停頓，今已恢復，季刊亦有復刊之議。

中國經濟學社諸社員中，就年歷與資望言，均推馬寅初與劉大鈞兩先生。劉先生爲前輩留美經濟學者，初執教於清華學校，現主持國民經濟研究所，頻年研究中國工業建設，頗多灼見，所言多合科學，蒐集統計資料尤多；而於經濟學理，甚少表現。馬寅初先生所涉甚爲廣博，自理論經濟學至應用經濟學，如貨幣、銀行、匯兌、交易所、財政、與保險等，無所不談。彼自民國四年由美歸國，在北京大學執教逾十三年之久，民國十六年後轉至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旋出任立法委員，主持財政立法之職務，抗戰時長重慶大學商學院，迄今年事雖高，研究仍未中輟。上學期猶聞在立信會計專科學校講授「經濟哲學」。此種畢生治學之精神、良足爲經濟學界之風範。馬氏生平著作宏富，對於社務

尤多推進；中國經濟學社之有今日，得力於氏者實多。

馬寅初先生初期之經濟議論，已集刊於其演講集中。在今日觀之，內容與文字均感粗疏，其原詞固如此者耶？抑由於記錄之闕漏耶？其中對馬克思學說抨擊甚力，引據種種實例否定「勞動價值論」謂價值之生非盡由於勞力，乃由多方面因素配合而成。於共產制度下之生產力是否在資本制度之上，頗示懷疑。彼認爲馬克思主義以資本主義發達爲對象，中國生產力尚未發達，資本尚未集中，勞資階級未分，且工人散漫無團結，故斷其爲不可行。農村方面大地主不多，行共產制之可能更小。中國之患不在資本主義，而患在資本不足，故甚至作「中國經濟問題就是資本不足問題」之論。以馬克思與李士特兩家學說言，馬氏認爲中國宜取後者，以中國企業家之需要保護正與當日之德國相同也。此點在其大著中國經濟改造中，倘有進一步之申說。是書篇幅甚多，而所論皆當前之經濟問題，僅略供解決之方策，並未提出重大之制度改革，稱爲「改造」實非所當。書中之中心論旨認爲自由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均不宜於中國，中國宜採取德奧學者所提倡之「全體主義」(Universalism)，故須揚亞當慕勒(Adam Müller)、李士特與斯班(Othmar Spann)，

於後者之說摭述更詳，且謂中國歷史上亦有全體主義。此種附會之談，實屬牽強萬分。原斯班之所謂全體主義，實爲一種強烈之國家主義，其說甚至爲納粹德國所利用。馬氏予以援用，誠欠斟酌，矧全書各部猶未能以此所標之主義一以貫之乎？

三十二年初，馬氏又將舊日講義經濟學槪論整理刊行。內容簡略異常，先論價值，次論消費與生產，後論交換與分配，頗思打破傳統之體例。然消費與生產若不先講明，供求之基本智識未具，遽爾提出一般目爲艱深費解之價值論，實患先後顚倒之弊。而將價值論列於交換篇之後，與價值論隔離甚遠，更難令人首肯。結論忽而提出改善農民生活與提高工資，似乎非經濟學書籍體例之所宜。馬氏於中國經濟實況非常嫻熟，每於談理論後牽至實務，且有時題名理論內容仍論實務，此殆其整個之思維方式如斯。故余謂馬寅初先生之貢獻在經濟實務而不在經濟理論也。

經濟學社諸子中，劉馬而下，李權時、唐慶增、與葉元龍諸先生均爲健者。李權時氏任復旦大學商學院長多年，並主編經濟學季刊與銀行週報有年，著作頗不少，惜大多粗濫，讀之味同嚼蠟。其流行最廣之經濟學教本，初以經濟學原理之名交民智書局發行，繼取其部分或攝其要義分在黎明、

世界、與東南各書局以小冊印銷，後改稱經濟學新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與前者大同小異，所謂「新論」徒易其名。彼自謂主張勞動價值論，實未曾自圓其說。書中將生產要素列為五項，於土地、勞力、資本、與企業之外，列入國家一項，理由為統制經濟須假政府之力；實則生產之因素甚多，堪稱為要素者僅四項，若加入國家，則科學與宗教等與生產直接間接亦有關係，一一列入生產要素將不勝其繁矣。分配所得亦分為五項，地租、工資、利息、與利潤之外，附以租稅，以為租稅乃給與國家之報酬，此蓋其生產要素分法之必然歸結。然而國家征稅，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若列為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之一，實為不合。此外復提出經濟的人生觀，揭櫫（1）努力生產，（2）提高消費，（3）公平交易，（4）平均分配，與（5）監督財政四項，形同標語，學理之面目全失。此種書籍實為國內「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之代表。李氏猶附和民生主義，惜其終無信念，以至失節事仇，所為與民生主義適相背馳，誠經濟學界之憾事！

與之相反，唐慶增先生為一純正之學者，於理論經濟學研究甚精。歷年主持光華與大夏諸大學經濟學系，著述甚多，並主編經濟學季刊。唐氏之思想傾向英國古典派，於亞當斯密尤所心折，對

馬克思則抨擊不遺餘力，言論文章多主合理之個人主義，頌揚自由精神，認爲政府於經濟之職務僅限於若干有限的方面，即於統制經濟高唱入雲之際，彼仍持自由經濟如故。雖然，中國產業基礎未立，不能全任貿易自由，坐視本國幼稚工業爲外力摧殘。以是征收保護關稅，亦爲唐氏所贊同。以言中國經濟，則認爲生產重於分配。彼對於經濟思想史研究最深，私人藏書甚富。論此方面之修養，國內學者實無有出其右者，特當代之理論非所嫻熟耳。氏所著中國經濟思想史，業已完成上卷。彼於中西學均有素養，以著此書，最爲合格；雖所據文獻中不免雜有僞書，然於此學術空氣稀薄之時，終不失爲一重要之收獲。惜渠近年牽於課務，健康不佳，中下卷不知何日能脫稿而已。

葉元龍先生早歲負笈美國，歸國後復渡英深造，頗覺美國一般經濟思想之膚淺，學養轉見深沈。氏連年主持中央大學經濟學講席，雖幾度出掌行政職務，然而屢曾還服講學，且所至有聲，爲學子景從；良以其思慮明快，說理透闢，後起學者出其門下者既不在少，而受其講壇影響者更僕難數。葉先生之思想，初折衷於奧國派龐巴衛克(Böhm-Bawerk)之說，後私淑英儒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於馬氏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內容與形式之完美讚賞不置，其

授高等經濟學與經濟名著選讀時，輒將此書逐頁精心講解，比較分析。於馬克思之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說則力闢其非。於美國制度派之理論亦不予贊同。在當代經濟名家中，獨推重凱塞爾(Gustav Cassel)。氏治經濟學時，主採數量方法，且目經濟學為「數量科學」Quantitative Science)，當係受凱氏影響所致。彼謂現行經濟學為一種價值學，眞論經濟處甚少，故主張將經濟科學區分為經濟學、價值學、與經濟制度學三部門，以清界限；時論對之贊否不一，彼亦未以之為定論也。葉氏論著，前刊載於科學與東方雜誌，以舊慣故，已發表者尚不多見。此種矜持之態度，與一般粗製濫造者，迥乎不同也。

經濟學社諸社員，大抵宗古典派與新古典派，如章乃器氏者則為例外；但章注意中國產業問題，非研究經濟學理者也。其他方面，亦有宗社會主義派，陳豹隱氏其較著者也。陳氏受業於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權威河上肇之門，曾將經濟學大綱譯為中文，於民國十七八年出版以後，行銷一時，青年讀者多視為枕中祕笈，以原著較為艱深，另著經濟現象之體系一小冊，以為預備讀物。稍後在北平諸大學講授，復有經濟學原理十講與經濟學講話等刊行，全屬講義性質，體系未見完密，流

傳亦不及前者之廣。氏尚試譯馬克思之資本論，文字艱澀，僅成其一二，未見終篇。近年沈志遠氏所著新經濟學大綱與計劃經濟學等，亦本社會主義立場，內容泰半祖述馬克思理論，蓋編譯性質之書籍也。

經濟之學以非吾國所固有者，欲真正輸入先進國經濟學說，莫如翻譯各家原著，蓋翻譯能使讀者窺其全豹，較之雜湊編譯爲徹底也。此方面之工作，吾國年來頗有進步。亞當斯密之國富論，已由郭大力與王亞南兩君重譯，改用語體與新譯名，於後起讀者自較讀嚴氏譯本爲適宜。斯密國富論而後，各派經濟學之代表名著，如李嘉圖(David Ricardo)之政治經濟學與租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馬爾薩斯之人口論(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約翰彌爾之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耶方斯(Stanley Jevons)之政治經濟理論(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至馬克思之資本論，均由兩君全部譯出，先後出版；其翻譯似有一定之計劃與步驟，總計各書不下四百萬言，其勤力實堪讚佩！余嘗譬兩君爲英之保祿兄弟(Eden and Cedar Paul)，實則論勞績猶此勝於彼也。馬夏

爾之經濟學原理，譯述者已有多起，而迄無善本出現。閼能(Edwin Cannan)之富之研究(Wealth)與經濟學說評論（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已有史維煥、潘源來二氏之譯本，閼能教授於經濟學上之整個貢獻，數年前余曾作長文論之。美儒亨利喬治之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與克拉克(John Rates Clark)之財富之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由樊弘先生與黃澹哉女士分別譯出。法文方面，基特（Charles Gide）之經濟學之基本概念（Les Premieres Notions de L' Economie Politique），政治經濟學原理'（Cours d' Economie politique），與協作等，有樓桐蓀、王建祖、李璜、與陶樂勤諸氏譯本。基特爲團結合作主義(Solidarisme）派之代表，留法學者頗受其影響。德文方面，王開化氏所譯李士特之國家經濟學，讀者甚多，宋巴德(Werner Sombart）之鉅著近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amus），已爲李季氏所譯，斯班之著作亦有數種翻譯。至於歷史學派奧國學派之著作，除偶見一二譯本外，其餘均付闕如。洛桑派（Ecol de Lansanne）之數理經濟學著作更無人問津。瑞典凱塞爾之經濟學之數量研究論（Quantitative Thinking in Economics）已由余譯出，其代表著作社會經濟理論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 尚待翻譯界之努力，而關於分配論部分，葉元龍先生與余會分別爲文介紹。俄文方面，如波格達諾夫 (Bogdenoff)、布哈林 (Bukharin)、馬里亞諾夫 (Olyanóv, 即 V. I. Lenin) 等經濟學著作，已有施復亮氏等各種譯本，近年拉比多斯等 (Lapidus and Ostrovityanov) 與列昂捷夫 (Leontiev) 所著之兩種政治經濟學教程，在蘇聯視爲標準教本，國內有李達與張仲實氏等數種譯本，於坊間隨時可見，足見其流行之廣。日文方面，津村秀松、福田德三、與河上肇各家之經濟學著作，已由馬凌甫、陳家瓚、與陳豹隱諸氏分別介紹，俱能行銷一時。總觀歷年國人所譯之經濟學書籍，固已琳瑯滿目，然不能以此自滿，應介紹未介紹之名著爲數實多，若干已譯者尚須重譯。經濟學後進之國家，若欲迅速趕上，翻譯先進國名著，實爲重要之步驟，必此方具有相當基礎，而後能言及創造。吾國翻譯方面之成績不僅不如美國，即與日本較，亦瞠乎其後，此後尙宜積極努力趕上也。

國人自己編著之經濟學書籍，除馬寅初、李權時、陳豹隱諸家已見敍述外，尙有唐慶增氏之經濟學概論，劉秉麟氏之經濟學，蕭純錦氏之經濟學，吳世瑞氏之經濟學原理，趙蘭坪氏之經濟學大

綱與經濟學，及朱通九氏之勞動經濟學等。此等著作，互有短長，對本國情形均能相當注意，而大多材料簡略，內容淺近，以之爲高中用書則有餘，以之爲大學教本則不足。今日各大學教本多採英文書籍，如基特伊利(Richard T. Ely)、薛格爾(Seager)、卡佛爾 (T. N. Carver) 與泰羅(C. M. Taylor) 各家所著者，各曾風行一時。較新者有白萊壽 (Raymond T. Bye)、艾偶 (Lionel D. Edie) 吉密爾(Paul F. Gemmill)、德伯勒(F. S. Deibler)、計可化 (W. Kiekhofer) 等等，費却爾(Fairchild)、費尼司 (Furniss)、與柏克 (Buck) 三氏合編之基本經濟學 (Elementary Economics) 在目前最爲流行。此等教本幾全成於美人之手，英人所著，以較艱深，故用者寥寥。然外人著作均帶濃厚之本國色彩，於吾國學子頗不適合，故國人自著之精審詳贍與合乎中國國情之教本實極感需要也。

美國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 School)之經濟學說，近年甚爲風行。中國留美經濟學者甚多，受其影響者實繁有徒。該派首創者韋勃倫 (Thonstein Veblen) 見識高超，能洞察過去各派經濟學之弊，卓然自成一家，著作宏富，中譯本僅有閑階級之經濟理論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一種，其他如科學在近代文明中之地位(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等精闢之論文，除張素民氏曾著論約略道及外，尚未見有人介紹。康門斯 (J. R. Commons) 之學說，張素民與馬寅初氏曾先後述其概要，至原著資本主義之法律基礎(The Legal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 與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尚未聞有人發願翻譯。復旦大學商學院長李炳煥先生於康氏之說甚為推崇，認為新古典派所作之假定頗成問題，擬將經濟學體系重加整理，當受此派方法論之影響。余意美國制度派為德國歷史學派之進一步發展，在方法論方面可以救古典派之失，自有可取之點。惟此派於經濟制度並無具體意見，而經濟制度在目前甚為重要，故擬酌參此種觀點，進一步研究經濟制度本身，年來於此頗加提倡，近於中大新開「經濟制度論」一學程，冀於此方有所貢獻。

近年在國內經濟學界，民生主義之思想似有復興之象。報章、雜誌與小冊中，討論民生主義，並思加以整理與發揚者日多。關於此方之基本著作，最早者有楊汝梅氏之民生主義經濟學，出版已逾十年，而內容與普通經濟學並無顯著之分別。陳長蘅氏過去由三民主義之觀點研究人口政策，

著有專書，爲吾人所熟知。近有短著民生主義之綜合研究，冀出其專門之經濟智識，闡明民生主義之理論與政策，以在抗戰建國中盡其宣傳之職務。祝世康氏近著民生主義與世界改造比較各種經濟制度得失，而歸於民生主義經濟制度之建設；其他尙續有專著出版，以陳述民生主義之各種政策。趙蘭坪氏最近編著之經濟學，亦以民生主義爲其中心思想。此外類是之著作尙多，不暇一一具舉。此等著作，對於民生主義之理論與政策，均在旁徵博引以說明其合理性，與能本此進一步發揮者，未數數見也。最近在陪都成立民生主義經濟學社，顧名思義當爲研究民生主義而設者。中央政治學校設有地政學院，並一度發行地政月刊，藉以訓練地政人才，兼研究平均地權之理論與辦法。至對於實業計劃與利用外資問題，均爲抗戰期間各方所熱烈討論者。

以言各大學經濟學之研究，近年法學院經濟學系與商學院各系靡不發達，人數輒較其他院系爲多。經濟學課程日見完備與專門化，普通經濟學且由教育部規定各科學生通習。大學師資之人數與素質亦視前進步，其中倫敦大學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哈佛大學與柏林大學出身者，更佔重要地位。十餘年來造就之人才不可勝數。近年若干著名大學，如南開、中大、

清華、燕京、復旦諸校，且設有經濟研究所，以備大學畢業生作進一步之研究。往國外練習經濟者亦甚踴躍。此外政府經濟機關，金融機關，紛紛設立經濟研究處，招致研究人員，發行經濟刊物，此行彼效，一時成爲風氣。瞻望吾國經濟學之發展，正如日之昇，前程不可限量。

平情論之，民國以來吾國經濟之進步固多，而與理想相去誠遠。溯經濟學之傳入中國，於茲已四五十年，時間不可謂太短，而檢討過去，果有博通各國各家思想，針對中國國情與需要，而自成一體系之經濟學乎？曰蔑有也。以視德國，自英國古典學派經濟思想傳入，不久卽起反動，而由本國文化背景中產生歷史學派，建立國民經濟學(Nationalokonomie)，且由此而引申出保護主義政策建議國家施行。美國少壯經濟學者，留德受歷史派薫陶，卒能在國內發展成一制度學派，而與古典派學說相頡頏，於經濟學上蓋已自樹自幟。還觀吾國經濟學界，猶停滯於接受外來思想之時期，不少學者且視爲固然，各以其留學國或師承之學說奉爲圭臬，曾不思轉而自謀創造。多數學者未嘗不知創造之重要，惜眞能致力創造者不多，致力創造而已獲有圓滿之收穫者，更未之見。此余所以對於中國現行經濟學未能滿意也。

抑更有言者：吾國近年後起經濟學者固衆，大多傾向於應用方面，如致力財政、金融、貨幣、銀行、貿易、會計、與統計之學，取其與實務有關，堪爲個人事業發展之助。其下焉者僅欲博一技之長，以爲謀生工具，對於高深學理掉首不顧，甚至目爲空洞不切實際，以致研究高深學問之大學，形同高等職業學校。此種功用主義之傾向，將使經濟學之發展大受影響。近年大學理論師資缺乏，學理功課選者較少，經濟學理書籍出版寥寥，理論之經濟學發展，尚不能與應用經濟學亦步亦趨。余作此言，非謂應用經濟學不應研究，特謂理論經濟學同樣不能忽視，且在學術之意義上更關重要。甚願博學之士，我行我素，繼續作學理之探索。並願後起學者，勿囿於功利觀念，將目光放遠，以共同創造中國經濟學之新體系，爲中國經濟學開一新時代。余雖不敏，甚願以此與國內經濟學者共勉焉。

三　中國抗戰期間經濟研究之成績

客冬歲暮，嘗爲本刊撰述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學之進步一文，載於三卷四期，編者先生頃又以抗戰七年來之經濟學爲題，囑就近數年國內經濟學者之貢獻略加檢討，以策勵來茲，用意甚盛！

竊思我國抗戰以來，公私大學與經濟研究機關備遭敵人摧殘，學者專家大多流離失所，隨政府轉徙內來，在異常艱苦之物質環境下，對於經濟學術之研究仍能繼續不輟。此種精神良可欽敬，所著成績尤足珍貴，則是篇之作亦感需要，並足以補前篇之闕漏，讀者且視之為續篇可也。

在抗戰七年之中，經濟學界之研究側重實際問題，於理論部分較為忽視，此乃戰時環境使然，其他各國亦有類似情形，初不僅我國為然也。經濟學教本之著作，已出版者有張禹九氏之經濟學原論與朱伯康教授之經濟學綱要兩書。前書各編說理尚稱明晰，惟較過去一般教本並無特殊之處。最後論消費時插入經濟繁榮之變動，附著與人口論幾章，有如法儒基特（Charles Gide）之經濟學，系統似欠整飭。後書以國民經濟學之觀點，注重國民生產力之發展，並重視國家之經濟權力，內容多取材於德儒威伯（Adolf Weber）等之著作，頗受歷史派學說之濡染。劉大鈞先生所編經濟學，聞不久即將脫稿，內容雖未獲窺其崖略，然以劉氏多年學識與經濟之累積，意其必為成熟之作。李炳煥先生正著經濟學新論，思以己意建立一經濟學新體系。教育部部定大學用書委員會，年前即約葉元龍先生與著者擔任撰著經濟學原理一書，業已表示接受，彼此數經商討，頗擬就近年

經濟學上之各種收穫作一總結束，以應國內學子之需要，工作正在進行中，以篇幅較鉅，尚須相當時日，始克告成。

我國經濟學界之著作，目前固未脫除先進國影響，而達於創造時期。然年來各家取捨折衷，並參酌本國國情，觀點頗多進步。王亞南氏謂國內流行之經濟思想，充滿奧國派之氣氛，以爲中國經濟學書籍多承襲美國，而美國書籍多承襲奧國派，殊非知己之論。蓋奧國派思想在美國既無大影響，而在國內經濟學界握有支配勢力者，爲新古典派，而非奧國派思想也。許滌新氏揭穿德奧全體主義經濟學之奧秘，間接實予國內斯班 (Othmar Spann) 派信徒以有力之打擊。樊弘先生致力於資本理論之檢討，陳振漢先生從事美國經濟史之專題研究，俱有相當心得，曾在英美著名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李劍農氏之中國經濟史講義，對於史料能加考據工夫，雖本唯物史觀立場，而解釋全憑事實，不泥於刻板公式，頗堪我人稱道。中央研究院全漢昇君在該院集刊發表論文多篇，討論中國經濟史上之若干專題，以極小之問題而集豐富之材料，宜有良好之成績，且以一助理研究員而出此，尤可貴已！

過去國內外經濟學者，對於經濟制度大多忽視，當此世界文明激變之際，各種經濟制度之優劣得失，與夫我國經濟制度應採何種路線，實大有研究之必要。著者有鑒於此，年來頗加致力，所至之處均提倡研究，曾先後於川中數大學設專課講授，同時略以所見草為論文發表。國內學者對此似較前漸漸注意，論著亦時有所見，中以祝世康先生所著尤多。陳伯莊氏曾一度赴蘇考察，歸後著蘇聯經濟制度一書，篇幅雖少，取材甚精，分析亦具眼光，彼固贊美彼邦之制度，但本身仍舊信民生主義，意在節取其方法，以助民生主義之實現。張君勱氏在國內獨樹國家社會主義之旗幟，在其所著立國之道第三篇，討論中國經濟建設，對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皆排斥，自己則為一調和派，主張一面確認私產，一面確立公產，均置於國家制定之統一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任建設之任務。其他政黨首領，過去單着眼於政治者，今對於經濟制度與政策均甚注意，觀其所發表之言論文章，可以概見。外人之著作：匈牙利瓦爾加（Eugen Varga）所著兩種制度，早由祝百英氏迻譯，以社會主義者之立場將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作一比較分析。瑞典作家曼克（Frank Munk）所著武力經濟學，徐宗士先生已為譯出，以作者身歷之體驗，揭發納粹經濟制度之黑幕，倍

見親切。美人羅克斯(Loucks)與傅特(Hoot)合著之比較經濟制度，已有陳瘦竹氏之譯本，比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合作主義各種制度內容複雜，供給材料則有之，無中心思想可言。

近年經濟文獻，頗多將理論、制度與政策採合討論。一般趨勢傾向於民生主義經濟學之建立。其中最足以代表者，莫如蔣委員長之中國經濟學說。他以國家元首之地位，軍政黨務萃集於一身，而復能暇建樹經濟理論之系統，其用心誠多。此著累萬數千言，由侍從室印送若干份，尚未正式發表。中心意旨在宏揚我國先哲之經濟學闡，黜斥國內流行之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派學說，以「樹立獨立自由的經濟思想。」彼之經濟學定義曰：「經濟的原理，就是經世濟物的道理，亦就是國計民生的學理。簡言之，經濟學卽致國家於富強之學，……卽建國之學。」繼謂經濟學之目的在乎「國家以最小的時間與勞力，本於文化的遺傳，依於科學的方法，發揮人力地力與物力至於極高的限度，用之於民生與國防。」此義似廣而實賅，蓋取我國昔儒經濟之義，注重其政治上之運用，作為建國之準繩。彼指出中西經濟學說根本之不同，在乎前者以理性為本源，後者以欲望為

本源；前者以全體爲本位，後者以個人爲本位。彼因見中國產業猶未發達，私人資本家在國際競爭下不易發展，亦無階級鬥爭之客觀條件，故斷言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皆不可行。彼自己之思想則一本於中國正統的經濟道理，並將此種道理歸納爲下列三項：（一）經濟以養民爲本位，（二）經濟以計劃爲必要，（三）民生與國防之合一。按此三點乃直接繼承中山先生之教義，而中山先生之教義乃融合近代各種進步之學說而成，得之於我國先哲學說者實少。我國先哲於文化哲學方面之創見固多，而其經濟思想之合乎科學而且適用於今日者，誠不可多得。雖然，對於若干只知一味盲從外來成說，而不知本國傳統與環境爲何物者，此著所言，終不失爲對症之良藥。至於養民計劃經濟與民生國防合一三點，自屬至當不易之論，可爲經濟建國之指導原則，宜以懸之國門，使國人共曉，並協力促其實現者也。

在目今經濟學界從事闡揚民生主義者，頗不乏人，中以祝世康先生工作最力。彼爲民生主義經濟學社之組織者，發行雜誌，出版叢書，對於民生主義似有系統之研究計劃。其代表著作民生主義與世界改進一書，內容淹博，條理井然，著者熟習近代社會經濟思想文獻，故能判明民生主義在

近代思想與制度中之地位；惟其中嵌入不少中國哲學概念，反使所言暗晦，並使全書蒙玄學之色彩。趙蘭坪先生認爲民生主義經濟學可自成一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鼎足而三，擬從學理方面加以解釋。立法院中之經濟學者，如陳長蘅、樓桐蓀、吳尚鷹、與陳伯莊諸委員，皆爲民生主義之信徒，各以闡明並宣傳民生主義爲職志。中山文化季刊卽常刊載此類文字。陳豹隱氏原以介紹馬克思經濟學說馳名於時，今已改宗信仰三民主義，在近作民生主義經濟學之特質與體系一文中，列舉民生主義經濟學之基本概念爲九點：（一）民生史觀，（二）以養民爲目的，（三）從經濟法則出發的計劃經濟，（四）合理的統制經濟，（五）和平的一次產業革命，（六）徹底的錢幣制度，（七）各取所值的社會政策，（八）永久的經濟繁榮，（九）民生與國防之合一。惜此等分類標目，概乏充分之解釋，內容固嫌空泛，且間有錯誤之處，如各取所值係分配原則，決非社會政策。永久繁榮一點，中山先生遺教中並無指示，作者亦未提出避免恐慌之辦法，祇存一空虛理想，實覺不着邊際。上列各家不論所見如何，於經濟學俱有相當素養，而時下有不少討論民生主義之文字，對於經濟理論既無基礎智識，對於民生主義又乏眞正了解，徒襲取總理、總裁之片斷

教言作空洞之諛揚與宣傳，教條主義流行，非但不能發揮民生主義之高尚理想，反使民生主義成爲庸俗濫調。此種膚淺幼稚之病，亟需予以糾正者！

我國產業落後，經濟建設乃建國中最重要之工作，尤爲各方視線所集中，在戰時此種論文特多。如對於工業與農業之比重，重工業與輕工業建設之先後程序，國營事業與私營企業界限之劃分，節制私人資本與發展國家資本，利用外資，以及應行建立之產業制度等等問題，各方咸反覆討論，不厭其詳。國民經濟研究所在劉大鈞先生指導之下，研究中國工業化問題已歷年所，在戰時工作繼續進行（最近已停辦），製有種種調查報告，惜多油印，外間少有流傳。工業化叢書八種，分由專家執筆，則不久可望刊行。吳景超先生以一社會學家出身，近年轉而致力研究經濟，雖缺乏理論基礎，但於工業建設則頗有心得，二十七年曾刊行中國工業化的途徑一小册，不久之前又將數年中論文集爲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一書，內容先檢討過去辦理工業失敗之原因，後提供今後建設之意見，取材與立論，以事實爲本，無空泛之論，爲其可貴之點。高叔康氏所著之戰時經濟建設，對此問題作一般性之敍述，並無特殊見解可言。陳伯莊氏之經濟五論，係集討論經濟建設之論文五篇

而成，本民生主義之原則，分論農業、工礦、交通等問題，並主張造成健全的士人階級，領導國營事業，以為新社會之安定力，可謂得其要領。蓋公營事業若無廉能之智識階級主持之，而欲收良好之效果，是直南轅而北轍，烏乎可得？

今日之戰爭為一總體戰爭，經濟力之強弱更為強勝之要因，故最高當局有「三分軍事七分經濟」之提示。自此次戰爭發動以來，戰時經濟問題始終為各方所注意，軍政機關特設研究部分，各大學、各銀行，與私人學者無不加意研究，報章雜誌論文及小冊一時如雨後春筍，不可以數計。討論之方面甚多，要以財政、通貨與物價諸問題為中心；對於其他國家之戰時措施，可資我借鏡者，亦多報告與介紹。然成本之鉅著則不多覯。吳克剛先生所編之戰時經濟，蒐羅材料最為豐富，全書都四十萬言，內容包括生產、消費、貿易、運輸、糧食、財政、幣制與金融諸部門，幾全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美各國之材料，此次戰爭之材料，概未列入，蓋此書猶於二十七年出版，時歐戰尚未發生，中國部分亦全付缺如。張天澤氏所著戰爭與經濟，篇幅較少，亦以前次歐戰之材料為主。蕭朋樵氏之國防經濟論，為此方面一完整之專著，內容理論與事實並重，上篇論國防經濟靜態，下篇論國防經濟動

態，大多取材於德人著作。中國戰時稅制與金融管制，朱偰與鄒宗伊二氏各有專書敘述，在此次戰爭中，我國以幣值變動與其他關係，物價問題最爲嚴重，各方討論與獻議亦特多。中央銀行經濟彙報曾就先後所載論文三十餘篇，彙集爲物價問題叢刊，重加刊行。伍啓元教授對此頗見關心，曾先後著成物價統制論與目前的物價問題兩書，並聯絡西南聯大其他教授於報端時有所建白，甚爲社會所注意。政府對此問題如不能切實解決，則未來演變頗爲可慮，經濟學界難安緘默，又爲必然之理。

土地與農業經濟之研究，雖在戰時，仍能照常進行。土地問題之研究，以地政研究所爲中心，該所職任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之工作，主持研究人員如蕭錚、湯惠蓀、祝平、與萬國鼎諸氏，均爲前該校教授，服膺中山先生平均地權之教義，有志於理論與實施上作進一步之研究，並促其實現。該所編印之叢刊，除各家土地問題與政策之著作外，尚譯述土地農業之名著，已有數種刊行。人與地半月刊，自三十年初發刊以來，迄未中斷。近更擬編輯地政常識叢書，已出平均地權與土政改革一種，爲各家論文之匯集。祝平氏之土地政策要論，最近業已出版，此書係根據著者在歐考察與體驗

之紀錄，對歐洲各國土地改革多所評介，於中國戰時與戰後土地政策，亦有意見提供。美人伊黎(Richard T. Ely) 博士與魏爾萬(G. S. Wehrwein) 合著之土地經濟學(Land Economics)，乃一九四〇年之新著，較舊著（伊黎與 Moroehouse 合著）已面目一新，經由李樹青氏譯成出版。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在美籍教授卜凱 (Z. Lossing Buck) 氏指導之下，對於四川省農村經濟狀況，作有調查報告印行。農業經濟方面，許璇氏之遺著農業經濟學尤稱佳著，著者對於此道頗有素養，書中除學理之外，頗多事實參證，並注重本國農業問題，其所建議之實際政策，亦多獨到之見，可供施政者參考。梁慶椿氏於農業經濟學之提倡與研究，均甚積極。惟發表者多屬短文，成本新著猶未見及。德國波恩大學勃林克曼(Theodor Brinkmann)教授之名著農業經濟學一書，英、俄、日諸國均有譯本，茲已由中大劉慶雲教授譯成，不久當可問世。劉氏以農業經濟學雖爲一般經濟學之一支，但其本身頗多特殊性，故擬從經濟思想史中抽出農業經濟思想之部分，加以專門研究，並闢一專門學程講授，此項工作猶爲經濟學界之新嘗試，苟能整理出一體系，實爲經濟學上之一種新猷。

財政學方面之鉅製，戰前出版甚多，戰時則多短著，周伯棣教授之租稅論，幾為僅有之一種。貨幣銀行之著作，楊端六教授之一種，內容似較陳舊。褚葆一所著取材較新，對時下各派貨幣學說均有詳述，惜至今未見出版。中國農民銀行近輯各家評述，印為近代金融學說，介紹凱恩斯(Keynes)、霍曲萊(Howtrey)、哈耶克(Hayek)、與克納普(Knapp)諸家理論，可暫為讀者補此缺憾，惟缺少斐休(Fisher)、凱塞爾(Cassel)與阿夫達里翁(Aftalion)諸家理論，則為美中不足。姚慶三氏所著現代貨幣思潮與貨幣制度之趨勢，為其數年中心得之作，但後方極少銷行。對於戰後幣制問題，伍啓元教授曾作短著刊行，注重各國貨幣之合作。馬寅初先生年來息影歌樂山，潛心著述，聞其新著貨幣新論業已脫稿。楊蔭溥先生之中國金融論，聞在改訂，程紹德先生之中外金融市場一書，編著已久，以氏對於金融理論與實況之膜通，以及著作之矜慎態度，內容當有可觀，甚盼其能早日完成也。

對於國際貿易，褚葆一君年來深為致力，其國際貿易論一書大半已經告成，理論方面除介紹古典派與新古典派外，對於俄林(Ohlin)、哈伯勒(Haberler)與瓦奈(Viner)新興諸家學說亦

有評述。彼認爲保護政策仍有存在之理由，但據過去李士特（Frederick List）之論據不足，另據當代學者羅萍孫（Robinson）與張伯凌（Chamberlin）之不完全競爭或獨佔競爭之理論加以解釋，自較前者爲有力。貿易委員會章友江君，對於此道致力亦勤，時有短文發表，其成書者有統制貿易制度與商約論兩種。敍述尚稱明晰，惟缺乏獨到之見解耳。

戰事發生以後，經濟雜誌非但不減少，反有增加之勢，此爲始料所不及者。中國經濟學社編行之經濟學季刊，向爲此方面之權威刊物，去年該會舉行年會時雖決定復刊，惟以經費不易籌措未果。民生主義經濟學社編印之經濟論衡，爲新辦之綜合性刊物，創刊號內容較爲精彩，第二期後質量均不如前，尚有待於努力改進。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與人文科學叢刊，間有有價値之經濟論文發表。中國經濟建設協會所辦之經濟建設季刊與另一種新經濟半月刊，皆以提倡中國經濟建設爲宗旨，作者與作品尙能維持相當水準。財政評論爲戰時崛起之重要刊物，內容以討論財政金融爲主，已享有廣大之讀者。郵政儲金匯業局發行之金融智識，亦爲新興刊物，篇幅甚多，材料亦稱豐富。中央銀行經濟彙報出版已有十餘年歷史，始終未曾間歇。所出專號居多精采。中國農民銀行

出版之中農月刊，注重農業金融。他如四川省銀行與廣東省銀行均有經濟季刊之刊行，以鉅大之篇幅出現。貿易委員會出版之貿易月刊，注意進出口貿易與商品之分析。中國農民經濟研究會出版之中國農民，爲中國土地與農業問題之專門刊物，去秋成立之中國國際經濟協會，發印國際經濟彙報，選載友邦有價值之經濟文獻，爲國內唯一之英文經濟刊物。李超英與李炳煥兩氏合辦之國防經濟，已準備經年，最近亦有出版消息，當此紙張與印刷異常困難之情形下，經濟刊物竟如此欣欣向榮，實令人欣慰不已。

以上所述，以個人之見聞爲範圍，滄海遺珠，知所難免，不敢謂戰時經濟學界之貢獻悉備於是。平心而論，以戰時而著有如此之成績，亦可以無憾。在國內各種社會科學中，其進步之速，實未有如經濟學者。歷史、社會、政治、與法律諸學，均瞠乎其後。此蓋經濟問題本身之重要，與夫需要解決之迫切，有以致之。惟戰時之著作，重量不重質之弊，甚爲明顯。一般著作大抵平平，其有特殊所見者不可多覯，而一知半解之論，以及似是而非之說，則所在多有。出版界之缺乏鑑別力，學術界之缺少嚴正批評，實爲一大原因。同時戰時一般研究機關圖書設備之不完全，外來新書之難得，以及國內正確

資料之缺乏，亦爲治學之重大障礙。此皆爲戰時環境所限，一時無可如何者。然以今日經濟問題之重要，學者之衆多，與研究精神之熱烈，祇須戰事平定，學術機關恢復常態，則戰後經濟進步之速，必可遠過今日，可斷言也！